

俄国革命中的 孟什维克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7
37

PA
E547
41637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亚伯拉罕·阿谢尔 编

石菊英、余瑞先 译

吕文镜、吴名祺 校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承印

850×1168 32开本 5 印张 125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2—4 成本费：0.80元

印数 1—2000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关于编印《党校教学科研 参考丛书》的说明

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目的，在于为各级党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促进党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凡是党校工作人员编写译述的资料、试用教材、译作、专著，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而不宜公开发行者，均在编选之列。希望广大党校工作者给以支持和批评，帮助我们在这项工作做好，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版前言

对于八十年代的青年以至不少中年同志来说，孟什维克已经非常陌生了，但在我们党的青年时代，在那充满着斗争风雨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中，它却代表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倾向，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化表示着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一样，孟什维克意味着可憎的异端和革命的叛逆，是所有机会主义者的代名词。这一切在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的道路上，曾印下了深刻的痕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孟什维克的种种活动也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在阅读一些批判孟什维克、揭露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著的同时，却没有机会接触孟什维克本身的文献和他们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对于从事这一段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颇为遗憾的不足之处。

本书主要整理汇编了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文章、演说、书信及代表大会文件，从中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这些资料的翻译出版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

按照斯大林在1920年的说法，孟什维克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的一个派别，尽管他们“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可是，他们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派别，那么，他们的学说、

观点，就不会毫无价值。马克思逝世一百余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不知道有多少，他们结党成派，著书立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学说发展成为左右全球政治格局的伟大力量，同他们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回顾这一百年的世界政治思想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股冲击着旧世界的伟大思潮是多么丰富，多么强烈！它所涂织的历史画卷，每一个斑纹，每一条曲线，每一种色彩，无不闪耀出自己独特的光辉，尽管有的鲜艳，有的晦黯，但在学术研究领域，都各有其或大或小的价值，都值得我们以严肃的态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应当承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百年来的发展史方面，我们至今还是十分贫乏的。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资料，而没有足够的资料，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取得全面的、切实的判断和深入、准确的认识。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认为出版《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一类的资料书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作者在这本书中表述的很多观点，但他所编排的资料，还是颇有价值的。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4年9月14日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有关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的部分原始资料，包括孟什维克领导人发表的小册子、演说、来往书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等。编者亚伯拉罕·阿谢尔，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他根据历史顺序，将材料加以编排，并对有的材料作了删节。他对孟什维克深表同情，对布尔什维克则抱有很大的偏见，这从《导言》中是不难看出的。但是，不论编者的意图如何，本书汇编的原始资料，对理论研究者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特将该书全文译出。

本书导言和第六部分由余瑞先译，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由石菊英译，全书由吕文镜、吴名祺校。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出版前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1、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决议案 (1903年7—8月).....	(48)
a、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1903年7—8月).....	(48)
b、叶哥罗夫对两个有关党员资格的决议案的评论 (1903年7—8月).....	(48)
c、阿克雪里罗得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48)
d、马尔托夫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49)
e、列宁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50)
f、普列汉诺夫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51)
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1903年12月15日 和1904年1月15日).....	P·阿克雪里罗得 (51)

第二部分 1905年革命时期

3、孟什维克领导人给党组织的信(1904年11月).....	(57)
4、关于武装起义(1905年4—5月).....	(60)
a、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1905年4—5月)	(61)
5、农民问题与革命(1905年11月20日).....	(63)

- 6、阿克雪里罗得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5年4—5月)……………(64)
- 7、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
(1906年4—5月)……………(69)
- 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
(1905年)……………P·阿克雪里罗得(70)
- 9、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
(1907年4—5月)……………(73)

第三部分 反动时期(1907—1914年)

- 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1911年)……L·马尔托夫(76)
- 11、为合法地位而斗争(1910年1—2月)……F·唐恩(79)
- 12、简评(1910年)……A·N·波特列索夫(81)

第四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 13、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杜马代表的联合
声明(1914年8月)……………(85)
- 14、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1916年)
……P·阿克雪里罗得、S·拉宾斯基、L·马尔托夫(87)
- 15、致哥本哈根会议的信(1915年)
……A·N·波特列索夫等(91)

第五部分 1917年革命时期

- 16、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
(1917年3月7日)……………(98)
- 17、策烈铁里论战争目的(1917年4月2日)……………(99)
- 18、策烈铁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时发表的演说
(1917年8月21日)……………(100)

- 19、孟什维克评列宁的提纲(1917年4月6日)……(102)
- 20、临时政府的政策
(1917年6月19日)……I·G·策烈铁里(103)
- 21、孟什维克的解释(1917年7月)……(105)
- 22、护国派的决议(1917年8月)……A·N·波特列索夫(108)
- 23、马尔托夫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
(1917年7月16日)……(110)
- a、马尔托夫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
(1917年7月17日)……(111)
- 24、孟什维克告工人、士兵书(1917年11月6日)……(113)

第六部分 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 25、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声明(1917年11月9日)……(115)
- 26、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1917年11月22日)……(117)
- 27、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
(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1日)……(119)
- 28、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L·马尔托夫(120)
- 29、告男女工人书——怎么办?(1919年7月12日)……(121)
- 30、致德国同志们的信(1918年12月28日)……L·马尔托夫(128)
- 31、在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19年11月)……F·唐恩(129)
- 32、革命少数派的专政(1920年)……L·马尔托夫(130)
- 33、党代表会议的决议(1920年8—4月)……(131)
- 34、关于国际的决议(1920年8月12日)……(135)
- 35、专政和民主(1919年)……L·马尔托夫(137)
- 36、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
(1919年2月)……P·阿克雪里罗得(139)

37、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1921年4月20日).....	(142)
部分参考书目.....	(151)
大事年表.....	(155)

导 言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孟什维主义这个术语颇为含混。虽然孟什维主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中一种独特的政治思潮，并于1912年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学说，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从未发展成为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孟什维克最著名的领导人，往往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的人有时竟同他们在争夺工人阶级支持方面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没有多大差别。而且，短短二十年中，孟什维克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公开改变立场，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此，对孟什维主义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来研究它的发展情况。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够集中注意那些作为孟什维主义核心的一贯的政策、观点和准则。

孟什维主义产生于1903年夏天。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WP）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想要把从事工人运动的二十六个小组联合起来。抵达布鲁塞尔，参加了前一段会议的代表们普遍认为，仅仅代表几千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不再沉溺于在内部进行不妥协的、两败俱伤的争论了。筹备这次大会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的六位编辑（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弗拉基米尔·列宁、尤里·马尔托夫、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和维拉·查苏利奇）看起来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俄国马克思主义之

“父”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必须经历两次革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和实行民主；然后，当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支政治上成熟的巨大力量之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六位编辑还一致认为，由于俄国中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甚至在第一次革命中也必将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集中力量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直到工人阶级形成巨大力量。由于六位革命者认识一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的二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所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六位编辑分裂了。他们对党员资格这个表面上看来次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文件I, Ia），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吃惊。列宁又说：“我根本不认为我们的分歧会重大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①代表们就更加困惑不解了。因为不久代表们就知道，列宁为了使大会能通过他的方案，曾拼命活动。显然，他认为一个根本原则处于危险关头。

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理解这场辩论的意义，可是列宁却对这场辩论深切关心，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1902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怎么办？》里概述的有关组织党的理论的挑战。在《怎么办？》里，他说，工人如果不由革命知识分子来领导，就会陷入工联主义的泥坑，只要求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②列宁提出，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按等级制来组织，应该由“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即由受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全力以赴地为革命准备工作献身的人来领导。他欢迎象工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帮

助，但认为它的大部分成员即使公开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不适于吸收入党。简言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工人由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会自发地具有阶级觉悟；列宁的看法则相反。他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别人引导，政治觉悟决不会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他坚决要求大会采纳他对党员资格所下的有限制的定义。

后来成为孟什维主义主要思想家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起初并没有充分理解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期间，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打算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制定一条崭新的基本路线，而俄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广大工人阶级参加即将来临的革命事件，是必要的，适宜的（文件Ib, Ic, Id, Ie, If）。在几次秘密会议上，列宁露了底，他计划把他的信徒塞进中央委员会，形成多数。这就使他们更加怀疑列宁的动机了。列宁不但赞成党员应该经过精选，而且看来还抱有个人统治全党的野心。^③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认为事关重大，决不能让步。《火星报》编辑中，只有普列汉诺夫站在列宁一边。投票结果，二十三票对二十八票，列宁的方案被否决了。

列宁因失败而恼羞成怒，便发动大规模运动以便控制《火星报》和即将由大会选举产生的各委员会。由于他玩弄的手法很狡猾，又发生了几起偶然事件，一些曾在党员资格问题上投票赞成他的对手的代表退出大会，表示抗议。列宁在其对手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在一连串关键性的表决中，都以微弱多数获胜。尽管他在实质问题上被击败，他仍然擅自将他的“强硬”派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他的“温和”的对手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是，他的胜利是以极大代价换来的。孟什维克大多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饱经风霜的活动家，他们宣布“我们不是农

奴”，拒绝接受新的委员会的领导。大会仅达到了形式上的团结，因为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派别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产生的。

有好几个月，辩论压倒了党的一切工作，使不了解大会讨论情况的普通党员思想混乱。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是个想当独裁者的不可救药的阴谋家，既缺乏灵活性，又缺乏原则性。1903年11月，这些罪名显得更加可信了，因为当时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他也痛斥列宁肆无忌惮（他实际上把列宁叫做“罗伯斯庇尔”）而且加入了孟什维克派。实际上列宁在工人运动领导人中很孤立，他感到束手无策，只好把《火星报》交给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得意洋洋，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列宁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他决不会放弃斗争。他使布尔什维克保持一致，并继续辱骂他的对手是不可救药的“温和”派和“机会主义者”。许多党员断定，这场争论已完全蜕变成野心家和利己主义的政客的权力之争了。

直到1903年底和1904年初，当阿克雪里罗得在《火星报》上发表一篇包括两部分的文章之后，一般参加运动的人才开始明白，双方争的还不仅仅是权力（见文件2）。阿克雪里罗得断言，由于两派之间的争论，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两种看法：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应该是由上面来控制的等级制的党，另一派则认为，它应该是由下面来控制的群众性的党。他的这种说法对《火星报》的读者是一种启示。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回忆说，“那篇文章象闪电一般，划破漆黑的长空，耀眼的光芒照亮四周，一直照到了地平线上。只是到这时候，孟什维克才意识到了它自己的存在，明白了组织上的分裂，找到了自己的思想，举起了自己的旗帜。”^④阿克雪里罗得认为，为了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群众性的党，由下面来控制，由政治上成熟的工人组成。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一论点，一直

是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它的整个历史过程。

列宁看到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时“大发雷霆”，简直象只“老虎”。他把这篇文章说成是“我所读到的我党全部文献中最令人作呕的一篇……阿克雪里罗得诅咒了《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诅咒了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写得出这种胡言乱语”。^⑥他敦促中央委员会反对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并拒绝接受其中的思想。他说：“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们默默忍受这些，就正好成为流言蜚语……的散布者和诽谤诬蔑（对于所谓官僚主义者即对于你们自己和整个多数派）的传播者吗？你们认为在这种‘思想领导’之下能够‘有效工作’吗？”^⑦列宁之所以火冒万丈，是因为他懂得，阿克雪里罗得为阐明两派的思想分歧所采取的步骤，势必加深冲突，并使布尔什维克处于守势。

对两派的社会成分要能作一番明确的说明，那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手头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很少。这里，不妨试作概括的叙述。虽然两派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但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中，孟什维克比它的对手更有号召力。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在孟什维克运动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在两派刚开始分裂时就明显地起了突出的作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五十七名革命者中，二十五名是犹太人：其中六名是崩得（犹太工人联合会）分子，四名是布尔什维克，十五名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总共只有十七名代表）。^⑧孟什维主义深受西方影响（这方面是布尔什维主义所缺乏的），很可能是犹太知识分子在这一派中占有突出地位造成的。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而且往往定居在世界性色彩更浓的城市。明确地说，孟什维克欣赏西方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并容许自己队伍里存在不同的观点。许多孟什维克无疑把这

些政党看成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样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受西方影响，因而完全不理解俄国社会的性质，不理解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孟什维克不象布尔什维克，它从未制定出一个能对俄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有号召力的纲领。

1907年，孟什维克同犹太崩得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它受西方的影响就更大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了关系，因为大多数代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崩得关于把党建成为各民族政党联盟的建议，一个旨在使崩得在犹太人社团的特殊利益问题上享有自治权的方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希望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而且对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阻碍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现象。

作为一个仿效德国模式的民主主义政党，崩得赢得的群众支持比俄国民主运动所赢得的大得多，因而能保持其独立性。尽管如此，几年之后，崩得领导人得出结论，他们的组织在思想上同俄国党，尤其是同孟什维克派如此接近，所以继续分离下去毫无意义。1907年，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而孟什维克于1912年也正式改变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民族文化自治”的方案。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这两派曾进行过如此密切的合作，以至于崩得的一些著名人物同时也是孟什维主义的领导人。

裂 痕 加 深

在此期间，俄国事态急转直下，因此而引起的对策略问题的争论，使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严重性不再存有丝毫的怀疑了。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中，人们对沙皇政府的不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原先政府一直让人民相

信，打起仗来日军会一触即溃，然而事实证明相反，俄军连连吃败仗，是最无能的。实际上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公开起来反对政府了。

自由资产阶级的反政府派，由于政府丧失威信而变得胆大起来，在夏季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颁布宪法，为帝国的公民争取公民权和人权。俄国在战争中如此狼狈，除最反动的分子外，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国家制度需要进行改革。许多地方自治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地方政府机构）11月份举行宴会，纪念包括诸如实行由陪审团参加审判、司法独立、较人道地惩处罪犯等的法律改革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所组织的发言，号召彻底改革政治制度。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地方自治局大会，开成了“革命的集会，公开提出废除俄国专制制度的要求。全国民众都本能地感到……〔这次集会的〕历史意义。”^⑩俄国自由派终于成了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办呢？

孟什维克在阿克雪里罗得的策略思想的影响下，号召开展“地方自治局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在1904年年末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游行，以达到促使地方自治局中的自由派向左转的目的（见文件3）。孟什维克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及其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并促使自由派去争取沙皇作出让步，诸如普选权、公民自由权以及召开制宪会议等，这将有益于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孟什维克认为，他们发动这样一个运动，就把关键性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而又不违背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坚持的原则，即在落后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基本上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布尔什维克否决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有根本性的缺点。布尔什维克的当然领袖列宁，说这个计划“简直是庸俗”，

是“一团混乱”而不予考虑。他不再认为资产阶级是进步的力量了，因为他相信，尽管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但它不愿彻底摧毁君主制度的权力，摧毁其常备军和官僚政治。因此，他主张工人阶级不去支持自由派，不用设法去影响他们，而应直接行动起来反对政府，从而带头来推翻旧制度。简言之，社会民主党应准备以“人民起义”的方式，与专制制度进行“决战”。⑩列宁的建议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仅加深了两派间的裂痕，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麻烦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完全指望中产阶级来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那么坚持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必需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阶段，还有什么意义呢？1905年，当革命席卷全国时，愈来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05年的风波是从1月22日* 加邦牧师领导的和平示威游行开始的。几千名工人举着圣像和沙皇的画像，前往圣彼得堡的冬宫请愿，打算要求统治者给予公民自由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释放政治犯以及改善工厂的条件，等等。在去冬宫的途中，突然一阵弹雨袭来，一百三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无缘无故的大屠杀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马海峽惨败，这个消息又给反抗力量火上加油，于是，几个月之内，四种抗议运动便活跃起来了。

自由派当时主要由一些要求成立议会制政府和民主选举立宪会议的人所控制，更加强烈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在农村，农民到处骚动。各民族集团纷纷鼓动民族自治或独立。最后，在中产阶

* 导言中所有的日期均按西方日历算的，它比俄历（儒略历）的日期早13天。苏联于1918年2月采用西方日历。我在脚注中保留了原文中出现的日期。

** 原文如此——译者注。

级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工人于10月在大多数较大的城市中举行了总罢工。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动荡。工人阶级也从来没有象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秋冬那样，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总罢工期间，在圣彼得堡，自发地建立了一个领导罢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⑩。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们破天荒第一次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几个星期之中，这些代表在革命队伍里行使着不寻常的权力。在帝国四、五十个左右的城市里，苏维埃迅速建立起来了，其中有几个还成了重要的政治核心。

总罢工实际上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有几天旧制度的命运已濒临千钧一发的险境。沙皇尼古拉在绝望之中不得已发表了所谓《十月宣言》，答应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权，答应召开民选的杜马来参与将来一切立法工作。虽然谁都不确切地知道宣言将怎样付诸实施，但是，几乎谁都不怀疑俄国的政治制度行将大大地自由化。

这一切显著的变化都是在十个月之内发生的，即使是乐观的革命者对此也感到惊讶。许多人糊涂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可以理解的。孟什维克的政策更是难以说清楚。因为这个党派对这场革命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纲领或保持一致的态度。从1905年4、5月间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见文件4，4a），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举棋不定的。一方面，他们宣布不反对武装起义，然而却又坚决主张在采取武装行动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事广泛的鼓动和组织工作。他们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参加专制制度被推翻后可能成立的临时政府，却又说，这一禁令“当然并不排除下列情况，即纯粹出于扩大起义范围和瓦解政府的目的，在某一特定城镇或地区部分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或成立革命公社”。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议的要点都包括在马尔托

夫的概括性的策略里。这个在1905年下半年得到孟什维克广泛支持策略，号召在全俄建立革命自治机构网，以期通过这些机构，最终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向中央政府发动进攻。⑩最令人惊奇的是，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俄国可能越过资产阶级阶段的意见：在一个决议中他们认为，如果革命能传播到社会主义已经“成熟”的欧洲先进国家，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夺取政权。这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流行的对那个问题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

1905年11月，孟什维克的几位领导人回到俄国，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使他们陶醉了。费道尔·唐恩在圣彼得堡写道：“我们都象喝醉了酒似的，革命的气氛对人产生的影响就象酒一样。”几天后他指出，“就总罢工来说，它使圣彼得堡的工人产生了最革命最积极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强烈地影响了领导人。”⑪唐恩同亚里山大·马蒂诺夫、帕尔乌斯（亚里山大·赫尔方德）、L·托洛茨基一起，创办了《开端报》，1905年末，它刊登的文章比起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报上的文章来，在某些方面更为激进。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成了《开端报》社论的主题（见文件5），根据不断革命论，甚至在大动荡波及到西方之前，俄国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在俄国著名的孟什维克中，马尔托夫等少数人不同意如此彻底地背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的关于俄国革命发展的观点。

孟什维克中最坦率地批评激进路线的人是阿克雪里罗得。他1881年开始侨居瑞士，由于妻子有病，直到1905年才回国。他决不放弃孟什维克对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的一贯看法。实际上，他主张，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特殊任务”与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一般民主要求发生冲突，那么“社会民主党必须放弃……自己的任务”。⑫在阿克雪里罗得看来，宁可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也不能

让反对专制制度的力量分裂，因为那很可能会使沙皇制度恢复元气。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参加政治活动。1905年秋，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便把工人运动变成由下面来控制的真正的群众组织（见文件8）。

阿克雪里罗得之所以要写这个小册子，是因为他认识到，尽管两年来孟什维克一直在提倡扩大他们的运动和使之民主化，但是收效甚微。除1905年末的几个星期外，从1903年到1917年初的整个时期里，孟什维克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因此得不到多少关于它的组织和成员的确凿的材料，而且透露出来的资料也并不令人欣慰。据1907年的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为46,143人，孟什维克为38,174人。这些数字可能有虚报^④，但即使真有这么多成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当时工业人口已达二百万左右。马尔托夫在一篇关于1905年革命期间的社会民主党的很有意思的论文中，提供了一些统计数字，这些数字也反映出，群众对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是漠不关心的。他指出，1905年工人的捐款，在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所有地方委员会的预算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里加的工人捐款占预算的22%；塞瓦斯托波尔，14%；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53%，比别的地方组织的比例都大。马尔托夫认为，统计数字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孟什维克没有使大批产业工人投入到运动的日常事务中来。公开集会这一接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由于警察当局的限制而无法利用。另外，该派“组织臃肿”、“等级森严”，也妨碍领导与普通成员进行接触。结果一些重大问题和政策很少在地方委员会中加以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赞同孟什维克基本目标的政治上成熟的工人，就认为积极参加地方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意义了^⑤。1905年一年之中，孟什维克的报纸对这种令人烦恼的情况非常关注，阿克雪里罗得建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打算用来作为一种打开

局面的办法。

由于群众战斗精神的影响，阿克雪里罗得的许多孟什维克同僚，一开始对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这个建议，漠然处之。他们以为现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已是微不足道，便着手促进两派合作。这赢得了列宁主义者的赞同。到1905年底，两派代表在地方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中都进行了合作。并且还达成协议，准备召开另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使两派正式重新统一。比以往多得多的工人参加了代表的选举；使孟什维克高兴的是，他们赢得了六十二个席位，而布尔什维克只有四十六席。

但是，1906年4月，当代表大会在斯得哥尔摩召开时，两派在战略和策略上出现了比预料大得多的分歧。这多半是由于1905年底革命潮流开始低落的缘故。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政府还控制住了各种反对势力。1905年夏同日本缔结和约之后，专制政府把它可靠的军队调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镇压了好几次暴动，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莫斯科苏维埃发动的一次暴动。法国贷给俄国政府以巨款，使俄国国内财政保持稳定。《十月宣言》得到了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结果反政府派不再是统一的了。到1905年11月末，连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也低落下来：在当局取缔圣彼得堡苏维埃时，群众没有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由于政治形势逆转，许多孟什维克放弃了他们1905年秋所信奉的激进主义。

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仍然坚持列宁提出的战略。列宁否认资产阶级有可能采取进步立场，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他现在把农民看作是一个革命阶级了。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一起，能组成政府来进行民主改革，安排立宪会议的选举。列宁一般都强调临时政府不应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有一次他提出，存在着立即尝试

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怀着愈来愈大的热情，敦促社会民主党人集中力量准备进行武装暴动^⑤。

既然孟什维克放弃了极端主义的立场，他们便团结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周围。在斯得哥尔摩代表大会上，阿克雪里罗得成了他们的战略的主要代言人。在一次涉及面很广的发言中，他责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正统观点，要大家提防最高纲领派的危险，重申了孟什维主义的原则。此外，他恳求代表们投票赞成参加沙皇尼古拉批准建立的议会机构杜马的选举。虽然政府授予杜马的权力，比反政府派所要求的要少得多，也没有给以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但它毕竟允许某些工种的工人参加选举。阿克雪里罗得并不认为这种安排很理想，但他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而这一步如果走得好，会导致进一步的让步（见文件6）。

列宁马上指责孟什维克，说它已落入圈套。如果工人参加选举，他们常常要被迫支持代表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因为在许多地区只有他们才是有当选希望的最进步的人。但是，据列宁看，立宪民主党会利用他们在杜马里的权力镇压革命运动。他又说，要是社会民主党支持杜马，群众就会错误地认为，民主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起来^⑥。发表这些评议后不久，列宁完全改变了主意，鼓吹参加杜马的选举。苏维埃的历史学家们承认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判断错误，但他很快就纠正了。

还在列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孟什维克已经在斯得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以六十二票对四十六票，通过了赞成参加选举的决议。这次会议还采纳了孟什维克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见文件7），它与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最后，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由七名孟什维克和三名布尔什

维克组成。党至少在形式上重新统一起来了，而且孟什维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第一次占了统治地位。

虽然列宁对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满意，但他并不真正赞同大会的决议。他保持他的组织不拆散，不久便要求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以期夺回对党的控制。由于同样原因，孟什维克也没有分散他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冲突不久便爆发了。

造成分裂的较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1906年它得到孟什维克的普遍支持。列宁认为这个建议是有害的，就同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观点一样。他攻击阿克雪里罗得的计划是“《火星报》上所有谬论中的典型”，是“胡闹，幻想……混乱的概念……学究式的迂腐”。他还说“工人党不是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俱乐部，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讨论来，讨论去，但需要的是生活和行动。”阿克雪里罗得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的确会导致机会主义的胜利，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⑧。

同时，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剥夺”或“游击活动”越来越感到苦恼。所谓“剥夺”或“游击活动”，就是武装抢劫银行或政府机构，以便为革命运动筹措资金。孟什维克认为，这种罪恶行径从道义上说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它玷污了每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荣誉。他们在斯得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使一项谴责这种游击活动的决议获得通过，但布尔什维克不予理睬。这些非法得来的钱，以及列宁的组织才能，使布尔什维克选出来参加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的代表，比孟什维克的多。另外，布尔什维克得到四十五名波兰代表和二十六名拉脱维亚代表的支持，而孟什维克总共得到五十四名崩得代表的支持^⑨。

上次代表大会上出现过的比较和平的气氛，在这次大会中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猛烈攻击阿克雪里

罗得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以它“必然会导致党的瓦解”为理由，通过了一项谴责这个建议的决议^⑩。列宁主义的多数派，与孟什维克的较温和的态度截然不同，还谴责立宪民主党背弃了革命事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大会以170票对35票的压倒优势（52人弃权），否定了游击活动和剥夺行动（见文件9）。甚至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同意这些劫掠行为。但是列宁继续违抗大会的意志，依然无视他的追随者的批评。

谁看到大会记录，谁都不能不对会议充满不现实的气氛而深为惊讶。代表们对策略讨论得非常认真，因为他们设想俄国仍然是一派革命形势。但是大会闭幕后不过两周，P·A·斯托雷平总理就发动了标志着1905年革命结束的政变。他解散了杜马，命令逮捕了几百个革命者，并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处于紧急状态。

已经回到西方的马尔托夫，听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很乐观：“命运的不停的嘲弄！在我看来，这次政变，到头来将有利于革命，因为它将大大廓清不明朗的气氛，使这个国家回到革命的起点：一小撮有特权的人与所有客观上进步的阶级的集合体相对立。”形势的这一发展将证明“我们提到〔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政纲中所描述的革命前景、我们所作的〔立宪民主党人〕还会变得‘更激进’的预言以及我们在杜马中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⑪

孟什维克这次的乐观，同以往许多次一样，是毫无根据的。俄国政府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的组织压垮了；无产阶级没有响应反抗政变的号召。前两年经济的衰退和动荡，使工人阶级普遍对政治冷漠。留在俄国的唐恩说，他甚至筹集不到足够创办一份报纸的钱。十年之后，马尔托夫确切地总结了斯托雷平镇压的后果：“在这一时刻，党的力量象用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垮了。”^⑫

1905年革命的经历，在两派明确各自的学说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两派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种，但到1907年，各自都已形成一整套独立的、对俄国未来的发展的见解。这一自我认识的过程，多少是由一种奇怪的动向所引起的：每当一派提倡一种政策，另一派不仅批评它，而且提出另一种以详尽阐述的理论原理为根据的政策来。结果，到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间的冲突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最初分裂时所没有的。

孟什维克断定，集中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不仅会招来大规模的镇压，而且也歪曲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把它改变成一个按等级制和军事路线组织起来的进行密谋活动的党了。他们还认为，鼓吹极端主义的策略势必会分裂、从而削弱反抗专制的力量。总之，虽然孟什维克经常批评中产阶级的进步人士，但他们不愿把在反对沙皇统治时可能起有力作用的这支力量一笔勾销。最后，孟什维克比以往更有决心同群众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建立大量用来启发尽可能多的工人的阶级觉悟的组织。

而列宁主义者则认为，1905至1907年事件的进程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只有高度集中的、党员经过精选的、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的党，才能在专制的俄国有效地开展活动。此外，现在他们终于相信，指望中产阶级会在反对旧制度中采取果断行动，那是靠不住的。因此，列宁主义者开始强调，在进行第一次革命，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和农民有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但孟什维克反对这些原理和策略，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必然是充满风波的。

的确，在政变之后的反动时期（1907年—1914年）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布尔

什维克坚持进行游击活动（见文件10）。1907年末，柏林警察当局抓捕了一些伪造卢布的列宁主义者，这个事件一披露，阿克雪里罗得真是大吃一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我要问：我们怎么能同他们留在一个党里？”^②然而，在彻底决裂的最后关头，孟什维克却畏缩不前。布尔什维克用非法得来的资金建立起秘密组织，这不可能不激怒他们的对手，尤其因为孟什维克的组织是乱糟糟的。

到1908年时，孟什维克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在西方，他们的领导人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提供了可作为团结中心的官方喉舌。在俄罗斯帝国出现了三个孟什维克活动中心：格鲁吉亚有个秘密组织，圣彼得堡有A·N·波特列索夫领导的知识分子小组，从1910年至1914年发行高级文化刊物《我们的曙光》；还有一批所谓的“实践家”，在政府允许存在的工会、合作社、工人教育机构和俱乐部、保险公司等组织里工作。这些实践家希望训练工人知识分子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管理工作。

同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爆发了新的思想论战。从1909年直到1914年，列宁把跟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说成是取消派，一个含义一直不明确的攻击用语。显然，他是从普列汉诺夫那儿学到这种辱骂反对者的方法的。1904年他对一个同事说，“普列汉诺夫曾对我说起过一个非议马克思主义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们先给他安上个罪名，然后才审理他的案件。’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每个试图损害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安上罪名’，即使我们随后并不去审理他的案件”。^③

列宁怀着摧垮对手的希望，指责孟什维主义从头到脚散发着取消主义的臭气。他抛出这个骂人的用语，把它的含义逐步加码。取消派“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

不定形的联盟”，他们是“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想要摧毁秘密的党组织，实际上是要摧毁整个党；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已经陷入改良主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派别”的泥坑²⁰。

这些责难都是牵强附会的。孟什维克的领导人还是相信阶级斗争观念、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确实，两派冲突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但是，只要对他们的论据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双方实际上是在继续进行1903年开始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辩论。因此，唐恩断言（见文件11），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想忠于它公开宣布的目标，那么它应该在不放弃非法的即秘密活动的情况下，强调进行合法工作。波特列索夫则彻底推翻取消主义这一指责，理由是，反革命政变一开始，党就已经瓦解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取消不取消的问题（见文件12）。

列宁认为这些见解都是异端邪说。他争辩说，正因为专制统治的俄国公开进行政治工作如此困难，党才应该首先关心增强其秘密组织，虽然他也赞成利用仍然存在着的合法机会，开展政治工作。多数的孟什维克对于应首先关心秘密工作还是合法工作，看法与列宁的相反，这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政府残酷镇压，进行合法工作的范围还是比1905年前扩大了。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一新形势来壮大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则力图使党保持由经过精选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团体的面貌。

尽管对取消主义的辩论很激烈，从1907年至1912年和解的尝试仍在进行。孟什维克领导人，象许多激进分子一样，难于相信左派会是他们面临的死敌。但是列宁决心同那些可能对他的权威和政策提出挑战的人合作。1912年，他在布拉格召开了会议，参加者都是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他们至多不过代表社会民主运动

的五分之一的人。这次会议自行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开除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党现在正式分裂了，在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激烈的竞争中，布尔什维克开始处于有利地位了。

1912年到1914年期间，几个于1905年之后创建起来的、最初曾是孟什维克核心力量的合法的工人组织投诚到列宁主义者一边。略举几例就足以说明了。1912年8月，在首都圣彼得堡最大工会——金属制造工人工会的理事会的选举中，当选的布尔什维克，远远超过孟什维克。半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全俄保险业理事会和圣彼得堡保险公司的控制权。1914年4月，在彼得堡印刷工人工会理事会选举中，当选理事的半数是布尔什维克，而大家知道，这个工会一向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到1914年夏天，有迹象表明列宁主义者已控制首都十八个工会理事会中的十四个半，莫斯科十三个工会理事会中的十个^⑤。

帝国这两大城市的工人的政治变化，显然是由于俄国城市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结果。在1910年至1914年工业发展高潮中，工业劳动力从1,793,000人增加到2,400,000人，就是说，大批年轻人从农村流入各个城市。许多新来到大城市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所鼓吹的“极端主义的目标和策略”，因为他们既缺乏通常是由于长期进行工会活动而学到的那种纪律和节制，又没有1905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选举中获胜，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比孟什维克的要广泛和有效一些。孟什维克不看重非法组织，这就把进行宣传和获得工人支持的明显的有利条件让给了列宁主义者。

因而，当第二国际执委会，社会党国际局于1914年上半年努力使敌对的两派重新统一时，列宁无意妥协，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社会党国际局打算在8月召开的国际的下一代表大会^⑥

上，正式谴责他们的不让步行为，以此给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预定的代表大会没有召开。这次战争产生了新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实际上将使分裂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战争的爆发，使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精神上受到一次创伤，对孟什维克来说，也是如此。多年来，各国党和国际都讨论过战争的起因，以及社会主义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军事冲突。讨论的结果往往只限于：谴责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发表一个含糊其词的声明，提出防止诉诸武力要采用的一些策略。唯一有效的策略好象就是总罢工了，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准备采用如此激进的办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好似坚持宗教信仰一般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在危急关头，工人阶级应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防止堕入他们认为是战争的疯狂行动。

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纪律性最强的、最受尊敬的党，作出在战争中支持德皇政府的决定，使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震惊和深感失望。德国党为自己的立场找了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德国四面受敌，他们这样做正好是保卫欧洲，反对“亚洲的野蛮人”，即反对俄国。但这种理由是模棱两可的。同样，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支持法国政府，就是保卫民主国家，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此外，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他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群众原来都是爱国的，这真是出乎意料。如果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鼓吹反战，那么他们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支持者。但是，各国都还有大批的社会主义者拒不遵循爱国主义的路线，情绪如此激昂，以致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一个国家的党，都不可能保持统一了。

孟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分成了好几派。他们在杜马里的七个代表拒不投票支持军事预算，并同五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起发表了由一批孟什维克起草的声明，抨击战争（见文件13）。大多数孟什维克同意这个声明，成了“国际主义者”，就是说，他们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冒险活动，强烈要求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给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结束战争（见文件14）。但是，国际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西伯利亚齐美尔瓦尔德派（唐恩，I.G.策烈铁里和弗拉基米尔·沃京斯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保卫俄国可以说是正当的。1917年2月，俄国成了民主国家之后，这一论点便成为革命的护国主义学说即孟什维克党的官方政策的主要特点了。

波特列索夫领导的运动的右翼，鼓吹一种比较巧妙的对待战争的立场（见文件15）。那就是赞成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而不赞成在专制的俄国实行“国内休战”（中止阶级斗争）。由于俄国的失败更明显地暴露了政府的无能，右翼在几个著名的政论家和工人知识分子的领袖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国家体制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中几乎没有人提出无条件地支持政府进行战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列宁关于战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最好战的立场。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原则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使本国战败；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为害最少的”是沙皇政府败北。另外，列宁极力主张同第二国际决裂，因为它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战争，这就说明了它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侵蚀。最后，他还鼓吹变国际冲突为国内战争。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待战争的不同立场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是到1917年专制统治崩溃之后才看清楚。这时，这两个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俄

国事态的发展。

1917年的革命

1917年初爆发的这场革命，使孟什维克和其他人一样，都大吃一惊。好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谈论革命，还说是在组织群众准备革命。但是，据一位观察家说，在1917年初，“没有一个政党准备迎接这次伟大事变”。^②没有一个人看出了人民的绝望情绪已如此严重。三年战争中，这个国家接连惨败在德国人的手下，无数人丧生，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这些灾难都可直接归咎于沙皇当局的决策和无能。保守的杜马代表V·V·舒尔金确切地描绘了首都彼得格勒的情形：“麻烦的是，在那个大城市里，竟连区区几百个对政府抱好感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政府对自己也没有好感。没有一个大臣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③一个如此缺乏公众信任和缺乏自信政府，面临着积极的、大规模的反抗，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3月8日，彼得格勒的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召开会议和发表演说，来庆祝国际妇女节。谁也没有布置要进行战斗性的行动，但是面包经常短缺，激起了纺织厂的一些不满的女工举行罢工，并要求其他工人给予支持。第一天，大约90,000名罢工者走上街头，二十四小时之内，人数增加了一倍。他们的标语牌上既写着政治性的口号，也写着经济性的口号：“打倒专制政府！”“打倒战争！”“我们要面包！”到第三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就有240,000人了，城市实际上陷入瘫痪。最终是军队的态度使得游行示威的矛头对准了政府。起初，士兵们还半心半意地试图驱散人群，到了第四天，他们当中许多厌战的人便拒绝袭击自己的同胞，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了。到了3月12日，局势明

朗了。政府的权力已经崩溃；沙皇尼古拉起初并不把彼得格勒骚动的报告放在心上，这时只好退位，别无他策。四天之内，这次自发的革命便以死伤1,315人的代价，推翻了一个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帝国。

形式上，政权转到了温和的自由派乔治·E·李沃夫公爵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新政府宣布的纲领规定，人人都享有公民自由权和法律平等权，并准备民主选举立宪会议来商讨决定俄国的政治前途。但是，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只能靠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慈悲”来进行统治。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随随便便选举出来的，居然在随后立即出现的许多地方苏维埃中享有最高威信，而且还是群众对之效忠和顺从的唯一机构。实际上，俄国存在着两个政权的体制——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它。临时政府的职责是处理国家事务，但有职无权，苏维埃倒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却没有负起责任来。^④这种体制势必产生冲突、混乱和低效率。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战争，经济崩溃，政治改革——一个也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激进的农民党）联合统治着。在二、三千名代表中，大多数人并不正式属于哪个党派，但他们倾向于服从这两个党的领导。3月9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组成独立的“派别”；可是，支持他们的代表不超过四十人。布尔什维克1914年以来在圣彼得堡工人阶级中实力削弱，是由于战争期间政府逮捕和流放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破坏了列宁主义者的大批秘密组织的缘故。^⑤由于孟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得更好，经验更丰富，党内有才能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有策烈铁里、唐恩和尼古拉·奇赫伊泽）也更多，所以，孟什维克成了苏维埃中能够左右苏维埃的那个联盟的“大伙伴”，他们的政策对1917年事件的进

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政策是由控制着党的革命护国主义者，即中间派制定的。他们确信俄国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权。还有两点考虑增强了他们不去掌权的决心：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主义会分裂进步势力，象1905年那样，又怕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因此，孟什维克表示支持临时政府，条件是临时政府不得放弃已取得的民主权利（见文件16）。最重要的是，孟什维克赞成继续战争以保护革命，反对专制德国（见文件17、18、20），尽管他们也敦促政府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谋求迅速议和。他们正确地意识到，没有和平，要解决俄国国内问题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他们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建议证明是根本不现实的。第一，临时政府对议和不怎么感兴趣，主要因为临时政府中有些最有威望的成员，还希望在战胜“同盟国”以后吞并君士坦丁堡。其次，国际起不了调停机构的作用：不但国际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好几个国家（美、法、英）不准许他们的公民参加社会主义者为谋求在妥协基础上的和平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大会。

革命的护国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必须对付两方面的批评。波特列索夫领导的一小部分右派，比中间派更强调要积极地吧战争打下去（见文件22）。更严重的挑战来自左派，即孟什维克国际派。5月份，国际派反对党的一项决定，即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小伙伴身分参加内阁的决定。7月，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又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立“民主主义的政府”，即以在苏维埃中有代表的所有各党派为基础来建立政府，使俄国退出战争并监督立宪会议的选举（见文件23、23a）。

马尔托夫是在政府充分暴露出它的软弱的时候提出这个激进

的建议的。7月16日，士兵、水手和工人，并没有受任何政党的煽动，就在彼得格勒造反，要求由苏维埃掌权。只是由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示威者的要求，才使政权免于崩溃。游行和零星打枪，折腾了两天，毫无结果，群众不耐烦了，便四散回家^⑤。大约就在同时，四个立宪民主党的部长辞职，对政府允许所有乌克兰军队听从乌克兰Rada（地方自治会）的命令的政策表示抗议。马尔托夫认为，既然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不再行使权力，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继续留在由并不正式代表重要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部长们控制的联合政府中，已毫无意义，现在该成立“民主主义的政府”了。

如果当时孟什维克重视马尔托夫的劝告，他们很可能就掌了权，并且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了。群众渴望发生彻底变革，一个工人对社会革命党农业部长维克多·切尔诺夫说的一段话，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掌权吧，狗日的，给你权你就掌。”^⑥更重要的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时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是事实上的政府：它镇压骚乱，恢复秩序，把军队召回彼得格勒，接受大多数卫戍部队的效忠……”^⑦但是，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仍然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禁令所束缚（见文件21）。

同时，临时政府的immobilisme* 导致其威信逐渐下降。由于全国存在着骚乱的局面，临时政府推迟选举立宪会议，这是除苏维埃之外可能建立起民众支持的政权的一个机构。到了夏天，农民骚动遍及各地，并经常同夺地一道出现；但是，政府既不能制止暴力行动，又不能对制定土地法作出最后决议。它也不能阻止地方苏维埃夺取本地区的控制权，阻止工人接管工厂，阻止少数民族宣布自治或独立。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强有力的媾和政策。由于俄军愈来愈不愿打仗，开小差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

*法语，意即保守。

程度。1917年秋天，俄国处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在苏维埃和政府中都占极重要地位的孟什维克，不能继续得到群众的信任，也就不足为怪了。有几个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6月，孟什维克选出248名代表出席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布尔什维克只设法选出了105名。但是，在10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代表只有70到80人，布尔什维克却有300人。革命初期，彼得格勒最大的孟什维克组织，成员达10,000人之多；但是到了10月，它实际上已不存在了。那时一个孟什维克这样写道：“党费没人交了，《工人报》〔孟什维克的报纸〕的发行量大大减少，上次全市代表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没有开成……。〔最近〕莫斯科区选举杜马，560个席位中孟什维克只赢得了25个。小组和个人退党的事，天天发生。”当11月终于选举制宪会议时，孟什维克只有140万张票，而社会革命党人有1,600万张票，布尔什维克有980万张票。

与孟什维克不同，列宁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限制。4月，他一到彼得格勒，就号召前线士兵同敌兵联欢，以取代政府的护国主义立场，还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一纲领受到孟什维克的强烈谴责（见文件19）。布尔什维克党几经踌躇，才于5月采纳了他的纲领和战略部署。随着动乱的蔓延，列宁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对每个反抗当局的人的要求，几乎一概给予支持。他赞成工人们接管工厂，而这种行动无异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嘲弄的那种工联主义运动。他赞成农民占领土地，这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是背道而驰的。他无视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集中制和等级制的原则，对掌了权的地方苏维埃大加赞扬。现在孟什维克虽然可以谴责列宁抛弃了一向信仰的主义而赢得精神胜利，但是列宁倒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党压倒了它的对手，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9月，临时政府的威信和声望落到了最低点。多亏彼得格勒苏维埃自发地行动起来，打垮了反革命势力，临时政府才侥幸度过了一次由L·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的右派政变。虽然“七月的日子”之后有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捕，但是列宁的党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有助于提高它在人民中的威望。另外，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威胁的时期，布尔什维克获准创建武装工人民兵，这支力量后来成了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军队的核心。后来，当时的内阁总理A·克伦斯基没有采取措施惩罚叛乱分子，许多人就相信了广泛流传着的消息，说有几个部长同情科尔尼洛夫。9月中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明显地左倾：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这两个城市的苏维埃里赢得了多数。列宁认为，这表明进攻的时刻已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稍经敦促，就同意准备武装起义。11月7日发动了政变。正如列宁几个月后指出的那样，这次夺权“轻而易举”。

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11月中旬，虽然马尔托夫及其国际主义派占了优势，孟什维克党左倾了，但该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一致抱敌对态度（见文件24）。马尔托夫在唐恩等原中间派的支持下，说服孟什维克党倡议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各党联合政府而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将包括从人民社会主义党（温和的农民党）到布尔什维克的所有社会主义党（见文件25）。马尔托夫提出这个建议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既要避免由布尔什维克一党统治，又要避免再回到临时政府的immobilisme，担心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列宁主义者，再者，布尔什维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势力反对一党夺权。马尔托夫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迫使列宁同意他的方案。孟什维克的建议无非就是提出了“停止政治恐怖”这个绝对条件，布尔什

维克对此稍事商讨，就明确加以拒绝^⑤。很可能列宁只是要找个借口使谈判破裂。他没有得到他的激进阵营中的对手的帮助就夺得了政权，现在他也决心不和他们共同掌权。

孟什维克党各派对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俄国的前途都感到悲观失望。例如，阿克雪里罗得确信，历史一定会惩罚违背它的规律、在还没有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夺取政权的人。因此，他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短命的；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革命是否能挽救，俄国是否能免于崩溃，很难料定。”^⑥马尔托夫坚信，“虽然工人群众支持列宁，但是他的政权越来越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恐怖政权，而成为由武装士兵、‘赤卫队’和水手等各种各样的群众拼凑而成的sans-culottes（激进主义）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管理这个国家的尝试是必定要失败的^⑦。

在马尔托夫的领导下，俄国孟什维克采取了做为反对党的战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或有害的政策。因此，他们反对列宁于1918年初解散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列宁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设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级的民主原则的形式”^⑧（见文件27）。同样，他们谴责布列斯特条约，这一条约虽然结束了对德战争，但使俄国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七的耕地，百分之三十三的制造业（见文件28）。他们痛斥布尔什维克实行政治恐怖和压制出版自由，后来，于1919年，他们却又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应享有这一自由。他们还批判了旨在使政府严格控制经济而不顾人民死活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见文件26、29）。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显然在各地都已一败涂地，政府采用的竟然是列宁主义者1918和1919年曾百般辱骂过的孟什维克经济纲领，这是不无讽刺意义的。

孟什维克敢于提出批评，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气，因为他们

也是镇压的对象。1917年12月1日，政府查禁了他们的机关报。1918年6月，他们被开除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又被从俄国各地苏维埃中赶出来。1918年末，当局取消了一些禁令；但是，孟什维克充其量也不过处于一种半合法的地位而已。

孟什维克虽然仍不放弃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敌对态度稍有变化。他们认识到，他们已处于令人痛苦的两难困境之中：必须在列宁主义者的统治和反革命势力控制的政权之间进行选择。而到1918年中期，反革命势力已经集结了一支难以对付的军队。1918年春夏两季，当英、法、日、美等国派军队进入俄国之后，孟什维克比以往更确信，他们对国家所面临的两种前途的估计是正确的。当然，西方干涉者声称，他们是为了阻止德国人得到重要的战争物资，为了重开东方战线，但是外国军队不久就帮助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了。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列宁主义者正在保卫俄国，反对可鄙的、无疑是想复辟旧制度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孟什维克宁肯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至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因而——他们以为——还可以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马尔托夫及其同僚开始谈论“校正”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使它沿着更为人道和现实的轨道发展，等等。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孟什维克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期望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会转移到柏林，期望这会对列宁主义者产生有益的影响（见文件30）。

但是，甚至在德国革命已被证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仍然给予有力支持（见文件31）。这种态度必然促使孟什维克改变其对列宁的革命的评价。政府的继续存在使马尔托夫得出结论，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必经的历史阶段（见文件32、35）。他的这种看法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培

养出来的人是有感染力的。在1920年3—4月间的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把这种推论引向极端，预言整个欧洲的发展过程在某些重要方面会同俄国刚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见文件33）。

同时，孟什维克改变了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见文件34）。现在，他们拒绝参与一切恢复“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尝试，尽管他们也拒绝参加第三（共产）国际。因为他们不同意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1921年2月，孟什维克加入了所谓的“维也纳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通过的纲领大体上体现了孟什维克的政治原则。它的主要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的党，但是它从未发展成为重要的运动。1923年该组织解散，原有成员同第二国际的残余分子一起，创建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

1917至1920年孟什维克思想的转变是不好解释的。当然，它对反革命的仇恨和恐惧是个重要原因。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原因，——也就是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经历了一场据说是工人阶级的、但自己并未参加的革命的国家里所具有的心情。1920年初，唐恩从莫斯科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生动地反映了孟什维克的这种心情。唐恩说党的情况“很不妙”。孟什维克被剥夺了出版、集会和建立组织的自由，没有资金，“受到残酷迫害”，因而无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唐恩觉得他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接受共产主义是不足为怪的。在他看来，背叛的绝不仅仅是“有野心的人”，他们也不单单是为“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或表面的辉煌成就”所吸引。最重要的是，“想开展活动的热望”。在驱使着他们。唐恩总结说，孟什维克组织居然还能顶住这种强烈的“热望”而存在下来，真是很不寻常的了。他甚至认为，孟什维克壮大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可能会带来一些好

处，因为他原来的同志可能会对列宁的政策提出怀疑，从而将有助于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造成危机^⑥。虽然唐恩的结论可以争论，但他对俄国许多孟什维克的心情的描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整个孟什维克党对布尔什维主义逐渐怀有好感。

俄国少数孟什维克抵制这种倾向，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而现在仍侨居西方的阿克雪里罗得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尔什维克政变时他正在斯德哥尔摩。当时，孟什维克党让他担任党在国外的代表。由于从1918至1920年，他无法与他的同事经常进行联系，他以为1917年末期他们之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是，他以党的名义，发起了一个运动，动员西方社会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阿克雪里罗得拒绝同新统治者进行任何妥协，但是他也不支持反革命分子和同盟国的干涉者。他所作的是敦促西方社会主义者派一个调查团到俄国去考察那里的情况（见文件36）。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制度是一种进行镇压的政府形式。如果这种看法能得到公众的证实，那么列宁主义者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被迫缓和他们的政策，或者公然反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选择前者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选择后者就会损害布尔什维克的道义地位，并使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得到鼓励。

阿克雪里罗得呼吁西方社会主义者对俄国事务“从道义上和政治上进行干涉”，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幻想。但是不要忘记，他当初提出这个建议是在1918年夏天，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地位还是不巩固的。德国人迫使他们签订的苛刻的和约，在国内、甚至在列宁的党内，都有很多人反对。反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同盟国的干涉也是如此，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罢了。经济继续恶化，而军事共产主义只能使已经混乱的局面更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也担心，如果西方社会主义者不给予帮助，他们的政

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①。在这种情况下，阿克雪里罗得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施加影响的希望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他为他的建议争取支持的尝试遇到重重障碍。最初，在1918年年中，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的计划，因为德国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要加剧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混乱”，从而使俄国在西方战事正酣时仍处于孱弱状态，阿克雪里罗得的计划与他们政府的这种政策是相抵触的。另外，社会主义者也普遍担心，怕批评布尔什维克会被理解为对反动派的援助和鼓舞。有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并不接受列宁主义，但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革命还是钦佩的，因为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渴望着的革命。尽管如此，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于1919年2月在波恩集会。会上经过多次争吵之后，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到俄国去。调查团根本没有完成使命，因为协约国不给代表们签发护照。阿克雪里罗得认为，协约国政府害怕调查团可能揭露西方在俄国的代理人和军队的“肆无忌惮的反动行为”，还担心调查者可能带回一些有关俄国现状的热情洋溢的报告，从而扩大布尔什维克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他的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西方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以促使他们政府改变决定，阿克雪里罗得因而深感失望。

1920年9月，马尔托夫到了西方。此后不久，孟什维克这两位领导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得为了使运动回到他认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轨道，在党报（当时在西方发行）上发表了一封长信，对孟什维克官方提出了批评（见文件37）。他不能同意领导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与西方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观点，尤其不能同意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观点。马尔托夫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列宁主义者进行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如果这个政府被摧毁，那么

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任何政府，对俄国会更不利。“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当布尔什维主义保卫革命的真正果实（及其可能被废除的专政），反对反革命时，我们公开地、无条件地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毫不犹豫地对无产阶级说：面对〔P·I·〕弗兰格尔和〔P·〕斯图卢威的‘民主’，〔大卫〕劳合一乔治或〔费迪南〕福煦元帅的‘民主’，你应该支持‘苏维埃政权’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带引号的暴政，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来推理，不可能得出任何其他结论。”^⑥ 马尔托夫强调，尽管他有这些看法，但绝不是新政府的辩护士。

阿克雪里罗得认为这样推理就完全错了。他也反对劳合一乔治对俄国进行干涉的政策，但他仍然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列宁主义的专制制度比英国制度优越的观点。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非得在共产主义和弗兰格尔领导的反革命政府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不可。正是为了避免这种选择，他才提出了社会主义者进行干预的计划，而马尔托夫对这种干预的可能性（他以前是同意的）漠不关心，尤其使阿克雪里罗得很伤心。这说明马尔托夫宁肯不对苏维埃政府施加任何压力，也不准备同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最后，两人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各自对传统的、自由民主的重视程度上。阿克雪里罗得认为这种民主极其重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他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马尔托夫虽也并不轻视民主，但是正如他对劳合一乔治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他对民主远不及阿克雪里罗得那样重视。

马尔托夫同阿克雪里罗得之间的辩论，把孟什维主义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设想和态度公诸于世了。这场辩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勾画了就布尔什维克革命进行的激烈辩论的大致轮廓，它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年，而且仍然吸引着关心当前政治的人们。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尔托夫的看法在孟什维克队伍中是占上风的，但是这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了，因为1921年列宁决定取缔这个派别。孟什维克曾预言，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会毁灭俄国经济。由于他们的话说准了，前两年他们的名望和影响在工会里急剧增长，布尔什维克对此曾焦虑不安。后来，于1921年，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如列昂纳德·夏皮罗说的那样：“让……〔孟什维克〕享有自由，即使只享有象他们在1919和1920年那样的有限的政治自由，就会引起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迄今为止一直失策的党，为什么不应该把政权让给其〔经济〕政策目前正被采用的党呢？”^④几百名孟什维克，包括全体中央委员，都被逮捕了。1922年初，在这次大规模镇压一年之后，一些犯人进行绝食，于是政府允许十名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唐恩）移居国外。但是，其他许多勇气全被摧毁了的人，认为有责任为重建国家出力，答应为政府服务。有几个人（G·V·契切林、I·M·迈斯基、A·S·马丁诺夫、A·A·特罗扬诺夫斯基、A·维辛斯基）以后实际上在苏维埃国家里身居要职。孟什维克的亲密同盟者崩得分子的遭遇也一样。他们中间少数人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崩得官方反对列宁主义者，因而这个派别遭到了镇压。到1921年底，崩得在俄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那时，崩得在波兰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党，一直活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2年1月选举莫斯科苏维埃时，孟什维克党经过努力才在两千个代表中选上一个代表，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孟什维主义的骤然衰落。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还存在一些秘密的小团体，但是孟什维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群众运动了。

大多数流亡者定居柏林，在马尔托夫的指导下创办了《社会主义通报》，这是当时西方获得俄国情况的最可靠的来源。孟什维克通过对苏联书刊的仔细研究，了解到俄国的许多情况。但最重

要的是，他们偶尔能接触到因公出访西方的苏联官员。这些人^透露了一些俄国发展的详情，这在书刊中是找不到的。甚至今天从事研究苏联早期历史的学者，为了获得一些真实的报道和对事态的敏锐分析，也仍求助于《社会主义通报》。

1923年4月马尔托夫去世之后，该报仍然信守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统治制度的分析。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也不过是马尔托夫的继承者、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唐恩，对苏联未来的发展道路看得更乐观一些罢了。早在1922年，他就说：“我相信〔流亡者〕旅居国外的日子不会太长。当前这个可恶的政权从上到下矛盾重重，难于比较长久地维持目前的形势了”。布尔什维克不是被迫向右转到波拿巴主义，就是向左转到民主主义。即使是一个波拿巴分子当权，他也会被迫采取“多少”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措施的。“总之”，唐恩总结道，“布尔什维克不是被迫不再执政，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再是‘共产主义’了”^⑤。

但是，流放的孟什维克中的少数右翼，不同意这种乐观主义观点。实际上，他们认为在苏维埃的试验中没有什么可以弥补其缺点的因素。结果，孟什维克运动内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又剑拔弩张了。右翼想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他们的观点，但遇到了重重困难，因而火气十足。1925年，他们的一个代言人刻薄地指责唐恩及其支持者“实际上沿袭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列宁领导的《火星报》二十五年前就采用的方法。党内不允许存在对立面……反对派必须永远保持沉默。”^⑥这种谴责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领导人发了慈悲，少数派偶尔也可以在党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希特勒上台之后，孟什维克纷纷移居巴黎。到1940年，大多数又移居美国，在那里出版《社会主义通报》，直到1965年。同时，他们的思想逐渐右倾。他们仍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

是，大多数人现在开始全面地抨击苏维埃极权主义了。也有些重大的例外情况。例如，1946年，显然受到俄国反纳粹主义斗争影响的唐恩这样说：“随着内忧外患的消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主化不久将越来越成为历史的必然”。^④列宁夺取政权这么多年之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如此不同，这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份含混不清的遗产。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

孟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这个位于外高加索西部具有两百万人口的地区的兴衰史极不寻常，值得单独论述。孟什维主义只在格鲁吉亚才发展成群众运动，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也正是在这里，孟什维克统治过从苏俄脱离出来的一个独立国家。由于他们采取了分裂的方针，请求协约国派兵到他们国家来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可能进攻，俄国本部的孟什维克当时实际上开除了他们的这些同事。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正式宣布，“格鲁吉亚的同志们”的政策排除了我们同他们保持任何组织上的联系的可能^⑤。因此，可以认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现在已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的独立政党了^⑥。

尽管如此，从1903至1917年，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仍然是全俄孟什维克运动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提伊拉克利·策烈铁里、诺阿赫·饶尔丹尼亚、尼古拉·奇赫伊泽、阿卡基·奇亨克里这么几个人，就足以说明。他们关心的都是全国的政治，而不是地方事务。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很少注意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而且，谁也没有鼓吹过分离主义。外高加索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重要理论家饶尔丹尼亚始终拒绝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空想。他相信，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民主化，格鲁吉亚行将得到足够的自治权，实现这个民族所渴望的一

切自我表现。191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这一立场稍有改变，他们开始主张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实行自治，但仍一如既往，对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目标忠心耿耿。

不过，仔细研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在1917年前那个时代的策略和建议，就会发现甚至在那时候，这一派就稍微背离了孟什维克官方的纲领。如果考虑到格鲁吉亚的特殊情况，对此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格鲁吉亚大都是山地，这个地区的农民比起帝国其他地区的农民来，更苦于土地不足。例如，在库塔伊斯省，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多不过十一英亩，靠这小块土地，仅够勉强糊口。另外，格鲁吉亚还向农民征收一些俄罗斯本土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取消了的税款。无怪乎农民往往采取一些特别激烈的行动。1902年开始的骚动持续了好几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达到高潮，当时在许多地方，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赶走了地方官吏，行使原官吏的部分行政职务。农民们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自己占有土地，这一愿望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对农民的这种迫切要求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农村，而不是来自城市。他们并不正式反对党关于土地“公有”的号召，而是不理会纲领的这一条款，用土地私有的主张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实用主义，他们赢得了一大批可靠的追随者，其中有农民也有工人。他们的俄罗斯同事倒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未能管辖格鲁吉亚。因为孟什维克控制着那里的苏维埃，而且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立了政府，并于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这又一次表现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比他们的俄罗斯同志更具有灵活性。他们在两年半当中努力去实现他们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虽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要去适应形势的要

求。

对这个新国家说来，当务之急是安全问题：存在着共产党人从内部进行颠覆的非常现实的危险，还存在着布尔什维克军队和白军进犯的威胁。孟什维克政府于1918年2月宣布共产党非法，来对付第一种危险；它容忍德国军队留驻在自己的国土上保护他们，以防止外部的进攻，以此来对付第二种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人撤走后，格鲁吉亚人欢迎英国军队也是出于这个理由。这些并不是轻易作出的决定（特别考虑到孟什维克曾正式谴责一切外国干涉），而是遵循共和国总统饶尔丹尼亚的座右铭行事的必然结果。他的座右铭是：“宁要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不要东方的狂热分子”。^⑩

孟什维克的国内纲领有助于在国内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建立了民主政府，而且在1919年初的选举中，赢得了国民议会130个席位的105个。他们着手处理使人烦恼的土地问题，没收四十英亩以上的私有地产，把这些土地（连同沙皇皇室、帝国政府和教堂的地产）租给贫苦农民。1919年之后，农民可以用极低的象征性价格购买土地。另外，孟什维克政府把主要工业和交通工具收归国有，因而1920年大约百分之九十的非农业工人，成为国营企业或合作企业的工人。

由于存在着外敌侵犯的危险，格鲁吉亚共和国不得不建立起一支军队，从国家微薄的总收入中抽出大得不相称的一部分钱来支付军费。国民卫队，即志愿民兵，成为军队的核心，并且进行民主管理：军官由选举产生，定期召开士兵代表大会，参与作出决定。还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常规军，紧急状态时约可出动五万人。

孟什维克管理国家颇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党组织有一个广泛的地方组织网，协助管理国家和执行政府的指令。此

外，政府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很得民心，这使得它比起其它独立了后又共产党人所征服的国家来，政治上较为稳定。但是，格鲁吉亚是个贫穷的小国，一旦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进攻这个国家，它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起初，共产党人集中精力进行反对白军和外国军队的斗争，顾不上对格鲁吉亚进行坚决的打击。事实上，1920年5月，列宁的政权担心同波兰的战争迫在眉睫，甚至还同意“无保留地”承认“格鲁吉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⑤根据协议的一条秘密条款，格鲁吉亚政府答应释放1919年11月发生未遂政变后在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孟什维克还承认了共产党是合法的，可是，这个党随即开始了反政府的煽动工作。1921年初，莫斯科号召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进行暴动，还命令红军开进这个国家，援助叛乱者。当孟什维克领导人试图同莫斯科共产党的统治者就入侵问题进行讨论时，后者却声称对苏维埃进犯一事毫无所知。虽然格鲁吉亚人英勇奋战，但红军在一个月左右就占领了格鲁吉亚全境。这标志着孟什维克治理国家的唯一尝试结束了。

结 束 语

前面所叙述的孟什维克内部的思想斗争以及孟什维克政策的曲折发展过程，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孟什维主义能看作是一个具有一整套观点明确的学说的运动吗？对此作武断的回答会把人引入歧途。但是，如果我们把孟什维主义看作是一种思想信仰，而不是一种严格的、有条理的学说，我们就能看出，孟什维克党把三条原则看成是它政治观点的主要特征，虽然偶尔也有偏离。第一，孟什维克坚决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培养出一支独立的、有政治觉悟的、能参加管理党务和国家事务的工人阶级队伍。第二，他们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应该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

出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完成其发展过程之前，无产阶级不应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第三点较难捉摸和掌握，但在区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时是重要的，即孟什维克关心政治的道德内容。他们抵制那种认为不存在一般的道德准则，认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行动本身就合乎道德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孟什维克思想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在1917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孟什维克拒不夺取政权确有几个理由：怕这种行动会促使许多人转到在国内仍然是潜在的强大力量的反革命和保守派方面去；不愿做任何事情来进一步削弱正从事反对专制德国的俄国；认为自己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人否认，还有一条，即孟什维克死守教条，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扔不开党一贯信守的原则，即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后，经过漫长岁月才能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到列宁夺取了政权，到俄国的孟什维克对新政权的敌意稍有缓和时，他们也不放弃党的这几条原则。他们并没有明确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继续号召要使苏维埃民主化，谴责在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是空想，并且谴责列宁的恐怖统治，坚持政治要受道德约束的原则。

孟什维克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信仰，这种品格确实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但是，他们的学说有严重缺陷，孟什维克运动因此而衰落下去，终于消声匿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不发达的俄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而自己不想去夺取政权，这种见解在理论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要是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参加的话，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那么期望无产阶级把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压在心底，难道合理吗？可曾有过什么阶级为革命出了力，然后自愿退让，让别的阶级去获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实？早在1906年，就有个工人

对孟什维克的策略表示不满，他这样说：“尤里〔加尔维〕同志在这儿告诉我们，工人代表大会是保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自主的最好途径；否则，我们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就会当炮灰。那么我要问：这种保障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地去干资产阶级革命？要我们流两次血——一次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次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合理吗？不，同志们，党纲中就找不到〔当然找不到〕这一条；不过，如果我们工人要流血，那只为自由和社会主义流一次血。”^①1917年，列宁看出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因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成功地把大批工人吸引到他的党内来了。

列宁意识到为孟什维克所忽视的另一个因素的意义，意识到仍然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的农民具有革命潜力。他主张采取一种能吸引农民的措施——夺取土地，因而争得农民在政治上的中立（甚至支持）。列宁的这一策略稍作修改后，已为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采用。

也许孟什维克的重大疏忽，就是他们对于落后国家的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估计不足。当然，俄国政府的崩溃，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这一发展过程是孟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不过，孟什维克呆板的教条主义使他们对战略和策略不作任何调整，否则或许能避免不可抗拒的命运，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不懂得与列宁这种随机应变、不讲道德的人竞争，讲原则的人是没有得胜希望的。

注 释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

275页。

- ② 译文引自 J·L·H·基普：《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牛津，1963年，第89页。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 ③ 伊斯雷尔·格茨勒：《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剑桥大学，1967年，第77—78页。
- ④ P·A·加尔维：《P·B·阿克雪里罗得和孟什维克》，载《社会主义通报》第15—16期，1925年8月18日，第11页。
- ⑤ 尼古拉·瓦连京诺夫：《与列宁的会见》，保罗·罗斯塔和布赖恩·皮尔斯翻译，伦敦，1968年，第115、120页。
- ⑥ 《列宁全集》第三版，莫斯科，1926—37年，第28卷第320页。参见中文版第34卷第214—215页。
- ⑦ 统计数字引自伊斯雷尔·格茨勒：《孟什维克》，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6期（1967年11—12月），第20页。对两派社会成分材料的详细分析，见达维·莱恩：《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对俄国1898—1907年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和历史分析》一书，阿森，1969年，尤其见第11—51页。
- ⑧ 理查德·派普斯：《司徒卢威：自由资产阶级左翼（1870—1905）》，坎布里奇，1970年，第369页。
- ⑨ 《列宁全集》第7卷（第三版），第5—20页。参见中文版第7卷第488—507页。
- ⑩ 苏维埃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五百人中选代表一名。起初苏维埃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不久就变成政治机构了。它不仅领导革命运动，而且也是无产阶级自治政府的机构。1917年时，布尔什维克把各地出现的苏维埃看作是国家政权机构。
- ⑪ 详细情况见前引 I·格茨勒著《马尔托夫》一书第105—109页。
- ⑫ F·唐恩给卡尔·考茨基的信（1905年11月9日），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考茨基档案；F·唐恩给维克多·阿德勒的信（1905年11月25日），维也纳，工人运动史协会，弗里德利希和维克多·阿德勒档案。
- ⑬ 《P·B·阿克雪里罗得论社会民主党任务》，载《同志报》第153期，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 ⑭ 对这些数字的详细分析见前引基普所著书第288页。
- ⑮ 关于孟什维克地方组织的弱点,见:马尔托夫:《1905—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见L·马尔托夫、P·马斯洛夫、A·波特列索夫编:《十九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三卷,圣彼得堡,1914年,第569—570页。
- 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1—125页。
- 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82—285页。
- ⑱ L·加米涅夫编:《列宁文集》(莫斯科,1924—1938年)第5卷,第386—389页。《列宁全集》第三版第30卷第179页。
- ⑲ 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伦敦,1960年,第95—96页。
- 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63年,第612页。
- ㉑ L·马尔托夫给P·B·阿克雪里罗得的信(1907年6月26日),见F·唐恩、B·I·尼古拉耶夫斯基、L·蔡德尔鲍姆·唐恩编:《P·B·阿克雪里罗得和L·马尔托夫通信集(1901—1916)》,柏林,1924年,第163页。
- ㉒ L·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西奥多·唐恩:《1918年之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26年,第231页。
- ㉓ P·B·阿克雪里罗得给马尔托夫的信(1907年12月7日),见注㉑所引书第175页。
- ㉔ 前引瓦连京诺夫所著书第182页。
- ㉕ 有关列宁对取消派的论述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22页,397—419页;第16卷第1页,第17—51页、259—262页;第17卷第208—211页;第18卷第163—175页、192—210页;第20卷第458—491页。
- ㉖ 本段和下段统计数字和说明,均引自利奥波德·海姆逊:《1905—1917年俄国城市的社会稳定性问题》,载《斯拉夫评论》第23期,1964年

12月，第630—637页。

- ②7 前引伦纳德·夏皮罗所著书第137—140页。
- ②8 雷克斯·A·韦德：《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和西伯利亚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载《现代史杂志》第39期，1967年12月，第425—431页。
- ②9 引自乔尔·卡迈克尔：《俄国革命简史》，纽约，1964年，第31页。
- ③0 V·V·舒尔金：《那些日子》，见F·A·戈尔德编：《俄国史文献集（1914—1917）》，纽约，1927年，第258页。
- ③1 奥斯卡·安韦勒：《1905—1921年俄国的议会运动》（莱顿，1958年）第125—126页；另见前引J·卡迈克尔所著书第49—56页。
- ③2 前引奥斯卡·安韦勒所著书第136页。
- ③3 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革命（1917—1921）》，（第五次印刷），纽约，1960年；第1卷第166—177页。
- ③4 见前引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6页。
- ③5 同上，第26页。
- ③6 统计数字引自R·格里戈里耶夫：《孟什维主义的解体》，载《新生活报》第140期，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4页。
- ③7 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7页。
- ③8 P·B·阿克雪里罗得给考茨基的信，没有日期，约为1918年初，未分类，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
- ③9 L·马尔托夫给P·B阿克雪里罗得的信（1917年12月1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出版。
- ④0 引自E·H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51—1961，第一卷，第114页。
- ④1 F·唐给P·B·阿克雪里罗得的信（1920年1月31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胡佛研究所出版。
- ④2 列昂·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自传的尝试》，纽约，1931年，第342页，V·I·列宁：《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2页。参见中文版第27卷第82

页。

- ④ L·马尔托夫：《有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信件》，载《社会主义通报》第8期(1921年5月20日)第3—6页。弗兰格尔将军是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司令官；彼得·司徒卢威是自由派运动的领导人，内战期间任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政府的外交部长；劳合一乔治是英国1916—1922年期间的首相；福熙是法国将领，1918年是同盟国军队最高司令。
- ⑤ 伦纳德·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起源》，伦敦，1955年，第204页。
- ⑥ L·O·唐恩和F·J·唐恩1922年2月16日给P·B·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胡佛研究所出版。
- ⑦ P·A·加尔维给K·考茨基的信(1925年5月25日)，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考茨基档案。
- ⑧ 西奥多·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乔尔·卡迈克尔编辑并翻译，纽约，1964年，第438页。
- 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报(1918年12月17日—1919年1月1日)》(决议)，莫斯科，1919年，第27页。
- ⑩ 我对格鲁吉亚孟什维主义的考察，大都根据理查德·派普斯的出色论述。见《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年)》，坎布里奇，1964年修订版，第17—18, 210—214, 227—228, 234—241页。另参见格列戈里·乌拉塔泽：《一个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斯坦福，1968年；W·S·沃京斯基：《民主的格鲁吉亚》，巴黎，1921年；K·扎列夫斯基：《民族主义运动》，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4卷第2部分，圣彼得堡，1911年，第222—227页；谱阿赫·饶尔丹尼亚：《我的一生》，斯坦福，1968年。
- ⑪ 前引钱伯林所著书，第二卷第409页。
- ⑫ 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第228页。
- ⑬ P·A·加尔维：《回忆录，1906年于彼得堡》，纽约，1961年，第110页。

第一部分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在1903年7月的最后两天和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57个俄国革命者代表着至多不过几千名拥护者，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集会，要把26个小组联合成社会民主党。这次所谓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通过党纲、选举党的委员会，并决定有关策略和组织的一系列问题。除三人外，所有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擅长于对理论细节进行辩论，却不善于妥协让步和把握实际问题。尽管如此，当党员资格这个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引起激烈争论，终于导致分裂时，大多数代表都感到惊异。文件1、1a表明，在关于党员的两个决议案中，措词的差别无足轻重。后面五个文件表明，有几个就两个决议案发言的人，意识到争论确实实涉及到了基本问题，不管表面现象如何。

但是，只是到大会闭幕之后六个月，分裂的原因才完全弄清楚。这时，阿克雪里罗得发表了他对这次争论的背景所作的分析（文件2），指出孟什维主义的政治原则显然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分歧。为了表明这种原则分歧，阿克雪里罗得并不是直截了当地探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爆发出来的争论，而是分析了在俄国出现一个集中的、等级森严的、同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目的相违背的工人党的原因。虽然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提到列宁的名字，但他的文章显然是驳斥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指导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组织工作的观点的。阿克雪里罗得对社会民主党组织本身和任务的看法，以后成为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特征。

文件 1： 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决议案

凡是承认党纲并通过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来支持党纲的人，都可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V·I·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提出的决议案，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第262页。

文件 1 a、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的指导下定期给党提供个人帮助的人，都可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L·马尔托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同上书第262页。

文件 1 b、叶哥罗夫对两个有关党员资格的决议案的评论

〔叶哥罗夫说，关于“党”这个词的定义，显然有两种看法。列宁的条文规定了一个狭隘界限，马尔托夫的条文则把党的涵义扩大到了向“民主主义”敞开大门的程度。〕切记，我们虽然是个地下组织，但是也要联系群众……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叶哥罗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62—263页。

文件 1 c、阿克雷里罗得论党员资格

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大家记得过去有两个十

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①和“民意党”^②。

“土地和自由社”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民意党”的圈子要小些，但它遵守同样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如果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部分人抛弃掉。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即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但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列宁条文的第一段，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目标，在原则上是完全相抵触的。

P·阿克雪里罗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同上书，第267页。

文件1 d、马尔托夫论党员资格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越是坚决要成为革命家，就越应该注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刚才所说的话。我们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解释者。党组织是一个能使我们所说的党的工作活跃起来的飞轮。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根据“这是你的工作”这个公式是可以解决的。我不怕“密谋”组织的叫法。根据我们的草案，党员有权把他的看法和愿望报告中央，有权在形成普遍意见方面起作用。我们这些“密谋者”对普遍意见考虑得越多，在权利方面提出问题的危险就越少。让各党组织拥有大量党员，党员是一定要增加的，即使他们不能属于党的组织，党也不能没有他们。够得

-
- ①“土地和自由社”是1876年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它主张在农民当中进行宣传，为大起义作好准备，起义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
- ②“民意党”是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因策略问题分裂之后建立的组织。民意党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和政治行动，而不主张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它还主张由少数革命者夺取政权。

上有党员称号的人越多越好。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我同意列宁说的，除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以外，我们还需要各种类型的“Loseorganisationen”（“松散的组织”）。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通过其他组织同群众联系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而我们的条文是反映这一目的的唯一条文。据我们看，工人党不是仅仅包括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而是职业革命家加上无产阶级中所有的主要积极分子的组织。

L·马尔托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70—271页。

文件 1 e、列宁论党员资格

〔列宁简略地为维护他的条文发言，强调说他的条文对组成党组织是个促进。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一切形式、类型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非常广泛、自由、松散的组织上。一个党组织的基本标志是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认可〕……维护马尔托夫条文的人的根本错误是，他们忽视了我们党的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祸害，或者不如说，他们不是忽视而是赞美这种祸害。这种祸害就是，我们党是在人们几乎普遍对政治不满的气氛中极为秘密地进行活动的，大部分活动采取的是秘密小组和秘密集会的方式，因而要把工人和空谈家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两种人在俄国又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为经常地混杂在一起，或者说这样的混杂更为有害。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此都极为苦恼，而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会起到赞许这种情况的效果。他的条文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简直不管谁都可以

成为党员——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是呵，可以这样说。”而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所以我们极力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宁肯让十个工人不能把自己称为党员——地位和头衔对一个真正的工人有什么意思呢——也不要让一个空谈家有权把自己称为党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力量和一致。我们抱定宗旨，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重要性和尊严——这就是我反对马尔托夫条文的原因。

弗·依·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65、267—268页。

文件 1 f、普列汉诺夫论党员资格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包括到党内来。根据列宁的草案，一个党员应该属于某一个组织；反对这个草案的人说，这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说采纳了列宁的草案，党就会向广大工人关门呢？愿意加入党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加入一个组织——他们是不怕纪律约束的。害怕纪律的，是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一般都维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他们是我们要加以拒绝的人。列宁的草案可以用作挡住他们的屏障，仅仅根据这一条理由，这个草案就应当得到一切机会主义的敌人的支持。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71—272页。

文件 2：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

P·阿克雪里罗得

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其理论基础和纲领来说，这是一个无

产阶级的政党，但就其社会成分及组织特征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党——不仅经常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批评，而且也经常“对自己活动中出现的缺点进行严格的审查”。党不是自发地、不加控制地这样做的，而是遵循它的义务：必须经常密切注意它所采取的每一步骤，无情地批判策略上的任何轻重倒置或错误。党这样做之所以责无旁贷，是因为党宣布它是劳动群众的政治组织，但从目前领导成分的成分来看，实际上它至多不过是一个出于信念从事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此外，俄国的问题并非是建立工人专政那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只是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即把帝国的全体居民从政治奴役下解放出来。激进的知识分子是倾向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但是，这种情况的最终的、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在于各民族和各阶级希望从农奴制时代残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一般民主要求。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同时也是劳动群众在革命的社会党内受到政治教育和联合起来的过程，无产阶级的、即社会民主的因素才能对俄国当前革命运动施加影响。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目的和任务是，保证用这种方式把推翻以阶级、专制制度和官僚主义为基础的政权的斗争，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直接序幕，第一步的目标是要达到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在我们党内，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战胜其他思潮，这已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证实和宣布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扪心自问，这一胜利究竟产生了什么特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积极成果呢？回答必定是：成果多多少少只限于愿望、同情和思想的范围；相形之下，在实践方面，我们的运动倒得到了发展，不过，这是从一般的革命意义、而不是从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我们运动中革命的民主主义在思想或理论上的成就，和我们的活动的客观趋向之间，即使原则上不是完全矛盾，也是大相径庭的。

官僚集中制在党组织中的胜利，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手工业方式”^①的斗争的必然表现。然而，没有比这种集中制本身的内在倾向更近于“手工业方式”了。在劳动群众经济上不满并自发表现这种不满情绪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和劳动群众建立友好关系的那段时期盛行的是“手工业方式”。那段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使群众革命化了，但没有教育群众，并使他们团结起来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对专横的警察统治自发表示忿恨的群众，被吸引到同专制主义作斗争中来时，就出现了机械的集中制……

对盲目崇拜集中制的人来说，〔按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建党〕这个问题是个简单的问题。所要做的事不过就是改进组织方面的做法，集中力量分配党员担任越分越细的职务，严格区分这些职务的界限，设立大量的司厅科股等等，这些机构都按等级配备职业或半职业革命家，有厅长、文书、军士长、军士、士兵、警官、领班或者担任什么其他职务的合适级别。这个由平民、官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大军，在一个个蚂蚁窝里一个劲地工作，彼此之间不相往来。至于说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那就一点影子也没有！当党员成了这么多的齿轮、螺帽和螺栓，都一丝不差地按中央的决定运转，那么究竟有谁能进行政治工作呢？……

^①这是指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1902年这段时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是：“眼界狭隘，采取手工业方式进行活动，把全副精力放在地方的需要和要求上。”见阿伦·K·怀尔德曼：《列宁与手工业方式的斗争：俄国的〈火星报〉组织》，载《斯拉夫月刊》第23卷，1964年9月，第479—503页。

少数人的行为显然是不能消除我们运动中产生的分歧的。我们需要全党共同努力，需要广大的实际工作者自觉发挥能动性，他们自己必须从手工业方式的水平提高到进行政治工作的水平。这样做，当然是同党内的官僚制度不相容的，因为比较有主见的党员一采取新方针，党内的官僚制度就不得不放松一下它的统治，除非党已成为新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这次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堡垒。而我们越是系统而有力地根据无产阶级的和理论的观点改革我们的做法，那么，实际歪曲和损害集中制原则的那些集中制的鼓吹者就越发站不住脚。……

我不是把个人与个人、而是把我们运动的两个方面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加以对比，前者指大多数党员普遍具有的思想、原则、爱好和心情，后者指他们活动的实质……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现象，根源在于产生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决定其性质和社会内容的基本历史进程。阐明这个过程，对我们定会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国际社会民主派视为它自己的方法和成就的最高准则的那个目标。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提高劳动群众阶级觉悟和政治自信心，使他们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成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我们的运动兴起的时候，俄国还不具备直接完成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这样的条件。我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之中有人经过深思熟虑说过的：“首先要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来从事真正的无产阶级事业”——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相反，在我们看来，无产阶级事业包括了当代俄国生活的所有重要任务，而且我们相信，这两项主要目标——为建立一个从事无产阶级斗争的广泛的组织奠定基础和直接把阶级觉悟灌输到工人中去——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社会革命的最高事业。可是，历史

作出了另外的决定。似乎历史背着我们宣布，我们运动的主要重点，应该落在方法上，而不在目的上——不应该落在根本的、主要的目的上，而应该落在较为基本的条件上。客观地说，无论如何应该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些条件，然后才能为达到主要目标而不断努力。这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为一种一直存在着的矛盾所困扰……

我们说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根本矛盾，其次，意识到它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同这两者紧密联系的是，要了解工人阶级将要实现其解放使命的历史条件。所谓群众政治上的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我们指的是组成一个阶级的党或由这样一个党来引导的劳动群众，经常而有计划地参加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这样，群众就与敌人作面对面的斗争。敌人之中，既有他们的直接剥削者——追求私利的人——，又有上层社会的一些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舆论和“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发言人，实际上却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领袖、顾问或一般政治代理人。因此，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是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学校。……

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出现，就立即通过诱导工人群众积极而独立地参加政治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这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资产阶级当时在那些国家里执政，或至少分享部分政权；此外，政治鼓动比较容易大规模地进行，因为 *Rechtsstaat*（基于法治的国家）给它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以及爆发之后，受到民主的和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因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多少为自己要起的作用作了些准备。一般地说，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成为在社会上活跃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和知识

分子中一部分人的先锋，从而标志着早已开始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当社会民主思想在俄国最初形成的时候，完全不存在开展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具备的这些条件。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主要为两个因素所决定。首先，俄国无产阶级——除去淹没在大量工人群众之间的少数比较有文化的工人之外，除去偶尔的罢工之外——完全是毫无教养的，并陷于长久的沉睡状态。它内部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承担起唤醒它并领导它走上历史舞台的任务，因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外面的因素，即激进的知识分子来完成，这就使我们接触到上面所说的两个因素中的第二个因素了。为了在俄国发起一场工人群众的独立的有阶级觉悟的运动，他们必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受到绝大部分具有另一种阶级背景的一个社会集团的影响，并接受它的指导。在西方，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使无产阶级从热爱自由的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和监护下解放出来。而在俄国，为了使工人在社会上、政治上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积极主动地使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千方百计地帮助前者担负起对后者的革命领导责任。不管我们怎么看这一点，我们运动的创始人的主观目的和历史强使他们选择的方法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

P·阿克雪里罗得：《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火星报》第55期（1903年12月15日）和第57期（1904年1月15日）。

第二部分 1905年革命时期

在1904到1907年革命动荡的年代里，孟什维克显然不仅在组织问题上，而且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都采取不同的立场。文件3表明，孟什维克认为，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能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孟什维克对他们的潜在的同盟者所抱的意图还是心存疑虑，因而主张在自由派集会的所有地方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以便促使他们要求真正的民主改革。这一策略的成就并不显著：俄国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且思想相当混乱，政府竭力阻挠反对政府的派别的一切政治活动；孟什维克组织既不多，又没有动员工人的经验。尽管如此，在一些城市里，工人们的确在自由派开会的会场外面进行了游行，在少数情况下，这些游行使得中产阶级进步分子通过的决议稍向左转。

本部分的其余文件表明，革命刚爆发时孟什维克阵营内部出现了混乱和动摇，到1906年春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重要的策略问题上终于趋向一致。到那时，这个运动才具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广泛的纲领。

文件3：孟什维克领导人给党组织的信（1904年11月）

关于现有的zemstvos（地方自治局）^①，我们的职责是向他们提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假如他们自称有权代

^①地方自治局是1864年建立的具有有限自主权的地方组织，活动于农村地区。

表国家说话，或者要得到工人群众的坚决支持，那就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掌握着全国命运的知名人士，为了一勺残羹出卖民族自由而召开的会议，是与一切民主直接为敌的。我们党的任务是要为反对这种会议而战斗到底。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地方自治局和杜马^①是我们敌人的敌人，他们虽不愿意或者不能与敌人搏斗到无产阶级利益所需要的程度，但他们公开反对专制主义，提出行将导致其覆灭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程度非常有限）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他们的行动是犹豫不决的，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争取充分的民主。他们的犹豫不决和半心半意的表现，清晰地勾勒出资产阶级各派的社会成分和社会政治倾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我们的任务当然是根据我们纲领的基本要求尽力利用这种现象。但是，在反对专制制度的范围内，特别在斗争的现阶段，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一般应该是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在现阶段，如果我们要用威胁的强硬手段，迫使地方自治局或其他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的机关，在胆战心惊的情绪的支配下，正式答应支持我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那我们就会犯下不可挽救的错误。这种策略将使我们整个政治运动为反动派所利用，从而败坏社会民主党的名声。直接斗争是用来反对确定无疑的敌人的，只容许用于反对那些作为反动派同盟者出现的“舆论”机构——我可以补充说，如果自由派或半自由派的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或由于怯懦而支持专制制度，那也可以直接进行斗争来反对他们。例如，对拨款几百万卢布来满足政府的军需一事，我们党被迫组织工人反对这笔开支，抗议用人民的钱来维持人民的压迫者的威信……

在执行上面提出的这一行动计划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正

^①这里指的是1870年创立的城市杜马，与农村的地方自治局相似。

沿着新的政治活动的道路开始前进，即让工人群众作为独立的力量，以反对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为直接目标，有组织地干预社会生活。这样做，他们就能成为一种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独立力量，同时又能对资产阶级提出一致努力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是第一次摸索着走这条道路，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训练无产阶级和我们自己的党，以备将来同剥削阶级党派和国家政权本身进行战斗……

在我们党的力量足以组织强大示威的所有中心地区，同时组织示威，将会在这些地方，包括设有地方自治局的地区，令人惊奇地扩大我们党的政治活动的影响，提高其重要性。唯一不同的是在召开地方会议的城市里，我们必须尽力使群众同地方自治局会议保持直接接触，使示威游行集中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代表开会的大厦前面。一部分示威群众可以进入会场，通过特派全权发言人请求会议准他宣读工人的声明。如果遭到拒绝，发言人可以对代表人民说话的会议却不愿倾听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呼声，大声提出抗议。但是，社会民主党用这种形式提出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反政府派的正式声明冲突的工人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有大量积极的示威者，他们必须充分懂得两种示威游行之间的显著差别：一种是反抗警察和政府的示威游行，另一种则是旨在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对自由派的政治态度施加直接影响来反抗专制制度的示威游行。其二，执行委员会应该事先采取措施，使几千工人聚集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代表开会的大厦前，几十个或几百个工人进入会场，不致使地方自治局代表胆战心惊，否则他们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可能会不顾羞耻，叫警察和哥萨克来进行保护，从而把和平的示威变成拚死的斗殴或野蛮的血战，示威就会达不到目的。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能善始善终的局面，执行委员会事先要

告诉自由派代表正在组织示威游行一事以及示威游行的真正目的。此外，它还应该想法去同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中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即使不能取得他们对我们的政治活动的积极支持，至少也要使他们表示同情。它当然要以党的名义，受工人小组和会议的委托，去同他们谈判，在谈判中间，不仅要讨论共同的政治运动计划，而且要报告运动的进展情况——当然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总之，我们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全部成就和真正价值，取决于工人群众究竟有多大自觉性用自己的要求去对抗自由派的要求。因此，我们重申，当前的努力能取得多大成就，将取决于我们以往的工作。

引自V·I·列宁1904年11月的信，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491、498—499页。

文件 4：关于武装起义

社会民主党把准备人民群众起义看成是自己的任务，力图使起义受自己的影响，进而加以领导，并利用起义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鉴于下列两种情况：

一、无产阶级主要队伍的组织薄弱，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具有不可避免的自发性，要使全国在预定日期同时起义，要通过秘密组织来准备起义，这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想获胜，就非迅速使广大群众同沙皇制度发生冲突不可。

二、起义获胜的有利条件，首先取决于群众的不断骚动和反动势力的日益瓦解。

因此，社会民主党为了准备起义，首先应当：

1、根据当前政治事件的背景，在更多的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

2、使无产阶级群众中形成的任何独立的社会经济运动同自己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并对其施加影响。

3、加深群众对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随时准备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以及随时把武装斗争转变为起义的可能性等的认识。

4、在不同地区战斗的无产阶级之间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以便使社会民主党有可能把自发的反抗运动主动地转变为有组织的起义。城镇的无产阶级和农村的革命运动之间，也应该有最密切的联系。

5、广泛利用宣传鼓动工作，尽可能使广大居民关心无产阶级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斗争。这样，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在以阶级为基础组成的独立政党指引下，将得到非无产阶级团体的最积极的支援。

只有社会民主党在这几方面开展了活动，总起义的日子才会临近，总起义服从我们领导的机会也才会增大。只有我们这样做了，党组织才能认真考虑起义的技术和军事准备工作。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4—5月）通过的决议：《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见《火星报》第100期增刊（1905年，日内瓦），第18—19页。

文件 4 a、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可能是随着全国起义的胜利而成立临时政府，也可能是某个代表机构在人民直接的革命压力下提出革命性的倡议，决定组织国民立宪会议。胜利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将带来一个革命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提出的直接任务，就是最终摧毁建立在阶级和君主制基础上的整个制度。这将是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想取得政权、争得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不同成分之间进行较量的结果。因此，倘若临时政府要承担起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任务，那就得采取两种政策：一方面为了调节刚解放的国家的对抗阶级之间的争夺，不得不推进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运动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竭力维护最能使其推进革命事业的立场，在同资产阶级党派反复无常的、追求私利的政策进行斗争中，不要束手束脚，不要让自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所消融。它遵循这样的原则：不应夺取政权，也不在临时政府内分享政权，而仍做一个极其革命的反政府党。

这条策略路线当然并不排除下列情况，即纯粹出于扩大起义范围和瓦解政府的目的，在某一特定城镇或地区，部分地、暂时地夺取政权并成立革命公社。

只有在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就是说，假如革命扩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才会尽力去夺取政权，并尽可能长时期地掌握政权。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可能会大大放宽对于俄国革命的限制，使俄国能够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

我们制定使社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时期对历届政府保持一个极为革命的反对党地位的策略，就能使我们自己有最充分的准备，以便一旦政权落到我们手中时能运用它。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4—5月）通过的决议：《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见《火星报》第100期增刊第23—24页。

文件 5： 农民问题与革命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无论在城市或在农村，旧的农奴制和旧的阶级统治的残余，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结果，首先是一般的民主派（在农村的代表是农民阶级）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斗争，同无产阶级民主派（在农村是农业工人）掀起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交错进行。另一种后果是，虽然我们一定要经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序曲的民主革命，但是这两场革命可能不象西方那样，被一段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分割开来。假如内战拉长，我国作为民主革命而开始的革命，很可能就会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忽视这种可能性。社会民主党同空想的无政府主义相反，始终认为，俄国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跃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要规定出这两者之间的确切间隔时间。世界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开始在改变俄国的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越是延缓专制制度崩溃的时间，人们就越有理由期望从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论点一般答复说：革命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俄国根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歪曲。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当然决定革命的性质，但只是归根到底而言。生产力的作用就是决定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并通过经济发展决定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主要地、直接地决定革命性质的却是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牢记，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较，阶级斗争发展的突变性要大得多，受我们所说的偶然因素的影响要大得多。

《农民问题与革命》，见《开端》第7期1905年11月20日第1页。

文件 6： 阿克雪里罗得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极为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势不两立的敌手直接对抗：一方是为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而战的保守势力；另一方则是一心要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势力。在这些国家里，社会状况不可抗拒地迫使革命者或无产阶级分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准备。在特殊情况下，这些人中这个或那个会迷失方向，偏离革命的正道，但一般说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并不会同它的基本目标不符，并不会同社会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相冲突。但是，就我们党来说，它的历史地位由相反的两重趋向所决定，它的直接任务不是组织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彻底根除阻碍资产阶级取得不受拘束的权力的社会政治秩序。俄国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成熟到可以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历史越来越强烈地迫使工人和革命者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使他們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仆从，而不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施行政治统治进行策略上、组织上的准备。但是，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一贯坚持追求这后一目标，它才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意识集团区别开来。

反对我们（关于杜马）决议的人的策略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思潮的密谋和暴动的混合物，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装扮了一番。我认为，在专制的俄

国，这种思潮与我们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是根本不相容的。目前，由于普遍都不享有政治权利，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同其他各阶级一道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只能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范围内，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以阶级为基础的党，以达到反对专制制度的目的。……

在专制的俄国，我们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客观历史要求。相反，把无产阶级的事业有组织有系统地同广泛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民主要求是由我国革命的社会内容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把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团结的事业，同俄国革命的迫切的民主利益与要求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党策略上的头等要事，是党不得不照此行动的依据。事实上，这种双重的、自相矛盾的目标，只能采取妥协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出于党的代表们的主观愿望或算计，而是由于在目前这个历史关头，我们党的地位及其社会政治使命处在本质上矛盾的状态之中。因此，我不相信有什么法宝可供我们用来抵抗俄国革命运动的这些基本倾向，这些同俄国无产阶级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团结相对立的倾向。我们在策略问题上要取得一项有条件的相对的或差不离的解决办法，大致就是要经常利用那些由国家或知识阶级创立的自治机关和社会机构，为工人群众谋利益。这类机构可以说是立宪政体的代行机构，或其胚胎形式，可以成为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预备学校或基本论坛。……

我们党如把注意力集中在采用恐怖主义的和密谋的方法上，则只能使无产阶级精神涣散，而且，就党的活动的实际社会内容来说，党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我之所以说“资产

阶级革命”的组织，因为我们党要是经常大规模地采用这种策略，就恰恰会产生我们力图避免的后果。我们不但不能利用全国性的运动反对旧制度，来提高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在这个运动中成为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反而会使无产阶级处于民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在后者领导的革命中充当炮灰和纯粹的工具。我们要是把准备和实行精心作出的恐怖主义计划和群众起义——除非具备实际的军事策略和巨大的实力——作为我们主要的实践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以真正具有能进行这类活动的个人品质、技巧和经验的人来充实党的队伍，尤其是领导层和大本营。但是，具备有政治觉悟的、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应有品质的人，不见得就会有上面谈到的那种品质。

我们决不认为旧制度会和平地消灭：我们认真地考虑过，在同旧制度进行最后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全国性起义，或者说，接二连三的大规模起义的阶段。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党是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用军事的、技术的或密谋的方法，来使党本身和工人群众作好准备，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以群众的阶级利益的名义，通过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的独立性，来促使他们革命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紧密结合这些方针进行宣传工作，继续促使自由派经常对军队中的中高级人员进行工作，使他们转到革命事业这方面来。而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却要党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为武装起义作军事技术的准备上去。这就是我把他们称之为密谋暴动的思想流派的根据，我认为这个派别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我们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我想说明就我们如何对待国家杜马而提出的两个决议案中所包含的策略分歧的实质。一个草案要求我们对它采取完全否定和

敌对的态度，理由是它只能助长“立宪的幻想”，只能遏制革命，使有利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气氛无法形成。而我们的草案所根据的信念是，杜马尽管可能是短命的，仍能有意无意地充当在一般群众中消除立宪幻想的有力工具，为成功地进行全国性起义创造条件。另一个决议案的起草人之所以不能同意我们的草案，是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接受它的基本前提，即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因是建立在阶级冲突基础上的专制制度同社会的迫切需要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调和。我们的对手把打算和希望都寄托在用密谋手段准备武装起义的想法上，寄托在要使我们党集中全力准备武装起义的想法上。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做法，会使我们完全背离我们本来的目的——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得到发展，组成一个单一的有阶级觉悟的组织。他们的政策会把工人群众变成单纯的战斗队，没有自己的政治意志，也没有本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从而就会失去其政治特性。要知道，只有在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气氛中，工人群众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同其他阶级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志和他们的组织才能很好地产生出来。为了形成这样的气氛，需要立宪制来给各阶级为取得政权和增加影响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开辟广阔的天地。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独立性的观点来看，我敢说，甚至连最糟糕的议会制也比我们至今一直采用的没有效果的方式优越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政府对反对派和革命势力可能作出的每一让步，即使是旨在孤立和削弱革命党派的纸上的让步。政府作出的虚假的让步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也不能阻碍亚洲式的专制政府让位于立宪制度。然而，政府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只会激起全国更大的反抗，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因此，我们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利用政府为满足社会的要求而采取的每一个措施，利用专制制度以虚假的让步来拯救

自己的每一次尝试——因为政府每走这样一步，表明工人群众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可以利用政府的措施或尝试，来扩大他们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活动范围，来进行争取自由和民族权利的公开合法的斗争，为他们、也为我们不断赢得越来越多的基础广泛的阵地。

同时，我们认为，不管政府的意愿和打算如何，国家杜马会是，或者说，可能成为革命者所掌握的打击反动势力和促进革命的武器和手段。我们的这些希望并非建立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左翼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杜马这一情况之上，虽然我个人认为国家杜马的成分是有利于它成为革命的武器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希望不是建立在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客观的事态、在专制政府和整个帝国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这种矛盾已很尖锐，势必会引起政府和杜马之间的纷争，不管杜马里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力量大小如何。尽管杜马中的多数代表是有如十月党人^①海登和斯达霍维奇这样的温和自由派，但是对旧制度进行彻底清扫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致杜马势必要同政府发生根本的冲突。杜马要是完全由黑帮百人团^②分子组成，或许它能够同反动政府相处下去，但在那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对专制制度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一目了然，这确是一个虚假的舆论机关，完全是反动的工具。换句话说，即使杜马的成分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是理想的，它也不会为我们对手

①十月党人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认为，政府1905年发布十月宣言是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因而反政府派现在应同当局合作，使政府同人民和解。

②黑帮百人团是反动组织。它煽动暴徒对革命者采取暴力措施；此外，他们发动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用骚动和劫掠来转移人们对政府的不满。

的目的效劳。

阿克雪里罗得在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发言，见《社会民主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48—249，251，254，204—205，271—273，324页。

文件 7：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

一、土地纲领

为了消灭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使农村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号召：

- 1、废除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对农民的人身和财产的一切束缚；
- 2、废除一切使农民阶级遭到孤立的付款和税收，废除一切具有奴役性质的债务。
- 3、没收教堂、寺院、皇室的地产、这些地产连同国有土地都应归城乡主要的地方自治机构管理。移民所需用的土地，以及国家重要的森林和航道，应由民主政府控制。
- 4、没收私人（小农除外）占有的土地事宜，应由主要的地方自治机构掌握：这类机构应规定出需没收的地产面积的最低标准。

二、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包括没收地主的财产；同时始终坚决反对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任何企图。随着革命胜利发展，党的目标将是把没收的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的民主机关，或者，如果条件不利于这样作，党就主张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进行小块经营或作为对农民的一种必要的贴补。不论对民主土地改革采取什么立场，在任何情况下党都要坚持不懈地为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努力。党要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与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要提醒农村无产阶级，不要轻信小农制度，小农制度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决不是解救广大民众的贫困的良方；要表明有必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才是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522—523页。

文件 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

P·阿克雪里罗得

据我看来，最积极最杰出的党员，应集中全力注意实际目标，即组织和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和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直接要求和行动计划的特别决议。

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讨论公众当前面临的问题，例如召开立宪会议，对政府组织的装模作样的代表机构应采取的态度，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的组织与集会和我们对其的政策问题。此外，还有工会为按照适当的条件召开立宪会议而进行斗争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工人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同自由民主团体达成协议、给它们提供援助等问题。最后，还有立宪会议应该实行的、我们应该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前或选举期间为之鼓吹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问题。

显然，向工人散发呼吁书只是我们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鼓动的办法之一。我们的同志必须在从属于我们的组织或者受我们组织影响的工人阶级团体中，为筹备代表大会而进行广泛的鼓

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还必须使我们的“职业革命”组织中的工人成员对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想法产生热情。大会的目的是整个地改造我们党，参加者既有同意我们党的纲领的主要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员，也有我们党组织的代表。如果党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能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以至大会本身及会后的联合中都洋溢着社会民主运动的精神，并且准备同党一道前进，这当然是很理想的。

我相信，“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一定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工人。而在革命大动荡的时候，如此多的群众拥护这个口号，这就足以使代表大会、大会的决定和由大会建立起来的组织，在无产阶级觉悟较低的群众中和在自由民主派的心目中，具有巨大的权威。

不用说，鼓动必须集中在组织民众力量起来积极地反对政府以国民杜马（它已被丑化成为国家杜马的形式）来代替国民议会的企图，说服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为争取召开国民立宪会议而战斗，而这个会议才真正会成为由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杜马。

要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在这时候站出来，它不仅能够带动社会民主党的和受党影响的工人，而且也能带动当前同党没有联系的广大无产阶级。

但是，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一紧密核心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即使不进行倡导也要直接号召的条件下，我所主张的工人政治组织才能产生。他们应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工作，启发无产阶级中关心社会的成员，使他们对作为独立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的想法满怀热情。只有无产阶级的这些成员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而进行鼓动。一个体现着“只

有工人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的口号的党，一个在心目中认为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单单是追求外在的目的的动力，而是目的本身的社会民主党，因而它发挥作为一个阶级的那些群众的独立性，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工具；一个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动员采取这种态度的党——这样一个党，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够利用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促使已结合成一支独立革命力量的工人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在政治上真正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组织委员会和地方小组或地方委员会，应尽量吸收社会民主党工人来做这项工作，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大会的召开和大会的活动与改组我们党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改组党的任务行将落在由社会民主工党的集会选举出来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身上。

普遍的革命骚动的气氛，必将使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员赞成召开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指挥中心，使革命气氛起到这样的作用：促使人们对创立统一指挥中心所抱的同情转变成强烈的自觉的热情，带领上述领导成员同我们一起奔赴这个目标——这就是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核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我们党在团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过程中，必须改造自身，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群众的党；也就是说，我们党必须从劳动群众的基本要求出发，鼓舞他们为部分地减轻自己的痛苦而进行日常的斗争，而且必须以劳动群众自觉的革命先锋队的身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

如果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或国民杜马的尝试没有成功，那么，党为把我们的口号付诸实施而进行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不是就白费了呢？并不是这样，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在运动中利用当前的形势，在政治上启发了工人群众，增强了他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合

法权利而以武力对付武力的能力和决心。只要我们的运动是这样进行的，它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在这个或那个中心地区推动真正的全国起义。

对我们说来，不应该把我们党的力量和一般的民主力量集中在阻碍布里根计划^①的实现这一空想上，而应该集中在动员和组织那些甚至能够把官方这种反动计谋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和工具的力量上。

P·阿克雪里罗得：《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日内瓦，1905年，第3，4，6，7—8，9—10，11，12，13页。

文件 9：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

鉴于

一、由于激烈的经济斗争、解雇和沙皇制的残暴政策，无产阶级中有部分人表现出以游击活动形式进行斗争的倾向，即个人或集体发动袭击，杀害政府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的代表。

二、在这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剥夺国家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事件的规模在扩大，次数在增多。

三、这些无政府主义方式瓦解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造成了以为个人自我牺牲的力量可以代替有组织的战争的幻想，结果削弱了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群众性活动的意向，并破坏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群众性活动的习惯。

^①A·I·布里根（1851—1919），曾任内政大臣。沙皇于1905年作出第一次重大让步时，布里根是拟定让步细节的委员会的主席。同年8月6日，政府发出文告，提出建立所谓“布里根杜马”，这是一个由少数公民选举产生的单纯的咨询机构。

四、政府以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事件作为借口，对守法人民加强了镇压措施。这些活动也为百人黑帮团在广大人民当中，尤其是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五、党员这样卷入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的活动，妨碍了党为反对工人阶级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所作的努力：这也损害了党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还使党的队伍内部陷于混乱。

由于这种种原因，大会决定：

一、党组织必须坚决展开一场运动反对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的活动，向工人群众说明，这些活动对革命事业有害，对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无益。

二、党员绝对不得从事或参加这样的游击活动或剥夺财产活动，违者开除。

此外，大会并不想对有时以武装群众的方式进行公开行动或者进行自卫的问题，作主观的判断。但认为，属于党组织的一些小分队，作为负有特殊的战斗任务，从而不同于工人组织的那种永久性机构，在革命斗争中往往热衷于采取恐怖策略，并鼓励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活动。因此，大会决定，解散一切属于党组织的特殊战斗队。

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4—5月）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纪录》莫斯科1963年第650—651页。

第三部分

反动时期（1907—1914年）

1907到1914这七、八年中，两派主要为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抢劫和俄国党组织的性质问题而争论不休。文件10说明布尔什维克的种种罪恶活动和孟什维克的愤怒。文件11和12表明孟什维克有关取消主义的看法。列宁认为，取消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他的对手的主要异端邪说。列宁谴责孟什维克想取消党的全部地下组织。

这种指责并不能得到证实，但是，孟什维克比起他们的对手来，更加强调组织合法的工人团体，这倒是事实。虽然孟什维克并未大力建立这种团体，使它们遍布广大地区，但到1911年时，他们已取得很可观的成绩。有一个报告说，在圣彼得堡有十一个很活跃的俱乐部，交纳会费的会员超过三千人，还有五个工会，共有七千多名会员，出版七种工会报纸和两种一般刊物，其中一种报纸的发行量在六千份以上。在其他城市里，工人的组织要少些，而且往往受到政府的刁难。然而，在不少较大的城市里（里加、哈尔科夫、敖得萨、基辅、巴库、第比利斯、伏龙芝和维尔诺），工人阶级显然越来越愿意组织起来，越来越赞成孟什维克的学说。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了解这些团体是怎样进行管理的，也不清楚它们对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党的重大决策都由侨居国外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等）作出，但是，在有关取消主义的冲突中，他们无疑是考虑了领导俄国国内孟什

维克组织的所谓“实践家”的观点的。1912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开始控制孟什维克实力所在的一些组织。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前言中已有论述。

文件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

L·马尔托夫

1907年7月，发生了一宗财政部的为数达二十多万卢布的巨款被劫的事件。几个月后，在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两地，几个俄国侨民在银行兑换从第比利斯抢劫来的票面为五百卢布的钞票时被捕。接着在日内瓦也发生了几起逮捕事件。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知名人士V^①又在巴黎的车站被捕，他携有大量这类钞票。

这件事发生前不久，一直在调查俄国侨民活动的柏林警察查获了一批武器和纸张。他们怀疑纸张是用来伪造票面为三卢布的钞票的。皇家银行的专家证实了这种看法。

与此有牵连而被捕的人，都是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不走运的米尔斯基在柏林被捕后，拘留在精神病院，并从那里被引渡给俄国当局，他们指控他直接卷入第比利斯的抢劫事件。

当时设在俄国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对第比利斯和柏林事件以及兑换钞票问题进行严密的调查。俄国国外的调查委托当时的中央外事局办理。高加索的调查则由该地地区委员会领导。委员会查出了一批参与抢劫行动的人，他们在行动之前不久，曾声明退出当地党组织。地区委员会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众；它宣布说，他们既然已退出当地的党组织，也就不再是任何其他的党组织的成员。地区委员会还向

①V，指的似乎是维克多·塔拉图塔。他是列宁最信任的而又最无原则的代理人之一。

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它所了解到的有关抢劫得来的钞票的情况。

中央外事局也作了彻底的调查，结果获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但是主要受控人V同志，拒不交代他和他的同伙根据谁的命令和为什么目的兑换据悉是抢劫来的钞票……

由于严格根据事实对布尔什维克卷入抢劫事件已作出了说明，我只须补充几点，以便于不明真相的读者了解情况：

一、事情已水落石出，列宁却不以为耻。

二、他并未要求中央委员会设一公正的法庭，来弄清他对党究竟犯了多大的罪。

三、就是这个列宁目前还正在反对“取消派”来保卫党，谴责我们孟什维克是叛徒和内奸。

维克多同志的住所曾被搜查，这一令人难堪的事实，一直不让第比利斯抢劫事件的“调查者”知道。只要大家了解到这一情况，兑换五百卢布钞票的全部问题也就真相大白了。政治方面不用多说，从实际来看，既然整个计划的策划者公开拒绝对此承担责任，惩罚在高加索和国外被查获的代理人，这似乎毫无用处，而且也不大公平。对我们说来，最好让这件事就此了结，让有罪的人得到“赦免”，以换取不再企图使用这次打劫得来的钱的坚决保证，而不再进行调查，因为列宁和他的朋友可说是不讲原则的，再调查下去则调查就有再度成为闹剧的危险。因而我们声明，假如我们能够得到保证，没有落到警察手中的五百卢布的钞票，不再拿出来到任何银行去兑换，免得再发生这类丑事，那么，我们准备同意对高加索的“勇士”和国外的“货币兑换人”全部赦免。布尔什维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于是，它中央的一个成员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他去说服“有关人员”销毁剩下的钞票；这要做到，“赦免”的决议是不会生效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这一建议，“有关人员”显然也注意了对他们说

的这些道理，因为实际上一定数量的钞票已经销毁。

从1907年以来，我们一直以宣传鼓动的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分裂政策。两年当中，我们冒着被指责为包庇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风险，没有向全党报告这个中央的犯罪活动。我们一再提请中央机构对此加以注意，可是这些机构已为列宁的集团所篡夺。去年^①，由于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贯腐蚀，党的官方机构终于遭到削弱，许多重要人物也因此而脱离了它们。有鉴于此，我们曾同意支持全会所制定的一项妥协政策，虽然对某些与会者能否加以贯彻不抱多大希望。只有这项政策能提供一线希望，摆脱实际上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态度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推行的十分鲜明的路线是不可调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意这项政策。假如这些人利用某一个人的错误，又得到机会来阻碍党的恢复，那我们也将重新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这由同志们来选择。为了便于大家作出抉择，并谨防任何人采取鸵鸟政策，我们认为有责任剥去自命为“党的救星”的人的画皮，象去年在全会上那样揭露他们和他们的政策，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已说明，全会严厉谴责的涅恰耶夫^②式的政策还在推行，表面上解散了的那个集团还很活跃，并正竭力擅权专政。它采用种种方法，在秘密组织里维持其控制地位，并力图在公开

①早在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就布尔什维克从打劫和其他可疑活动中得来的钱财达成协议：如果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境内合作，进行政治活动，那就要委托三个德国人来保管这笔钱，再由他们交付中央委员会。但两派不合作，布尔什维克留下了这笔钱中的一大部分，于是在资金问题上的冲突剧烈起来了。

②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是个臭名远扬的狂热分子，为推进革命事业，他无所不为，包括进行暗杀。

的工人运动中如法炮制，从而制造混乱和纠纷。

这里涉及的并不完全是争夺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原则的斗争，即陈旧的密谋原则与社会民主党充满生气的精神之间的斗争。

假如党的领导人承认形势的严重性，不从去年全会的决议中得出恰当的结论；假如他们被“调和”倾向所说服而去支持党内雅各宾派反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斗争，那么，他们就无论在形式上或道义上都会丧失作为党的代表者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L·马尔托夫：《是救星，还是破坏者？》，
巴黎1911年第22—23，27，40，41页。

文件11：为合法地位而斗争

F·唐恩

不是放弃合法；而是进行一场统一的、集中的、十倍猛烈的斗争来争取合法地位——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对政府所雇用的暴徒为搞垮工人合法组织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的回答。

是啊，既然政府的活动是有计划的，我们就必须为争取合法而进行统一的斗争。我们合法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因此就要承担新的义务，面临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斗争手段，来维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合法阵地，从法庭到报刊、代表大会、自治机构和杜马。同时还要有一个广泛的宣传鼓动纲领，对劳动群众、居民中有民主思想的人、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舆论进行宣传工作。

当然，这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必须花很多时间、很多力量，然后合法斗争才能联合成一条符合工人事业的利益的广泛战线。但是，当前我们的任务还是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以

便能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先锋队为工人运动及其组织获得公开、合法存在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具体步骤。要开展这样一个经常性的运动，首先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克服当前合法工人运动领导人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分裂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带有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的性质。要节约使用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吸取经验教训，并使我们的战斗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战斗——要做到这一切，迫切需要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更高的程度上统一起来。无论我们考虑争取合法地位所进行的斗争的哪一方面，也无论这一方面是多么无关紧要，都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为了宣传起见，我们要求通过各级法庭对压制工人组织的每个案件进行审查，或通过报刊或在国家杜马中提出质询来反对这些案件，那么，在这些场合下，现在四分五裂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十分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他们的结合起初不一定很紧密，抱定的目标也不一定很激进。但是，现实情况显然会把新的职责加诸于合法运动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身。如果他们负起这种责任，那么，他们打算进攻的意愿就会增加百倍，领导工人阶级在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取得胜利的能力也会增强百倍。

情况还不止如此。为争取合法地位而斗争，这与乞求当今的主宰者承认我们是合法的这样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恰恰与之相反。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只能紧密结合无产阶级的总的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离开这一斗争是无法解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把为争取合法而斗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就会越出“纯粹职业性的”或“纯粹同业工会式的”和“纯粹教育性的”问题的范围，从而必须突破“合法”的限制。进行政治斗争以便使非政治的工人组织可以公开存在，换句话说，集合不合法的力量为争取合法而斗争，这听起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实际

上却是俄国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特征造成的局面。

F·唐恩：《为合法而斗争》，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Ⅱ，第19—20号合刊 1920年1、2月第2—8版。

文件12：简评

A·N·波特列索夫

俄国马克思主义目前可以说正面临双重的困难——缺乏无产阶级，缺乏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目前只能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培养第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干部。革命前结成团体与无产阶级联合的那种知识分子，由于反动环境、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情绪低落以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当前的紧急关头如何行动等原因，日益在减少。运动的旧的组织形式显然已很不适应当前现实，而新形式又还没有形成，形势因而也就更为严重了。

这样，我们仿佛处在昔日与未来之间的停滞状态，悬于思想与行动都缺乏力量的真空之中。人们既不想去了解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掌握经验提供的大量资料，也不去扫除横在社会民主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他们宁愿停顿不前，走到偏僻小路和岔道上去，或者让琐事缠身，茫然若失。而在当前这种停滞时期，琐事简直泛滥成灾，这是我们知道得最清楚不过的了。我们沿着最省力的道路走，勉强就文学、哲学、宗教等政治和经济以外的一切问题进行争论，可是，政治和经济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必须先解决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们才能前进一步，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充满我们时代的革命觉悟的全部活力……

一贯是孟什维主义生命线的政治思想，即对组织问题的研究、对过去的分析和对现状的估计，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不到任何理智的活动，只看到一片寸草不长的沙漠，地平线上间或呈现出仿佛反映某种重大利益的海市蜃楼，一种膨胀而成为头等大事的幻觉。

新的敌人取消主义，受到国外布尔什维克异口同声的谴责，受到国内普列汉诺夫及其应声虫的谴责，尤其受到《现代世界》^①杂志的严厉谴责。当我们问到取消主义的确切涵义时，我们被告知说，取消主义指的是不承认党，公开或秘密进行反对党的利益的活动。但是，我认为，1909年在俄国发现取消主义一事，堪与库克博士发现北极的传闻媲美而载入史册。不同之处在于，北极无疑总有一天会被发现，而对于取消主义则不然：我们越是追寻，就越难搜捕到它。请我们的读者来判断一下吧：在1909年夏，真有一种学派主张什么取消早已不是一个有机体的那种东西吗？这种学派真的存在于严肃的现实中，而不是出于病态幻想的虚构？党作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作为重整旗鼓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一个不可动摇的环节，倒是存在着；它在杜马中有代表，具有过去阶段形成的几个派别，它不是统一的、等级健全的机构。这样说，而且让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都能听得到，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并不轻松的，是难受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这么做。因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没有比因琐事而分散精力更为糟糕的事了，也没有比面临悲剧而仍摆弄玩具士兵更为丢脸的做法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别的运动的成员不同，总是勇于揭露他们内部的纷争，如实地说明形势，毫不掩饰其真相，不论形势多么难

^①《现代世界》是一种大众化的杂志，政治倾向属于温和的自由派，尤以青年读者为其对象。

以忍受。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勇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运动充满信心，并且经常能用车尔尼雪夫斯基^①的话对自己说：“等着，我们的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以前是这样做的，难道现在真的认为那种勇气已经消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令人沮丧的现实，难道真的就不能大胆地说：“旧事物都已灭亡，都已消失，而新制度是一定要实现的”？新制度——不是知识分子的旧制度，而是依靠劳动群众的、基础更为广泛的制度——必将在合适的时候从旧制度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传统及其不朽的准则。

A·N·波特列索夫：《简评》，见《曙光》，
1910年第二期第61—62页。

^①N·G·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主要激进政论家，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小说《怎么办？》。

第四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孟什维克的领导，与中欧和西欧的社会党不同，倾向于谴责战争，并力促无产阶级不去支持参战的政府（文件13和14）。甚至波特列索夫及其右翼派别的同僚也都不赞成支持俄国政府的战争活动。但是波特列索夫确实认为交战国双方大不相同，而社会主义者在确定他们的立场时要切记这些重大的差别（文件15）。波特列索夫及其同僚提出，英法两个民主国家值得社会主义者去支持，以反对“半专制主义”的德国，并暗示，一旦俄国实行民主化，它也就值得社会主义者加以支持了。这种推论的方法影响到1917年推翻专制制度之后许多孟什维克对战争的看法，而使孟什维克失去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就是他们对1917年战争的态度。

文件13：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杜马代表的联合声明

世界各民族受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性冲击。千百万工人被剥夺了和平劳动的权利，抛入毁灭性的灾难和血泊之中。千家万户挣扎在饥饿线上。战争爆发了……当欧洲各国政府备战时，德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欧洲无产阶级一致反对统治集团的备战工作。

俄国的工人无法公开参与这一抗议行动，因为就在战争爆发

前夕，工人阶级的报纸和组织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暴力打击。但是，当欧洲无产阶级尽一切力量示威反对战争时，俄国工人的心和他们国外的同志是息息相通的。我们作为俄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认为有责任作如下声明：当前这场战争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兼并和暴力政策引起的，各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对此负有罪责，俄国无产阶级则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一样，对此深恶痛绝。

为了摒弃统治阶级用来掩盖其掠夺政策的假爱国主义，并一如既往地维护民族的自由和利益，无产阶级随时准备克尽己责，保护全国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方式，不受国内外敌人的攻击。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人呼吁整个国家来作政府的后盾时，我们不得不谴责这一虚伪而空洞的团结口号，因为俄国各族人民，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过错才被违心地卷进这场战争的。人民同它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因为政府并不代表人民反而奴役人民，战争中首当其冲的群众没有合法权利，工农的报刊被查封、他们的组织被破坏，监狱中塞满了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的战士，彼得堡的工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军警枪杀。俄国政府同遭受迫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许多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团结一致。

各交战国有头脑的无产阶级不能阻止这场极其野蛮的战争的爆发，但是，我们深信，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能够使人类迅速地结束战争。到签订和约时，不应当由贪得无厌的政府的外交官们、而应当由各民族本身来决定和约的条款，应当由各民族来掌管自己的事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深信，这场战争最终会使欧洲的人民群众看清他们所受的暴力和压迫的真实根源，而且，当前这场野蛮的战争将是历

史上最后的一次。

《孟什维克向杜马的声明（1914年8月）》，见
A·巴达耶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
（回忆录），莫斯科1954年第八版第346—347页

文件14：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迷信枪炮和金钱的资产阶级正设计明天的欧洲，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因暂时停止进行阶级斗争而捆住了手脚，由于自己采取的政策逻辑而不能不成为消极的观望者。这是因为，它只顾要爱国主义和保卫国家，没有乘机发动群众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场战争已经使人民看到了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可是，这派社会主义者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反而选择了国家统一和支持战争的道路，因而削弱、浪费和消耗了无产阶级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即唯一能与破坏欧洲和平的势力抗衡的力量。

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正统社会主义，处在当前这种感情放纵和贪欲横流的时代，任意放弃对行将决定和平条件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的一切希望，因而只能抱着柏拉图式的空想，希望能达成一种不会践踏各国人民权利的“民主的”和平。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就象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好心的后裔一样，不理解他们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已逐渐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情地埋葬。但是，更为糟糕也更为经常的是，“爱国的”社会主义者已担负起那些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使命，滥用民主的公式来为欧洲的统治者在战火硝烟之中勾勒出的计划润色，以便于他们征服领土、瓜分国家，建立经济和军事联盟。这些社会主义者，俨然认为用辞藻华丽的空论来为不体面

、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遮羞，就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无产阶级应高度警惕地注视本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后者正打算在这场可耻的战争之后，接着缔结同样可耻的和约。资产阶级力图以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延长其寿命。这说明战争是违反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两大交战集团的掠夺性计划与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交战双方却都希望各自的计划能在和约条款中体现出来。无产阶级必须熟悉这些计划的内容及其真正的含意，以便能提出自己的、以觉醒阶级的运动所拥有的力量为后盾的战斗行动计划，来与之对抗。

国家联合的计划

战争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与其现行政治结构不相容的地步。实际上，战争的根源在于，各国的国民经济迫切需要扩大领土，我们也看到这种需要在交战双方的和平计划中都有反映……资产阶级想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与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都是大相径庭的。一些较大的，与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多少是隔绝的经济单位将会出现。它们在实行保护关税的地方加强这种制度，并将它扩展到尚未实行的地方。与战壕里的战争在同时进行着的残酷的经济战争，将成为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使经济资源的发展受到挫折。欧洲将永远分裂成两大敌对营垒，而它们与美洲和亚洲资本主义堡垒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会愈演愈烈。此外，在每一新的经济联盟中，不发达的弱小国家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强大的领导国的牺牲品。

鉴于帝国主义集团打算侵犯别国利益，企图在别国为所欲为，社会民主党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

监督相互之间的政治——法律关系。社会民主党认为，有阶级压迫的国家，今天绝不可能也绝不愿意保证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上述权利；它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摧毁了阶级国家本身并夺得了政权，社会民主的原则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已背叛上面谈到的、它一度宣布过的民主权利，如同它背叛其他民主权利一样；但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和约条款违反其他国家人民的意愿，不经他们同意而随意支配这些国家的做法。社会民主党反对武力兼并，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反对分割和肢解统一的国家；反对名义上有主权的弱国对强国的附庸关系；反对强国伙同仆从国用暴力来压迫被奴役的国家……挫败这些集团的罪恶意图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弱它们的控制力量，而这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压力下才能做到。政府之间的裁军协定，即使能够实现，也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只有通过使军事制度根本民主化，取消常备军，组织民兵等来解除政府本身的武装，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民兵的建立不应受互相敌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否则仍是畸形儿，仍是军队的一部分，实际上也仍是豪富阶级专政的工具。民兵应是名副其实的、有民主作保证的全民武装。

无产阶级要能真正消灭战争及其根源，必须空前紧密地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国际性的政治力量。它必须摆脱民族排外的残余影响，绝不所谓的民族团结和民族防卫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无产阶级作为一支联合力量，必须支持各地区的，即各国的无产阶级反对国际反动的资本主义中心或封建中心的斗争，这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必须蔑视一切机会主义，尽力采取一切办法，抗议和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

战后“国际”究竟能对和约条款施加多大影响，这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所起的政治作用。如果无产阶级通过战争

和反抗能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早于他们心目中的有利时机来结束战争，那么，无产阶级有希望，也才有希望对和约条款施加影响。

休斯曼^①、王德威尔得^②以及正统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言人规劝无产阶级停止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摒弃他们的有害而荒谬的说法。一方面他们要求各国无产阶级为保证政府达到战争的目的而进行斗争，而且要“贯彻到底”；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拟出“和平纲领”来，其实，这种纲领肯定会被国际外交官们扔进废纸篓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所批准的兄弟姐妹互相厮杀的悲剧将由一幕基于纯粹空想的谅解而重归于好的闹剧来压轴。而这种所谓的谅解将在血腥的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把一个曾宣布要与这个世界作殊死斗争的党的无能为力而心安理得的形象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们始终不渝地忠于国际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并向各国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抛弃投降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沿着齐美尔瓦尔得宣言^③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它要求继续共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社会虽经战争的分裂，仍不失为统一的社会。它要求彻底抛弃所谓民族团结，党派休战和“Union Sacree”（“神圣同盟”）。它要求无情地反对一切主张战争，而且让战争拖下去的社会力量，它们是要利用这场战争，使

①卡米尔·休斯曼（1871—？），1905—1922年期间任第二国际国际社会主义局的书记。

②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是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之一，也是第二国际的知名人士。

③齐美尔瓦尔得宣言是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于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它并未提出合列宁口味的激进措施，即与第二国际正式决裂。

整个欧洲，从“热爱自由”的英国到沙皇俄国，继续呻吟在无法忍受的政治和社会压迫之下。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它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完成社会革命！

打倒战争！打倒割地赔款！废除敌对的经济联盟，推倒分隔各国的万里长城！打倒常备军和秘密外交！和平与社会主义万岁！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P·阿克雪里罗得、S·拉宾斯基、L·马尔托夫
《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交第二次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宣言草案》苏黎世，1916
年第6—8、11—12、14—15、16—17、18
页。

文件15：致哥本哈根会议的信

……首先我们认为，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或“国际”作为一个整体，都不可能对交战双方完全保持中立。战争的结局会决定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事态发展的总进程；而且，尽管社会主义者一贯反对把战争作为解决分歧的办法，一旦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战争仍然爆发，他们就必须注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件，并尽量从中得益。他们在选举运动中学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支持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集团而无损于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同样，他们在战争中有权也必须支持其胜利看起来最有利于推进世界发展的一方。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都是这样做的，国际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and 理论家最近几个月来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当然知道，社会主义者要决定究竟哪些国家或哪些事件结合起来就能为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提供最好的出发点，是有困难的。对任

何战争作这样的分析都不容易，分析当前这场战争尤其不容易，因为双方都包括有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十分悬殊的国家，例如共和制的法国和自由的英国与沙俄结为一方，对付半专制的德国。然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有弄错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宁肯弄错，也总比在国际政策上没有一条固定的路线要好些。

那么，我们对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答覆王德威尔德说，在俄国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战争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另一方面从俄国来看——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怎样行动的问题。先一般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来预计事态发展，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战败，比起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俄国战败来，要有利得多。当然这种估计主要总是出于推测。不过，如果比利时丧失了独立，德国用武力征服了法国，那么，比法两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出现持久的大倒退，各种反动势力就会抬头；英国战败，这个国家的极端军国主义就会大大加强，这是不用怀疑的。人们也许会问：在德奥获胜的情况下，两国本身事态的发展是否会超过上述不利情况从而对社会主义者有利呢？我们认为，情况恰好相反，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想得到，要是“同盟国”获胜，半专制制度的现状会大大巩固下来，并导致灾难性后果，尤其在德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制度一直是成功地与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无产阶级运动作对的。

此外，德奥战败不仅会使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摆脱羁绊，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能在全欧洲民主化过程奠定基础。德国军国主义的崩溃会促进和加速民主化的过程，因为这一崩溃意味着摧毁欧洲整个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堡垒（不妨看看德国政府1905年对

俄国政府的影响)，意味着封建容克和金融资本主义构成的混合制度的死亡。历史条件最终是有利于几十年来积聚力量、代表现在“国际”核心的那个阶级的活动的。

实际上很清楚，战争的这种或那种结局各有好处，作出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是，有个沙皇俄国，它的胜败可能产生种种后果，情况因而复杂化了。如果俄国战败，我们深信1905年的局势不会重演。当时，居民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推到战争头上，因而奋起反对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的政府。各阶级都清楚，政府这样干，甚至都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俄国人民有个很深的印象，国家受到了攻击，而政府既不希望发生冲突，也没有去进行挑衅。舆论就是如此。即使战争的结局对俄国极为不利，看来也不大会提供机会，让人民把俄国的种种不幸怪罪政府，开始一场革命或发起大改革运动，何况遭到失败的不仅是沙皇俄国，还有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更为重要的是，这不象那次对日战争那样，仅仅是外国的战争或殖民战争。要是俄国在这次战争中败北，随之就会遭受外国侵略带来的重重苦难。经济上如此落后的俄国就会完全崩溃；它的经济力量就会受制于侵略者的利益，发展受阻或减缓，整个社会，特别是无产阶级就会处于有气无力的状态，从而排除任何广泛传布的、强而有力的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

最后，战败的俄国根本不可能再与法国和英国结盟，因为这已无利可图，而会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与忠于保守原则、顽固地敌视欧洲工人阶级的德、奥两国，结成新的“神圣同盟”。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们认为，“国际”不会从俄国的失败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我们不会耽于幻想，不信俄国的胜利真会带来什么危险。我们怕俄国战败，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出现沮丧停滞的局面。我们倒希望俄国战胜，因为战争开始以来人们觉悟提

高了，没有主见的群众也逐渐在对当局提出更多的要求了，俄国战胜则这种觉悟可能进一步增长。而且一想到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改革，会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良好影响，我们的精神也为之而振奋。

战胜的俄国当然也会和战败的俄国一样，筋疲力尽，秩序荡然无存，但人们的情绪是高涨的而不是低落的，各阶级的愿望会使国家认识到有进一步欧化的必要，这就有利于逐渐消除古老的半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残余。俄国如果能这样欧化，它会与十九世纪改革后的德奥相似，自由派在政治上会同样软弱无能，他们会同样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即使如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会因此而大大加强，它将能利用一切机会为它的社会政治活动和阶级的巩固在欧洲找到支持的力量。此外，俄国不大可能会完全跟德奥一样，因为战后的国际局势不可能与1870年以后世界停滞的形势完全相似。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上的斗争会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内也会动荡不安，尤其是中欧将经历一次深刻的民主改革……

尽管有上述种种理由，我们仍然认为，只因沙俄是交战国，就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对欧洲战争的态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上面谈到的这个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当局势向前发展时，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将起什么作用？假定我们对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是能够而且应当多少与法国、比利时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起而支持自己的政府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断然回答：不！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不仅取决于他们对战时世界形势的判断，而且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情况，他们对力量对比、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看法。

俄国社会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反动政府。这个政府禁止独立的社会力量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为国防而采取的行动，而这本来

是要求最充分地动员人民力量的。即使在当前这样的历史危急关头，政府仍执行由来已久的迫害政策和挑唆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政策，在决定和争取实现其战争目标时，不容任何人参与意见。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很了解我国政府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组织的，它怎样迫害和囚禁我们的同志；它怎样禁止我们的报刊自由发表意见，破坏工会和社团的工作，反对它们稍有独立性的表现；它怎样压抑各阶级的热情，麻痹国民精神，对犹太人滥加猜疑而破坏和谐的气氛，一笔抹煞了加里细亚乌克兰在文化上的成就，对波兰人则一味许愿，而又不对其获得自由作出真正的保证。俄国政府无意为使战争打下去而在国内进行政治休战，因此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要休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做，只能向在战争危急关头仍在破坏国家的势力屈服。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职责不是放弃国内条件加诸于他们的解放的使命，而是把这一使命与世界形势提出的任务和目的协调一致。

只要战争还打下去，俄国社会主义者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就是：为了灾难深重的群众的利益，高举反对政府的长期斗争的旗帜。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来保证：一旦协约国获胜，要使俄国政府无法干涉事态的发展；把俄国胜利对和约条款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而且必须让俄国国内的力量来消除它的危害。因而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并不反对国家自卫，并认为，战争提出的许多问题，必须由社会各阶级在当前或将来共同商讨来解决；另一方面则仍尽力反对俄国政府。俄国社会主义者不反对战争，也不提反战口号，因为那样做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是有害的。王德威尔德担心他们会在俄国后方组织扰乱，他们是不会那样做的。但他们不信任统治俄国的坏人，也不打算为他们提供战争的费用。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应一如既往，尽力帮助深受战

争之苦的人们。他们认为现在是为签订和约作好准备的时候了，他们愿与外国同志共同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深信，和平条款不能只由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来拟定，这是整个运动要做的事情，也是国际本身当前的重要任务。这里暂不涉及签订和约这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各国社会主义者恐怕要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磋商，才能使国际最终认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结论。

圣彼得堡

1915年

A·N·波特列索夫及其同僚的信：《哥本哈根会议（1915年初）》，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讯》第一期1915年2月22日第2页。

第五部分

1917年革命时期

在决定命运的1917年，孟什维克在俄国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到9月份为止，他们一直在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占优势，而这个联盟又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5月以后，I·G·策烈铁里和M·I·斯科别洛两人在临时政府中任部长之职。但正如这部分的文件所表明，孟什维克没有提出有力的政策来解决俄国面临的战争和政府威信扫地这两大问题。

中派即革命护国派控制着党，策烈铁里是这派的著名代言人。他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和头脑清醒的思想家，也是个有实力的人物。策烈铁里对孟什维克的各项政策所作的说明是最为清晰的（文件17，18，20）。他的温和政策用心无疑是良好的。策烈铁里信奉民主，相信通过谈判达到和平，反对政府方面有碍于达到这些目标的任何冒险行动。但是，孟什维克与群众日益增涨的战斗情绪已很不协调，孟什维克党左翼领袖马尔托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文件23、23a），经过三年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人民等待这场血腥战争结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政府又无力解决困扰着俄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使人民感到绝望。当1917年11月列宁主义者向临时政府发起攻击时，没有遇到来自俄国人民的多大阻力，与其说他们是亲布尔什维克的，不如说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如果温和的政党想要在革命的形势下保持其政治影响，他们就必须对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采取断然措施，这恐怕就

是从1917年事件中应当得出的教训之一。

文件16：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

这个政府之所以是临时的，因为它只存在到立宪会议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时为止。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是革命为最终巩固其成果并推翻旧制度而把它建立起来的。之所以是一个政府，因为它拥有全部政权，得到革命军队和人民的支持。

它的任务简单明瞭：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迅速而果断地摧毁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干扰新制度的一切事物，并同样迅速而果断地创造新秩序赖以存在的一切。工兵代表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成立施加了影响，因而政府的纲领包含了为建立民主的俄国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工人和军队时刻准备着——同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并肩前进！他们说，行动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不容拖延，因为拖延等于死亡。

逮捕皇室全体成员。委派新官员，取代不能胜任的旧官吏。发布命令在军队中推行民主组织，并废除其可憎的奴役制，使人人法律面前平等，使各种自由权利合法化，取缔一切歧视，法令必须简明扼要，人人都懂，如“上层的阶级特权和对下层的阶级歧视从此取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令字数不多，却会把剥夺农民选举权的规定和士绅的无限制的特权连根铲除。再如：“地方自治政府在普选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自由的新俄国将从这字数不多的法令中产生出来。为摧毁军队中的主仆关系，古契柯夫只须立即发布几道命令，取消昔日有辱士兵人格、剥夺他们公民权利的一切措施。

如果临时政府履行其职责，如果它开始无条件地、毫不迟疑

地按民主的俄国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式而行动，如果它将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那它必然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今后斗争将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反对共同的敌人——旧制度的残余。

在革命后第一周也是最困难的一周里，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以其全部言行表明他们不愿分裂，而愿与自由资产阶级一起进行解放俄国的事业。现在要看临时政府怎样以行动来表明，它对于革命军队和人民所给予的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临时政府的成员！无产阶级和军队等着你们立即发布有关巩固革命和俄国民主化的命令。我们的支持视你们的行动而定。你们的行动越快，越果断，对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也就会越快，越充分，而这一会议的决议将决定俄国今后的命运。让我们认真地工作，破坏旧俄国，保护新俄国！我们要求你们立即实现你们的纲领！

《工人报》第一期，1917年8月7日引自罗伯特·保罗·布劳德与亚力山大·F·克伦斯基编：《1917年俄国的临时政府》（文件汇编）第三卷斯坦福1961年第1204—1205页。

文件17：策烈铁里论战争目的

同志们，在要求你们注意的决议中，我们声明：俄国民主派并无征服他国的愿望，它谴责兼并他国领土的行为，而新的临时政府又已经宣布了这种与旧制度的帝国主义野心决裂的立场。我们声明，俄国民主派认为临时政府有必要与协约国进行谈判，就上述纲领达成总的协议，并要求各国人民也这样做……我们宣布，俄国民主派正在履行并将继续履行其对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但是，它的愿望在俄国和其他国家尚未实现，因而它认为

有义务来保卫这个国家，而且根据当前战争进行的情况来看待这场战争；它认为，在俄国民主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这场战争就是俄国民主派的事业。有人对我们说，我国临时政府已宣布对割地赔款的谴责，它或许也可以与协约国进行谈判，拟定双方都赞同的协议，但是，所有协约国抱着共同目标提出这样的和平纲领来，而德国对此或会有所反应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接着他们又说：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在俄国和所有协约国都接受这些条件之前，我们不能认为俄国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民主的事业，是革命俄国的事业。我要说，同志们，在俄国所能采取行动的范围，我们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通过临时革命政府宣布，俄国谴责一切征服他国的计划，对此我们将恪守不移。但是，同志们，在其他国家也取得俄国那样的成就——俄国民主派应当这样做——之前，民主已在俄国取得胜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已成功地采取了它所认为唯一能拯救人民的方针，我们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同志们，如果在这时候，俄国被打败了，是不是整个俄国的民主也就失败了呢，甚至可以说，世界的民主也就失败了呢？在所有的交战国之中，只有俄国才能够提出我们所坚持的纲领，即谴责割地赔款的纲领。当前是一个转折点，世界大战全部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如果首先实现这一转折、首先扭转了局面的国家被敌人打败，同志们，这难道不就是民主被帝国主义打败了吗？（暴风雨般的掌声）

《消息报》第31期（1917年4月2日）第2版，见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二卷第1082—1083页。

文件18：策烈铁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时发表的演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与全国一切有生力量并肩作战，与革命军

队、农民以及一切进步资产阶级共同努力，才废除了专制制度，你们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工人同志们，你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成就足以与此相媲美。推翻旧制度后，你们从伟大人民的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当时的形势，认识到完成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样的阶级目标目前在任何国家都未完成，但〔你们理解到〕民主完全胜利的时刻已到来，工人阶级与全国一切有生力量与这一胜利是休戚相关的。你们没有充分的机会来实现这些非得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崇高理想，你们又不想成为运动崩溃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们当时不顾一切地决定强使事态按自己的意愿发展，那么，运动是会崩溃的。你们明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你们首先必须巩固自己的阵地，以促进俄国的进步和全人类的进步，向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迈进。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是你们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但同时你们保卫了刚刚得到的自由——你们控制着资产阶级，推动它进行战斗，支持它反对旧制度的坚决措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你们同革命军队一道，已经建立了一个守卫着新俄国的强大的自由堡垒……

临时政府应当享有充分的行政权力，只要这种权力是加强革命，推翻和破坏旧制度的。无产阶级是临时政府各项决议得以产生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确定这些决议的内容，并全力加以支持。但是，无产阶级为了要实行它的革命策略，必须要有组织，而且它的队伍本身要有严格的纪律。同志们，我知道，当前你们全神贯注于改善组织的问题，因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取得全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之后变得臃肿不堪，以致对付不了面临的具体任务了。我们认为，重新组织俄国革命先锋队的问题是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工人代表机构和一个士兵代表机构，所根据的原则是能使它们实际上控制资产阶

级，命令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措施，同时利用本身的权力支持行政机构进行的对自由俄国极为重要的活动，我们能不能做到？

但是，一旦临时政府抛弃革命的道路而选择妥协的道路，那么，同志们，你们和我们一起，毫不畏惧地反对政府，象废除旧秩序一样把它推翻。话又说回来，只要这个政府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走的是革命道路，只要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行动符合全国共同的民主的利益，只要临时政府举的是立宪会议的旗帜……而且，只要它的措施是为消灭旧秩序而制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你们，就要支持它……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结束我的演说时，同公众集会上一切演说结束时一样，高呼举国高呼的口号：“自由俄国万岁！立宪会议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

《消息报》第20期（1917年3月21日）第2—3版，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三卷第1219—1221页。

文件19：孟什维克评列宁的提纲

列宁结束流亡回国后，立即在代表会议上做报告，谈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当时不少听众嗅到了一点真正的、现实的悲剧味道。任何革命都潜伏有悲剧——革命转变为反动的悲剧。发展中的革命总是不仅受到来自右的，也受到来自左的威胁。只有革命能够保持在客观条件（生产力状况、人民群众相应的道德水平等等）决定的限度之内，它才能成功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并迫使反动势力退却。无视这一限度并力图突破它，这就最好不过地帮了反动势力的忙。

列宁来到我们中间，为的是要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反动势力。他讲话之后，我们可以说，他的每一重大胜利都是反动势力的胜

利。除非我们守住左翼防线，坚决打击列宁所领导的那个派别，使它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反对反革命打算和阴谋的一切斗争都会毫无希望。

必须进行积极的斗争和宣传工作，使革命不为暗箭所伤，这一箭是早在弦上，只待引发了。

曾希望等无产阶级珍藏心底的愿望来给自己帮忙的人都在为反动势力帮忙。这些人从这样的愿望出发，幻想实现这种愿望。然而他们只会激起国内占人口多数的落后群众来反对革命，从而为反动势力铺平道路。

革命无疑受到了威胁，必须给列宁及其支持者以坚决打击，切莫失之过晚。

《工人报》第24期（1917年4月6日）第1版，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三卷第1208页。

文件20：临时政府的政策

I·G·策烈铁里

俄国毅然为争取普遍和平而斗争的同时，仍必须进行这场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挑起的战争，而结束战争还不能单靠俄国的力量……

临时政府为了可能达到它的目的，必须明确地、强有力地声明……它已与过去的帝国主义政策决裂，而且应向协约国建议，首要问题就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查迄今为止所达成的协议……〔以便〕这一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总纲领不仅能以俄国的名义，而且能以与我们结盟的全体国家的名义提出来……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不应做任何会使我们与协约国断绝联系的事情……单独媾和是最糟糕不过的了。这会毁灭俄国革命，毁灭俄国

民主……单独媾和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如果我们造成了与协约国断绝关系的局面而必须单独媾和，那么随后俄国不得不立即参加德奥同盟一方作战，暂且不说日本还可能进攻的问题……设想一下，单独媾和之后世界其余地区战争还在继续，俄国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它同现在有着联系的各国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联系将会切断……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打仗的德奥同盟将迫使小伙伴军事上给以支持，这还用怀疑吗？……谁谈论单独媾和，谁就是在空谈……

再来谈谈采取攻势的问题以及国防部长克伦斯基同志和整个临时政府为努力加强前线军队而采取的行动。有人说，临时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长，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下才采取措施，使前线立即行动起来，以此来结束该政府同时在发动的争取普遍和平的政治运动……我们认为克伦斯基同志采取的措施会加强革命事业，并为我们达到国际关系和普遍和平方面的目的铺平道路。现在大家都清楚，只要俄国困于外患，它就需要一支能攻善战的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同志们，前线持续处于沉寂状态，这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和瓦解我们的革命和军队……

我想粗线条地描绘一下国内情况……俄国革命继承了三年战争和“6月16日”^①的十年反动这样沉重的遗产。经济紊乱不堪，财政极度困难，食物匮乏，国家面临饥馑——这一切都是旧制度的遗产。我们坚信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只有俄国民主派作出空前的牺牲和自我克制，问题才能解决。当前即使采取最为激进和极端的财政措施，财政危机也不能完全消除，国家财政也不能恢复正常。国家每年要支出160亿卢布，纯收入却不到支出的一半，仅仅进行财政改革或作些调整是救不了这个国家的。当

^① 指1907年6月16日选举法。

前必须花大力气，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才能有所裨益……各级的居民都应响应号召，作出牺牲和自我克制……有人指责我们〔在经济调整方面〕没有做一点事情，但是单单颁布一些法律是不会给俄国任何好处的……连那个批评改革的行动和要求加快速度的革命组织^①，至多也不过提出了宣言和原则而已。把宣言和原则变成行动，这是需要时间的。

至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任务在于为立宪会议来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基础。我们相信，把土地转到劳动阶级手中的问题，立宪会议是能够也一定会解决的。

当前俄国还没有一个政党会这么说：“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让位，我们来接替。”在俄国不存在这样的政党。（列宁：“存在这样的政党。”）他们〔布尔什维克〕说：“当我们拥有多数，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赞成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再来夺取政权。”列宁同志，你说过这话。至少布尔什维克，还有你，在正式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先生们，直到现在俄国还没有一个政党会站出来公开要求立即掌握全部政权，虽然右派和左派中都有些不负责任的人在吵吵嚷嚷……右派说，让左派去主持政府吧，我们和全国人民自有我们的结论；而左派也说，让右派去主持吧，我们和全国人民自有我们的结论……各自都希望对方一败涂地，然后全国人民就会要求自己出来领导国家。

但是，先生们，现在不是玩这类把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国的问题，我们必须联合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有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结束这种危及革命运动和……导致内战的做法。

……

^① 指布尔什维克。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消息报》第84期(1917年6月19日)第一版，引自弗兰克·艾尔弗雷德·戈尔德编：《俄国革命的文件(1914—17)》，纽约1927年第361—363页。

文件21：孟什维克的解释

工人同志们，革命在危急中！革命是你们开始的，你们必须来拯救它，因为哪一个阶级也不象工人阶级那样需要在革命中赢得如此多的自由权利。

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是战争——这是我们当前遭受的一切苦难的主要根源。

但是，俄国人都同意，与德国人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结束战争的。和平必须是普遍的。只有普遍的和平才对一切国家都有利。我们不准象列宁派那样，用瓦解军队以迫使已经发起的进攻停下来办法来取得和平。他们的策略简直就是对战场上成千成万奄奄待毙的人背后射去一箭。他们这样做过，我们就大吃其败仗；再这样做，将使前线士兵弟兄之间互相仇恨，革命军队分裂，或许还会导致兴登堡的再次入侵。

目前整个俄国民主派终于赞成基于民主的和平了。我们决不当向我们的军队不断发出呼吁，因为它正为革命执行着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它；我们必须向欧洲民主派，向协约国的工人也向敌国的工人不断呼吁，要他们最终迫使政府根据我们的条件来接受和平。

能够结束战争的不是前线的士兵联欢，而是各国无产阶级在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兄弟情谊，和它们为争取和平的共同战斗。我们的思想都应当集中到这方面来。

另一种威胁革命的危险就是国内的混乱状态：整个经济生活

紊乱、饥荒迫在眉睫，失业严重。列宁派要求夺取政权，这能使情况好转吗？不，不能！因为无论夺取什么也没有面包来供应人民。相反，它只能加剧全国的混乱状态，使人心惶惶，使人们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互不信任，互相仇视。而不少工人跟着喊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个危险的口号。苏维埃只得到少数居民的支持，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使那些还能够也愿意同我们一起保卫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我们一起来接受旧制度留下来的沉重遗产，共同来承担全国人民加诸我们身上的俄国革命命运的重任。

因此，应当认为立宪民主党的行为是叛变，是罪恶勾当。它拒绝服从民主派的要求，脱离政府，使组织不良的、奋斗着的革命民主派，尤其是无产阶级，不得不单枪匹马地与混乱状态和日益猖獗的反革命作斗争。实业家们的行为也同样是叛变，是罪恶勾当，他们在暗中破坏经济生活，以迫使孤立无援的工人阶级接受他们的条件……我们政敌所希望的，当然不会对我们有利。

我们虽然拒绝夺取全部政权，却必须考虑经济越来越混乱、国家有彻底崩溃危险的情况。我们必须对即将提出的要求仔细加以权衡，而且我们不能分散行动而必须在工会领导下统一行动。这样，与实业家的斗争才不致破坏工业本身。

因此，当务之急是帮助国家来调整和控制工业，为克服经济混乱状态而奋斗。一味批评并高喊“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那是不会给我们带来面包的！

要对政府各机构施加压力，但我们自己也必须能采取独立自主的行动，表现出创造能力和主动精神。

组织起来，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组织的周围，团结在苏维埃、我们在市政会的代表的周围，这应当是我们克服混乱状态的主要方法。

最后，一切黑暗势力、一切暗藏的和公开的反革命已结成联盟，这是威胁革命和我们的自由的第三种危险。

反革命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才会有力量，否则是不足畏惧的。为了使群众不致为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宣传所惑，我们需要在教育和组织方面不断进行工作。解除反革命武装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家广泛而积极地参加工会、教育组织和合作团体，特别是我们社会民主党，这样来与我们队伍中蒙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并努力加以克服。

工人同志们，我们，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不断地提醒你们，要警惕列宁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策略。

你们自己已经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了。那么，加入到孟什维克组织的行列中来吧！我们只有成为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强有力的党，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使它平安地召开立宪会议；也只有这样，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将安排俄国未来的立宪会议，才会注意听取并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呼声。同志们，行动起来！人人都来参加工会，参加我们的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的声明（1917年7月）》，载S·A·皮翁特科夫斯基：《十月革命（讲义）》，莫斯科1924年第161—164页，见前引F·A·戈尔德所编书第457—459页。

文件22：护国派的决议

A·N·波特列索夫

一、战争和革命使俄国面临保卫国家并把社会力量和经济力

量组织起来的民族目标。只有完成上述目标，才能拯救俄国免于灾祸，才能拯救革命。

二、上述目标能否完成，这与一切阶级、一切集团都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有责任来防止灾祸，并使国家将来能毫无阻挡地发展生产力。

三、只有在一个自由地存在和独立地发展的民主国家内，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才有可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整个运动，它的最终目标，与生产力的持续不断、毫无阻挡的发展，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因而，比起其他阶级来，无产阶级更关心在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完成民族目标。

四、在当前的危急关头，战争的破坏和国家的濒临瓦解将给一切阶级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无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关心国家的完整统一，使它继续存在下去。

五、无论从阶级发展还是国家发展的观点看，都必须拯救国家，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它有权期望其他阶级作出同样的牺牲。它也将影响民主国家内一切积极的力量朝这个方向发展。

六、为了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整个国家的利益，无产阶级必须作为负责达到这一目的的权威的组成部分进行活动。

七、这个权威自然必须集中其生存和发展与生产力的持续不断和毫无阻挡的发展（目前这样的发展受到致命威胁）有机地连在一起的一切力量。换句话说，它必须把无产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力量都集中起来。

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成民族的目标，实现联合政府当前的任务。这一任务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

1. 保卫国家，为此要建立一支军队，能抵御并打败侵略者，使各国民众盼望的民主的和平早日到来。

2. 组织国家的经济力量，为此要建立一套机构，这套机构要能动员全部经济力量，采取果敢措施，调整生产，组织分配，实行根本性的财政和社会改革，以推动、加强和发展俄国的生产力。

九、革命政府为把这一纲领付诸实施，必须坚决反对反革命力量和无政府主义，前者正蠢蠢欲动，后者则乘经济日益混乱之机，借助于某些政治集团不负责任的宣传，正渗入到革命运动中来瓦解运动。

鉴于以上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将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用种种方法帮助他们改进他们的阶级组织，并与工人阶级落后分子的叛乱和抢劫倾向作斗争，这部分人扰乱着阶级事业的正常和民主的发展。

只有作为民主先锋的无产阶级政党采取的策略能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到建立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工作中来，以拯救革命和国家，它所提出的纲领才能得到有力贯彻。党这样做时，还必须在有组织的民主派的推动下，保证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也认真负责地参加这项工作。

只有这样，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成为它的成员一事，才能对捍卫上述纲领并使之得到实现而不出任何偏差，真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B·I·尼古拉也夫斯基编：《A·N·波特列索夫选集》（作者去世后编撰），巴黎1937年第257—258页。

文件23：马尔托夫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

当前，对我们来说，只有一项决议是合适的：历史要求我们

来掌握政权。革命议会^①必须对此加以考虑，但是，千万别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在武装力量的压力下才决定的。群众可能会被谴责为缺乏政治觉悟，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朝哪个方向走？有人说，我们的问题只与少数人有关。可是，正是这少数人十分积极地朝着我们的方向走，而且支持我们。大多数人目前还处于消极状态。我相信，要是我们能同俄国全体人民商量，结果一定会得到革命民主派的支持。客观必要性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往前走。当前处于危急关头，我们的决议切不可引起民主阵线的分裂，因为面对敌人的进攻和蠢蠢欲动的反革命，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1917年7月16日马尔托夫演说（摘录），引自
A·G·施里亚普尼柯夫：《第七个年头的前夕》
第4卷，莫斯科1931年第289页。

文件23 a：马尔托夫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

一、立宪民主党代表退出临时政府一事表明，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背叛了革命。

二、立宪民主党一退出，工农民主派就得独自来收拾沙皇制度留下来的整个烂摊子：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经过阴谋策划而挑起并进行着的帝国主义战争；因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能拯救俄国的措施，我们无法消除由战争引起的经济紊乱；俄国资产阶级煽动并利用来削弱革命的民族之间的纷争。

三、立宪民主党的退出表明，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已明确地改变立场而反对工农民主派了。

四、革命民主派对这次攻击和挑战的答复就是要夺取国家政

^①马尔托夫在这里似指苏维埃。

权，这是它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做的事。它有责任这样做，以便俄国能成立立宪会议，把俄国人民为之与沙皇制度浴血奋战的各项原则付诸实施，首先把国家从窒息俄国革命、阻止我们巩固革命成果的这场战争中拯救出来。

五、因而全俄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中至少大多数人应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该政府应实施下列纲领：

1. 在有关各方放弃割地赔款的要求，并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立即为实现普遍和平而进行谈判。俄国必须停止参加四大协约国为达到其民族扩张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对军队进行民主改组，使之能保卫革命，反对任何国家的侵略意图。

2. 与反革命中心进行无情的斗争，对政府各部门机构彻底改组，以肃清反革命的影响。

3. 准备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立宪会议在最短期间在没收皇室、教会、寺院和私人庄园的土地分配给全体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改革。

4. 推行严格的财政改革：征收财产税，发行公债，实行国家垄断等。

5. 为消除经济混乱，国家应控制生产、分配和供应；应不断重新配置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逐步转到和平轨道上来。

6. 应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与工业资产阶级的歇业、拒绝供应货物、怠工等行为进行斗争，直至查封其工厂。

7. 应想方设法帮助革命自治政府的发展，对政治、经济、文化和职业性的革命民主力量的组织，也是如此。

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1917年7月17日），前引施里亚普尼柯夫所著书第295页。

文件24：孟什维克告工人、士兵书

在俄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敌人在彼得格勒大门口虎视眈眈，大屠杀的浪潮席卷整个俄国，反革命动员其一切力量，伺机蠢动，正是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竟然要求你们走上街头，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你们的示威将招致反革命的胜利。

在老奸巨滑的首领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黑帮分子，正等待着你们出来示威，以便把示威转变成一场大屠杀，并破坏立宪会议。

同志们，（仔细）考虑考虑你们示威的后果吧！

一切保皇派和黑帮百人团将能利用你们的示威把俄国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

电车和铁路的正常运行稍有中断，就会使城市居民和战场上的士兵得不到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

你们的示威将引起海陆军队队伍的分裂，将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便能轻而易举地攻占革命的彼得格勒。

你们的示威将使民主队伍中发生内战，而这只会危害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

士兵和工人同志们！把示威问题提交各厂和兵营进行讨论，说明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并坚决要求拒绝进行示威。

希望在这紧急关头无人会叛变革命的事业！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竭尽全力使那些被蛊惑人心的罪恶口号鼓动起来的群众平静下来！

希望人人都团结到革命事业中来！

牢记你们的革命职责！

俄国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孟什维克通讯》（1917年11月6日），载
《消息报》205期（1917年10月24日）第一版，
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
书第三卷第1771--1772页。

第六部分

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孟什维克党团结一致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实际上，1917年一年中，左翼国际派，在谴责政变时并不亚于他们的同事（见文件25）。此外，后来四年中，俄国的孟什维克经常批评新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见文件26、27、28、29）。不过，政变之后，马尔托夫及其追随者所控制的孟什维克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逐渐缓和（见文件31、32、33、35）。结果，运动内部发生尖锐分歧：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右翼，谴责布尔什维克是破坏俄国民主的反革命（见文件36和37）；但是，正统的领导则坚决主张，应当给予新制度以一定的支持，因为可能取代它的任何统治制度都会是反动的，因而会比布尔什维主义更糟。孟什维克领导人一直迫切要求结束恐怖统治，放宽经济政策。

到1922年时，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在俄国引不起什么明显的注意了。因为这时布尔什维主义的地位已经巩固，政府甚至禁止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话）公开发表意见。然而，西方少数对苏联的试验感兴趣而且对此虚心研讨的人，从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这些对苏联事务最有见识的学者那里搜集资料。

文件25：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声明

孟什维克国际派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起，准备捍卫自己在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革命纲领。这样，他们希望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中一切有识之士共同来捍卫苏维埃组织的完整性，并防患于未然，使可能毁灭俄国革命的事件不致发生。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按照预定计划在彼得格勒发动了政变，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临时政府。

这样一来，代表大会就无法讨论把政权转归苏维埃这个实质性问题，也无法讨论转归的方式以及这一问题应该用和平方式抑或暴力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了。

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如革命*最初六个月内指导革命的护国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国际派，保护布尔什维克免遭迫害和暴力、一贯坚定地为争取和平、分配土地以及民主政权而战斗的国际主义“统一派”，所有这些党派都突然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结果将对无产阶级和工人民主的事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次政变还把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铁路和邮工会、前线部队中的战士组织以及海军中央委员会都抛在一边。

我们了解到这些事实，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在这种形势下把政权转交工人与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意味着要打内战，而内战必将以反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我们要求代表大会一召开，就同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党派一起商讨，达成建立一个能得到所有民主分子承认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协议，和平地解决这一危机。我们还要求，在协商之前应停止战争行动。

我们的请求未被批准。大会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就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全部政权转归代表大会。参加这个有组织的民主运动的其他各派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承认这次政变，要么忍受篡权

* 这里似指二月革命——译注。

者的暴行。

我们不愿意为内战行为承担责任，便退出大会。我们是为了在各方面促进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这样做的。

我们的宗旨是：寻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次危机，结束民主派之间的争吵；团结一切民主派，反对反革命妄想利用这种形势把无产阶级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扼杀已经受到如此严重创伤的革命的企图。

我们向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所有民主派呼吁：绝不要让劳动人民之间打起内战来。

农民、工人和士兵一致团结起来，为共同的民主事业而奋斗。为了和平，为了农民能得到土地以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大家都要在争取成立由各民主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必须号召一切革命政党，参加民主运动的一切派别团结起来。

出席第二次全俄工人与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国际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彼得格勒委员会

1917年10月27日于彼得格勒1917年11月9日发表的声明见1917年10月28日的《工人报》。转引自B.I.尼古拉耶夫斯基编：《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纽约，1962年，第29—31页。

文件26：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

战时革命委员会强行封闭了我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以及其他报纸。但是，布尔什维克还不就此罢休。我党新的中央机关报《光线报》刚要出版，水兵和赤卫队占据了印刷所，就此封住

了无产阶级政党之口。

自称以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来行事的人，就这样又一次玷污了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他们压制无产阶级政党的呼声，不顾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和平谈判，以期毫无阻碍地达到他们把革命的俄罗斯的利益出卖给世界帝国主义的目的。这样的谈判自然同全世界工人所向往的正义和民主的和平毫无共同之处。

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妄想肆无忌惮地推行他们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因而使得甚至社会主义这一能拯救各国人民的学说的名称，也为千百万人所憎恨。他们妄想肆无忌惮地继续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政策，破坏国家的生产力，没收工厂和设备，平分消费品，瓦解工人运动。他们声称这种政策就是社会主义。事实上这是对劳动群众，对忍饥挨饿、疲惫不堪的劳动群众的最大的欺骗。这必然使无产阶级大批失业，进而遭到血腥镇压。无产阶级因而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今后许多年内将听任胜利的资产阶级摆布。

这批凭借刺刀攫取政权的暴徒，决心延长自己的专政。为此，他们正在摧残一切自由权利，包括出版和集会自由，成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他们要解散城市杜马，还打算解散国民立宪会议，就这样把抗击反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民主堡垒都扼杀于襁褓之中。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认为，处在目前这种类似沙皇统治时期最黑暗的岁月的情况下，如果党不力求明确而响亮地表明态度，就是失职。党希望团结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同篡权者进行斗争，告诫受骗的群众，要警惕布尔什维克居心叵测的呼吁，保住俄国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心目中的荣誉。

因此，中央委员会通告全体党员和工人国际的全体成员，如

果查禁报刊的活动再继续下去，中央委员会将为重建党的中央机关报而不懈地努力奋斗，并将不得不以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名义——在革命胜利九个月后，在自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治下——重建一个“秘密的”出版系统，就象俄国无产阶级曾从可耻的沙皇统治手中夺取出版自由那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1917年11月22日，载1917年11月22日《曙光》，见前引B.I.尼古拉耶夫斯基所编书第96—98页。

文件27：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

（一）无产阶级事业只有成为大多数人民的事业，才能胜利。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真正成熟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建立在轻视民主原则的基础上，相反，它必须以人民不受限制地行使统治权为先决条件，而这种统治权首先应当建立在真正平等、普遍选举的基础上。如果革命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建立专政，而又蓄意背弃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这实际上并不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了某种更高的形态。这只能表明给革命强加了一个空想的计划，一个同国家落后状态根本不协调的计划。在目前情况下，这种计划缺乏政治力量的可靠支持，只能与大多数人的愿望背道而驰。

（二）在俄国革命中，国民立宪会议显然是以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联盟为基础的、工人群众能最充分表达自己意志的专政的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专政认定自己的使命是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即缔结最有利于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全面和约；废除沙皇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土地交给人民；制定详尽的劳动法，国家在工人参与下调整生产。而与解散立宪会议有直接关系

的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把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队伍中去；另一批民主派则把立宪会议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盟国和国内反动派连在一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使广大群众对立宪会议丧失信心。结果，立宪会议可能被用来作为直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号和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重新选举的立宪会议，也可能背离其正确目标而成为反革命机构。

（三）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形势，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执行的居心叵测的政策，实际上培植了并将继续培植城乡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执行了具有同样破坏性的政策，他们谋求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和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继续通过宣传鼓动，竭尽全力支持由人民当家做主的事业，支持普选和立宪会议。党是根据既成事实而不是根据原则，把苏维埃制度作为起点的。所以在革命的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影响群众，帮助他们摆脱苏维埃专政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使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可能得到恢复。只有这样，立宪会议才能再度成为动员群众的口号、才能挽救与增强已被反民主主义的专政引入死胡同的革命。

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决议，1918年12月27日至1919年1月1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决议，1918年12月27日至1919年1月1日》，莫斯科，1919年第23—25页。

文件28：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L·马尔托夫

同志们！我们被要求批准一个条约，条约内容我们有些人并

不知道，起码我和我的同志们就不知道。你们知道要签署什么条约吗？我不知道。当然，你们布尔什维克是什么都知道的。照你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也都是简单的。说什么秘密外交！两周来，所有的自由报刊都被查封了。俄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概不负责。如果政府签署了这个条约，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要向政府开战。这个条约是第一次瓜分俄国；日本准备着第二次来瓜分；不久就会来第三次瓜分。按照这个条约，我们不得进行反对参加四国同盟的政府的宣传。作为交换条件，四国政府也不得做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向列宁祝贺。从今以后，他不仅有赤卫队保护，还有德皇威廉保护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要求本届代表大会不批准这个条约。人民委员们的苏维埃无权缔结这一条约，它应当引咎辞职，让位给一个能够撕毁这个和约并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

见丁·班扬和H·H·费希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文件与资料》斯坦福1934年，第532—533页。

文件29：告男女工人书——怎么办？

孟什维克纲领，1919年7月

同志们，我们困难重重，外有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等敌人围困，内有种种危险和灾难，如粮食匮乏，燃料不足，货物短缺，物价飞涨，工人群众灰心丧气，麻木不仁，农民和贫苦市民怨声载道，等等。情况既然如

*A·I·高尔察克将军（1870—1920）、A·I·邓尼金将军（1872—1947）和尼古拉·尤登尼奇将军（1862—1933）都是内战期间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指挥官。

此，为了挽救俄国革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正是这个问题折磨着一切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他们看到，革命内部的力量在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而绝望的群众又用罢工和骚乱来发泄不满，形势因而更加恶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呼吁持各种政见的有责任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非党工人——重视这个纲领，中央委员会认为，它为摆脱目前的严重局势，摆脱革命所陷入的绝境，指出了唯一的出路。

一切有责任感的工人，必须把捍卫革命并保证革命正常、健康地发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便能团结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从而能把社会主义原则日益广泛地扩展到整个政治生活中去。为此，我们必须保持和加强我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把它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为恢复我国经济奠定基础。四年对外战争和两年内战使经济大伤了元气。

我们怎样去实现这些目标呢？

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赢得战争。要保卫工人政权和革命的成果不受敌人侵犯，为国家提供食物和原料，促使同盟国解除使我国经济窒息的封锁——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战胜正在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匪帮，向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表明，革命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战争与政治经济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仅仅战胜高尔察克或邓尼金，把他们的军队从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彼得堡赶走，还是不够的。我们务必打得他们一蹶不振，三个月之内无力卷土重来。务必使他们找不到大批农民、工人和哥萨克来为反革命事业作战，也无法以小股部队窜犯广大地区。由于工农的漠不关心，怨声载道，疲惫不堪和大失所望，革命政权已伤元气，无法动

员足够的力量来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顿河和伏尔加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开始，群众欢迎革命政权，欢迎把他们从地主和白卫军手中拯救出来的政权，但是两个月后，他们就盼望白卫军回来，把他们从革命制度带来的困苦中，从玷污我们事业的暴力和不法行为中拯救出来。

要想成功地击退反革命，我们还必须改变经济的混乱局面和工人越来越贫困的状态，否则我们便无法供应、无法运输军队，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积极主动的支持。我们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必须比苏维埃俄国迄今所实行的这一套更好，我们必须比过去更会利用有助于恢复经济的各种社会力量。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经济政策，不再心血来潮，片面行事，力戒忽东忽西，忙于堵漏。我们必须目标单一，计划明确，使国家从事国力达得到的一切工作，而让私人、民间的组织和团体去完成更适于他们去做，而且也能完成得更快更好的任务。

同时，要想解决军事问题和满足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我们还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政治问题。在目前这种制度下，一个仅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党独揽大权，进行统治，不受群众监督，可以任意采取恐怖措施，因为群众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这样的制度显然不能解决军事防御问题，也对付不了经济上的混乱局面。它挥霍了可用于改善工人生活的大笔大笔公款，它在各省把权力和特权授与野心家和少数工人农民，他们看不起自己的同伴，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没有权利的臣民；各地的政府机关和组织，都是无能的官僚机构，这类机构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的才能，而是看他对象是否驯服。

在这种制度下，官僚主义者和享有特权的共产党支部，就能够阻挠和反对不合他们口味的任何措施，不管这些措施是多么有

益和必要。公安机关和契卡* 对每个工人和农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就象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样。工农群众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这些事情都由一小撮人在马拉松式的会议上进行处理，局外人一点也不知道。在这危急关头，在这革命只能靠人民奋起，靠群众的富有创造性的有主见的革命活动才能得救的时刻，身负重任的无产阶级分子深感震惊，他们发现普通工人和农民都已陷于冷漠，消极地等待着危机自行解决，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力图激励他们挺身而出，击退反革命，改善生产和劳动纪律，可是他们只是迟钝地嘟哝一句话：“这不关我的事”。工人农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受到种种限制，不能自由自在地参加政治生活。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不再感到政府及其官员是他们的办事员和勤务员；相反，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假借他们的名义进行着统治的这个政权，实际上是脱离人民大众的。

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继续积极作战，并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还应该同样彻底地变革政治制度。

为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觉悟工人提出下列措施。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些措施能阻止经济崩溃和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使工农重新团结起来，使工农大众对革命重又满怀信心，使他们得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增强革命的俄国的战斗力，迅速战胜反革命，结束内战。

经 济 措 施

1、农民应保留革命时期夺得和分配的公有和私有土地。以集体或以个体为基础，可由农民自行决定。其他迄今尚未分配的土地，应长期租给贫苦农民和农民协会，但国营的或由租借人正经

* 契卡是“肃反委员会”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1917年12月成立，目的是镇压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实际的或嫌疑的政治反对派。

营着并将继续经营的大型示范农场所占地除外。解散“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应毫无例外地予以执行。* 农业公社不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迫方式来建立。政府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农具和种子，不应只公平地分给公社，还应公平地分给公社和苏维埃土地上的所有需要这些东西的农民。

2、目前的食物供应制度，应由基于下列原则的制度来代替：

(1) 国家应按议定价格购买粮食，其中包括大量以货易货原则换来的粮食；然后以低价卖给城乡最贫穷的居民，差价由国家补贴，国家应通过其代理机构、合作社或私商进行收购，付出佣金。

(2) 国家应以相当于生产成本的价格，从富饶省份的富裕农民手中购买一部分余粮，数量应按当地自由选举的农民代表的意见来定。

(3) 粮食应由合作社和工人的组织采购，采购到的库存粮食应立即转交政府的食品供应机构。国家有权向蓄意囤积居奇的大地主征用粮食。运输事宜主要由国家、合作社和工人组织处理。所有反奸商支队都应予以解散。除在特殊情况下有中央立法机关的决定作根据之外，不应禁止从某一特定地点运出粮食。

对愿从食物奇缺地区迁到富庶地区定居的工人及其家庭，国家不仅应给予物质帮助，还应通过行政措施给以协助。

3、对国计民生十分重要的主要工业企业，如煤矿、冶金工厂、金属加工工业的主要部门，等等，应由国家掌握。但是，在采

-
- 1918年5月，列宁号召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用以没收富农的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是为了把阶级斗争扩展到农村，并为城市居民和贫农提供更多的食品。然而它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因此1918年底政府命令解散贫农委员会。

取另外措施看来有利于改善和促进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的一切地区，可以采取由国家和私人资本联营的方式，或在国家控制之下强行组成托拉斯的方式，或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租让制，组织主要工业企业。其他所有的大企业，除国家出于财政或其他原因必须对之进行无损于生产的控制之外，一般应租给合作社或新企业主，或在原企业主承担恢复和组织生产的义务的条件下，租给原企业主，从而逐渐转交给私人经营。国家应把燃料和原料调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企业和地区。

4、小型企业决不应实行国有化。

5、国家应根据既定计划，在合作社和私商的帮助下，把诸如纺织品、农具、盐、燃料等日用消费品，调配给各地区。

6、至于其他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贸易，国家应允许合作社和私营企业自由经营而不加任何限制，但须加控制甚至垄断的奇缺物资（如药品）除外。

7、信贷制度必须改革，以便尽量方便工商业利用城乡生产者所积累的可供使用的资金，并为私人在贸易、工业和农业中发挥积极性提供机会。

8、管制投机倒把行为，应由法院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一切任意征用、没收和扣押货物的行为都应受到惩处。法律保护一切实行租让的原国有化工商企业的所有权。一旦出于公共利益需对这类企业加以没收时，应有最高立法机关的决定作根据，并按最高立法机关确定的条例进行。

9、工会除直接参加制定规章外，应主要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与国家 and 私人企业主打交道。工会执行这一职能时，不应受任何国家机构的干涉。

10、应根据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水平来提高国营企业的工资比率，并确定私营企业的最低工资比率。

11、应撤销有关消费合作社的法令。工人合作社和一般合作社，应视为自治的组织加以维护，对它们不应强行指派人员或干涉其他内部事务。它们应有权进行非商业性活动，如出版、教育等等。

政 治 措 施

1、投票选举苏维埃成员的权利，应扩大到全体男女工人。城乡苏维埃应由全体工人自由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并可自由地通过口头和报刊进行竞选。各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应定期改选。苏维埃无权借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个别成员或小组。所有官员和公共事务机构，都应隶属于地方苏维埃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2、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再度起到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作用，它的活动应公诸于众，受公众监督。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批准。任何法律概不生效。

3、应恢复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凡属代表工人的党，都有权使用并允许使用会议场所，得到纸张的供应，保留有印刷所等。如出于抗击反革命战争的需要，必须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则应由立法机关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侵犯基本自由权，并只能由法院及其直属机关付诸实施。

4、应改组革命法庭，法官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只有法庭及其所属侦察委员会才有打击反革命的任务。所有官员在执行任务中犯有不法行为时，在每一案件的受害者起诉下，都有责任出庭受审。政府不得把恐怖作为统治手段；死刑应予废除，法院以外的一切侦察和刑讯机关，如非常委员会（契卡）等，也应废除。

5、党的机构和支部不应是国家权力机构，党员不应享有任何物质特权。

6、应扩大地方自治，以精简官僚机构。

7、对不论什么原因脱离俄国的民族，应奉行谅解政策，以便迅速结束内战，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的统一。哥萨克地区，如顿河、库班、捷尔沙、乌拉尔、阿斯特拉罕、沃伦堡等地区，都准予享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对其内部事务或土地使用制度不进行任何干涉。西伯利亚应实行区域自治，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应得到承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9年7月12日。见《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得萨，1920年，第9—15页。

文件30：致德国同志们的信

L·马尔托夫

我终于有机会向你们，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祝贺德国革命。你们收到的这封信，无疑会在把我们与西方隔绝的这堵墙上，打开第一个缺口。我们处于同德国完全隔绝的境地，要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有个看法，就只得依靠俄罗斯通讯社的矛盾的、不定期的、十分可疑的报道。因此，我们对德国事件的兴趣之强烈，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不管其可靠性多么值得怀疑，都使我们万分焦虑。当然，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是很多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发生在那样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即使没有经历过两年俄国革命的人，也会为这场革命的前途担忧的。我们自己的经历，实际上对那些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发展动力的政治家和政党、对那些企图主宰革命，因而越过了区分政治现实主义与空想和冒险主义政策的界限的政治家和政党，有颇多发人深省的教训……

不管我们现在多么疑虑不安，我们是把柏林而不是把莫斯科

看作是革命的中心的。如果你们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收到这封信，那么我们中央委员会就请你们转达我们党对大会的祝贺，和对德国革命的欢迎。我们还请你们向大会宣布我们的决议和呼吁中所包含的思想，即现在德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有了这个心脏，由于战争浩劫而被迫起来革命的落后国家，就能摆脱困境。还请你们告诉德国同志们，我们一如既往，怀着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感情；我们的代表一有机会就要去德国，去建立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永恒的联系；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两个革命民族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建立起紧密联系的时刻的到来。

L·马尔托夫《给德国同志们的一封信》。载
《社会主义者》第52期（1918年12月28日）第
10—12页。

文件31：在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9年11月）

F·唐思

在俄国革命史上的这一伟大时刻，我走上讲台向俄国全体工人和农民，向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表示祝贺。你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为什么不让我党派遣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选出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决定应主席团的邀请前来参加大会，以便能在这一历史关头，当着俄国革命的朋友，也当着敌人，恳切地向全体工人农民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阵线，来抗击反革命和掠夺成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

尽管我们极不赞成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尽管我们遭到这个政府的迫害和暴力压制，可是俄国革命的一切敌人要懂得：只要事关保卫革命，我们党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因为我们捍卫

革命，并非捍卫这个那个政府或政治集团，而是捍卫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普天下工人的共同事业。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捍卫俄国劳动群众两年半前掀起的强大的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成果，这一浪潮向全世界蔓延，震撼着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奴役的根基，震撼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根基，为普天下工人争取彻底的社会解放，举起了战斗的大旗……最后，让我高呼：统一的革命阵线万岁！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万岁！俄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万岁！

见《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得萨，1920年出版，第50—51页。

文件32：革命少数派的专政

L·马尔托夫

当阶级斗争进入内战阶段时，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时代，即代表广大群众利益，但政治觉悟高于群众的革命阶级的先锋队，有责任以革命少数派专政的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只有目光短浅的教条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种前景。实际上争论的焦点在于，任何革命发展到某一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实行的这种专政，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并且建立一整套制度使专政永久化呢，还是相反，尽快地以这个革命阶级或几个阶级的有组织的主动精神和自治，来代替这种专政。这第二种方法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他们也因此而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第一种方法则是共产党人的方法。

L·马尔托夫《模棱两可的话可以休矣》，载《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得萨，1920年，第49页。

文件33：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共同行动纲领

社 会 革 命

1、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古老帝国崩溃，历史上形成的疆界重新划分，整个欧洲大陆遭到蹂躏，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因此，它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开端。

2、这些先决条件可表述如下：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按照原先那种建立在个体资本家竞争基础上的生产、分配、国际贸易和信贷制度，来重建被战争弄得枯竭的经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来限制这种竞争，并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调节经济生活。

用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战争及其后果把工人群众变成了革命阶级，要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要求，只有大大减少资本家的收入，迫使资本家来承担战争债务的主要负担。然而，这一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家是政府的靠山。

从政治角度来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自己没有能力把国际关系建立在持久和平的基础上，使之稳定下来，也不能使经济制度摆脱用于备战的巨额非生产性费用的沉重负担。

3、因此，世界规模的社会革命，看来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

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7、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机构范围内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使政治革命获胜的，因为居于少数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拥有物质的和军事的手段来维护其统治，绝不愿把政权合法地转交给工人。因此，手中无权的大多数人，应该准备用武力而且能够用武力推翻掌权的少数人，这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

9、无产阶级专政以解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者为目的，这个专政只是用于反对目前垄断着生产资料、损国民经济以自肥的寄生性社会集团。只要他们企图反抗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就代表革命国家以有组织的暴力来对付他们，所采用的强制措施的形式和范围，则视反抗力量的强大程度而定。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工人群众的其他分子进行专政，因为他们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主动和自愿地进行合作，对社会变革的进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无产阶级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来解决经济形态的变革问题，才能确保他们的合作。这里所说的工人群众的其他分子，是指城乡非无产阶级的小业主，白领无产者和现代工业中的大部分技术人员。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在他们对自己真正利益越来越认识的基础上的。不存在什么把无产阶级的意志强加给本国大多数人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就是劳苦大众的革命先锋队，它具体体现了劳苦大众的意愿，而且使这种意愿能得以实现。

10、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与个人专政即寡头政治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比如说，少数有觉悟的革命者对政治上还不觉悟的大多数人进行专政，即令这种专政自称是为了全民利

益，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一种革命专政的概念，这种专政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劳动群众不应该只是社会实验的对象。社会民主党人把建立或明或暗的少数人专政的倾向，都看作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展进程和社会革命的成果的巨大威胁。因此，社会民主党反对把恐怖行为作为革命专政的手段的任何政策。那种政策实际上必然意味着少数人企图保持和巩固还未得到劳苦大众欣然批准的政权。

11、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同民主的原则不独不矛盾，相反，它第一次为充分实行民主原则提供了机会。因为只有当无产阶级各个组成部分都能自由表述各自意志从而形成阶级的真正意志时，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而不会培植权力高于工人阶级的独裁者）；资本主义民主的许多因素总是倾向于阻碍和歪曲群众自决，无产阶级的意志是无法在这种民主的条件下自由表达的。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概念不可分割的民主，其基本标志是：自上而下一贯行使的权力必须真正是人民大众的权力；官员必须经过选举，对群众负责，并且享受极少的特权。应尽最大可能进行自治，尽量少培植同发展生产力无关的文武官僚。最后，应尽可能广泛地开展思想争论和宣传工作。

12、历史上的每一种民主都只为一定社会集团所享有。在该社会集团内部，民主原则才得到运用。如，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有产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压力下，资产阶级民主才会多少给无产阶级（魔力范围以外的一个阶级）一点政治权利。自由的美利坚共和国是作为白种人的民主建立起来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产生的新兴的工人阶级民主，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民主。所以，一方面，阶级专政必须具有民主性质，另一方面，对不属于享有社会生产劳动参

加者的民主之列的社会集团，这个专政可以剥夺或限制其公民权利，两者之间在原则上并无矛盾。否认劳动阶级有权这样对待其他集团，或者根据抽象民主的所谓理想，对是否能行使这种权利提出争议，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根据无产阶级的目标，来决定新的工人的民主所应限制的范围，而无产阶级的目标是变革社会，使整个社会都参加集体劳动。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象以往历次革命那样，消灭旧社会的非生产性阶级或把这些阶级变成被剥削阶级，而要把这些阶级吸收到工人团体中来。因此，工人阶级民主的倾向不是要限制，而是要扩大。不准被推翻的阶级行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这与工人阶级民主向普遍民主发展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只要剥削阶级还受到控制，建立普遍民主的目标就是不可思议的。

13、用压制和剥夺非生产性集团的权利（如选举权，结社和出版自由等等）来限制民主，无论从历史或从逻辑而言，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必不可免的特征。不过，当无产阶级在长期内战中初次掌权时，可以强行规定这些限制，作为革命自卫的临时的和合法的权宜之计。这些措施恰恰说明这种专政暂时还是虚弱和不巩固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把它看作是自己国家的政府。内战的条件越是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就越是说明这种情况；或者这个国家进行激进社会主义变革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没有充分发展，或其他劳动群众主观上还不能完全胜任革命运动赋予他们的历史任务。因此，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必须用限制民主的方法进行自卫，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格外谨慎，而且要逐渐进入摧毁旧的社会形态和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工作……

因此，在革命过程中，一旦国家政权落入工人阶级的少数积极分子手中，他们又不能克服自己地位的客观矛盾，反而步入歧

途陷入经济空想主义和政治恐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应采取如下政策：一方面，无条件地支持这个少数派打击反革命，捍卫工人政权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机构。同时，努力适应社会发展水平，改革经济政策，政策的目的是使革命所创建的国家政权的形式民主化，废除恐怖主义的统治方法，否则，该国的无产阶级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就不能避免出现大倒退；设法将空想的和恐怖主义的少数人专政变成真正的劳苦大众的政权。如果有人建议，由于大多数人还不赞成社会主义，部分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团体联合，而且按照民主原则，应该把这种联合看作是民族意志的真正体现。那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必须拒绝这种建议，因为这会腐蚀群众的思想意识，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有害的。用这样的联合来与无产阶级中较积极的那部分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激情（即使只是一时的冲动）唱对台戏，势必在这部分人和其他劳苦大众之间挖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来。

1920年8月至4月党代表会议决议，见《社会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戴得萨，1920年，第24—25，27—29，31—32页。

文件34：关于国际的决议

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第二国际受到来自内部的致命打击，其主要成员的那些政党放弃了阶级斗争，采取了社会和平的政策。最近，第二国际遭到最后的失败，这些政党中的某些政党，无视社会和平政策的明显失败，仍顽固加以推行，不回到他们在阶级战争中的革命立场上来，因此，正确理解现时代的革命性质的那些政党和成员不可能结成联盟。早在1919年5月，中奥委员会就注意到第二国际的历史性破产，谴责那种把不同的、分

裂的成员，生硬地凑成纯粹表面的联合，以重建国际的企图。……

西欧和美洲大多数共产党极端弱小，又四分五裂，因此第三国际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毫无联系。然而，有人跃跃欲试，力图利用俄国强大的政治组织和俄国革命在西欧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把那种在俄国生活的特定条件中形成的包括少数人的恐怖专政和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內战的策略，作为臆造的万应灵药，强行推销给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于妄想使整个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用同一策略和同一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以及力图根据第三国际所固有的，作为它基础的路线，建立一个国际指挥中心的政策，人们只能称之为空想和宗派主义。

然而，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指挥中心，在第二国际明显失败的形势下，有权并有能力代表工人阶级中所有的革命分子。这对整个国际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阻碍了它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毫不迟延地创立一个由欧洲工人阶级中所有革命分子组成的新联盟，它既要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又要摆脱共产党的宗派主义的影响。……

这一联盟应该比迄今为止的任何联盟团结得更紧密，更有效，应该反映出全世界社会党是遵守共同行动的一些原则的。例如，各党都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是刚刚开始的时代即将担负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通过工人阶级专政而不是少数人的恐怖专政来进行；各国根据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可以采取不同的专政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合法的，正当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欢迎德国独立社会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提出的建议：召开革命的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并按照上述共同的行动原则建立一个国际中心。俄国党打算十分积极地参加这一代表会议，目前正在筹备。

关于国际的决议（1920年8月12日）见《社会

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得萨，
1920年，第37—38页。

文件35：专政和民主

L·马尔托夫

专政和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发生深刻革命这一关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之一。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我国的著作都开始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俄国革命，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

在群众性民主的基础上，共产党中少数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打算来统治国家，这是很清楚的。不仅普选权这种民主，就连苏维埃民主也不会让共产党的少数人得逞。……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要采取的特定形式的革命专政，客观上好比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历史利用这把手术刀，以大量鲜血和精力为代价，使我们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脱离基于阶级的旧的君主制度的机体，呱呱坠地。

但是，无论革命专政采取什么形式，它毕竟是个事实，其持续时间的长短证明，在现存的社会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革命专政是革命必经的阶段。虽然这种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所引起的，但是迄今它已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得到了发展，而且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因此，它自然成为吸引外国一切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一切保守分子仇视的主要目标。因此，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着来保卫采取苏维埃共和国形式的俄国革命，使它免遭世界反革命的进攻。此外，革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在进行早期革命运动时，倾向于仿效我国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方法和口号。俄国共产党人有资格谈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而它已经是许多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强大、明确的趋势，

而不仅仅是开始困扰欧洲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幽灵的别称了，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主义给大多数西欧社会党人这样的印象：它不仅仅是取得胜利的革命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且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那么，这是不是就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世界发展的道路不必经过民主”，落后的俄国凭着天才的直觉而发现的一些形式，恰恰就是世界无产阶级获得社会解放的必经之路呢？

在社会结构上，俄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怎样不同，俄国革命爆发时的形势，同那些国家的当前形势和蕴藏着革命火种的情况，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这些因素我们已经提到过：经济极度衰竭，大量劳动力被抽去，组成非生产性的消费集团（军队），工业吸收了大批没有经受过阶级战斗洗礼的新手。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这些普通人组成的、缺乏统一的阶级利益因而十分松散的大军，很可能会起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进程很可能就会展示出十分类似俄国出现过的一些形式和倾向。

世界发展必然经历民主的阶段，这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虽然在到达民主之前，不得不经历一些作为中介的革命阶段。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是在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捍卫整个运动的利益。必要时，我们必须捍卫运动的未来而反对现在的运动，以便使未来更快到来。我们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它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达到没有限制的民主，这是粉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巩固新的生产方式的最可靠的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帮助革命群众缩短痛苦的试验过程，找到对他们斗争最有利的方式和方法。

从这个观点来看，俄国关于革命专政的政治辩论，对西方刚开始发展的革命运动是头等重要的。由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国际团结，反对死灰复燃的空想社

会主义雅各宾式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倾向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肩上。但是必须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和精神来进行这场斗争，达到把无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进行斗争时，不得因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和不守法的倾向而倒向反动的社会改良主义，不得为纠正空想社会主义对阶级战争所作的歪曲而乞灵于机会主义的“阶级和平”，不得根据出现了粗野和不合理现象的俄国革命这面哈哈镜对世界革命过程的歪曲反映，来放弃世界革命。

L·马尔托夫：《专政和民主》，见《一年之内（论文集）》彼得·格勒，1919年，第19，27，34—36，37—38页。

文件36：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

P·阿克雪里罗得

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坚决要求代表会议致力于了解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真面目。我们认为，使国际能对俄国情况作出独立判断的最好方法，是派遣一个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组成的国际调查团，赴现场进行彻底调查和观察，从而能对布尔什维克的实际情况以及俄国劳动群众的处境、心情和目标得出清楚的、可靠的印象。俄国代表团对代表会议只有一个要求——派出这样的调查团。

我们很清楚，决不能期望你们只凭我们提供的论据，就会站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一边，但是，我们必须仍然坚持以他们的起诉者的身分说话的权利。否则，我们提出的派遣调查团的建议，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而我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恰恰就是要说明这一建议，并为之辩护。此外，利用这一讲坛，使国际无产阶级注意到俄国工人和社会党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政权的积怨，遣

责和抗议，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西方兄弟党的报刊，除极少数外，禁止登载有关俄国的任何报导，这无论如何会令人怀疑，它们是否不加批判地支持了布尔什维克以及在世界上传播着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神话……

资产阶级报刊和政治家把西方无产阶级群众的每一革命行动，意志的每一强烈表现，都打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印记，而且把矛头首先对准西方为布尔什维克唱赞歌的同志。他们赞扬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最革命和最彻底的形式，欢呼布尔什维克暴政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他们之中谁都没有费过力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布尔什维主义，也没有为自己和别人弄到有关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性质和结果的可靠材料。他们根本不懂，布尔什维主义事实上不过是一种野蛮的有害的倒退，倒退到巴枯宁主义*、涅恰耶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换句话说，倒退到工人运动最早最不成熟时期所出现的革命思想体系。布尔什维主义的崇拜者使出浑身解数，大唱赞歌，帮助这些倒退的学说传播开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为国际反动派和资本家政府提供了方便，使它们能利用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作为对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武器。为使国际反动派和资本家政府不能这样来利用布尔什维主义，或至少使它们难以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不是掩盖布尔什维克所作所为的真相，而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这里再重复一遍我在伦敦和巴黎对英法两国的同志们说过的几句话：

-
- 巴枯宁主义指的是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迈克尔·巴枯宁（1814—1876）的学说，巴枯宁主张暴力行动能使人获自由，因而具有创造性。
 - • 关于涅恰耶夫主义见第78页脚注2。
 - • • 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起源于法国激进思想家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布朗基主义认为，鉴于群众对政治的淡漠，杰出的知识分子为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不得不建立高度集中的密谋组织。

有关俄国现状的真相大都是资产阶级报刊而不是社会民主党报刊报导的，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件可悲和令人不安的事，也是耻辱和不祥之兆……

专政和民主问题，确实不应该放到这次代表会议上讨论，应该是早在几个月之前的党的会议和报刊上讨论的。说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确实是十分新的提法。在被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一向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统治是以民主政权为先决条件的；无产阶级统治只能在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它当然不要求用暴力来破坏民主。只是到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全俄的民主派，成功地散布神话，说他们夺了权，意味着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地位最高——只是从那时起，才出现这股狂热，修正了我们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关系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无产阶级并非处于最高地位；它是奴仆而不是主人，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及其御林军压迫无产阶级，践踏它的权利，达到前无仅有的程度。实际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相反；要使我们西方同志们理解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派遣国际调查团来俄国进行实地调查……

如果国际不是进行单纯的军事干涉，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作为保护俄国革命和俄国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救星和解放者进行干预，那么国际就能把俄国从〔群众被剥夺民主权利，反动派得势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如果兄弟党只反对协约国的干涉，那么它们就有盲目地、不自觉地充当工具的危险，就会帮助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彻底战胜全俄的民主派，奠定心理的基础。果真如此，国际就得对俄国革命的最终失败，对国际无产阶级一切灾难性后果，负一定责任。

正如俄国代表团提议的那样，国际社会主义调查团对俄国现

状的调查，会使西方同志们了解这一危险，并向它们表明它们对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应负的责任。这个调查团必将使俄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不仅为了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民主派的利益，也是为了国际本身的利益。

P.阿克雪里罗得《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1919）》，载I.策烈铁里和W·沃京斯基合编：《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国际：P·阿克雪里罗得文选》，耶拿，1932年，第168—172页，176页。

文件37：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给L·马尔托夫的信

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专政的评价同奥·鲍威尔的评价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他心目中，这样的评价可以作为西方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种理论基础，但在西方各国中，这一评价是不提的。您承认我们必须，而且有责任同亚洲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然而，据我看，您对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估计与我们党对它进行的斗争似乎有很大距离，甚至有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以种种方式对党的政治实践产生不良影响，并且使意志薄弱和精神不振的人经不起考验而犯错误。你举出法国革命，特别是1792—93年〔原文如此〕的雅各宾派作为例子。梅林**曾把这个例子当作法宝——的确不仅

-
- 奥托·鲍威尔（1881—1938）是奥地利社会党的主要理论家。
 - • 弗朗茨·梅林（1840—191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

社会主义者，而且激进的资产阶级作家、政治家和一般的“庸人”，也都把它当法宝，虽然各有各的动机——十月革命之后，他立即用它证明布尔什维克政变和随之而来的野蛮的暴力专政是正当的。如果法国革命这个例子可以当法宝使用，我的回答就是，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表面上想必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不过是原件与精巧的赝品之间、或者是重大事件同这一事件在舞台上的重现之间的相似罢了。

另一方面，西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理想化，竟然认为这是巴黎公社的再现，或者不如说，比起公社来，伟大得不可比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对这种看法，我的回答是：从公社的起因和所处历史条件，它的组成和整个特点来看，公社以及产生公社的革命，同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及随后的专政如此不同，因此把后者捧为公社的再现，这是对社会主义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亵渎。

对列宁及其一伙在我党第一次伦敦代表大会（1903年夏）上的行为以及后来制造的分裂，我当时就认为是激进派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发展的征兆。代表大会刚结束，当时我们还在伦敦，我就向同志们谈了对列宁以涅恰耶夫和波拿巴的精神进行的，反对所有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的活动的内在涵义以及这种活动取得的成效。同时，我在《火星报》上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历史上出现两次的事件，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但是，历史的笑剧也各个不同。布尔什维克们的激进主义，是对其原型的可怜的拙劣的模仿：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以沽名钓誉的“英雄主义”^{*}和超人的不道德思想作为它的心理学基

^{*} Herostratism: 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沽名钓誉。

础，雅各宾派获得政权是法国大革命实现其基本方针的结果，这里要记住两个要点。第一，雅各宾派的实际目的和政策同他们的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不是完全矛盾的，两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们说来，情况恰好相反。第二，雅各宾派的统治并不表示某一派或某个集团掌权，没有用武力排斥或镇压任何支持过革命的其他民主派；相反，雅各宾派是由革命民主主义的所有主要成员组成的。而布尔什维克则用暴力独霸大权，排斥整个社会民主党，成了独裁者。

在革命前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已惯于如此行事，列宁及其战友就是靠党内政变和波拿巴主义以及涅恰耶夫主义的方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说不二一的独裁者。早在三月革命时，列宁主义者就开始运用蛊惑术进行斗争，力图把整个社会民主党置于死地，经过多年党内的权力之争，他们煽动的技巧和方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蓄意乘党困难之机，出来夺取全部政权——这一切竟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其实早在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就一步步地背叛马克思主义了。

而对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的最大背叛是，当先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专政打算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建立共产主义。我无需提醒你们，当马克思主义刚一传入俄国时，它就同主张俄国历史上必定由封建主义和半原始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展开了争论。列宁及其御用文人也积极参加了那场论战。结果，他们使十月革命道路永久化，犯下了彻底背叛的罪行，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以沽名钓誉的方式进行可耻的冒险活动，这同他们的恐怖政体以及所有其他罪行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十年前，我曾把列宁主义者比作社会民主党内的黑帮百人团

之流的双料罪犯，并非仅仅出于辩论时激情的冲动，而是出于深深的信念。这个比喻对于他们现在夺权和维持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也是符合的，如果布尔什维克象法国雅各宾派那样，是唯一为完成革命所赋予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到底的集团，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其他人会容忍这些措施和现政权的，如果布尔什维克象1792—93年的雅各宾派一样具有历史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党反对他们就会扮演吉伦特派*的角色了。吉伦特派（尽管他们的动机不是为钱，也不是自觉地同资本家联合）所代表的与雅各宾派所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我们完全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反对口头上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奋斗的亚洲专制制度。

如果布尔什维克、而且只有布尔什维克真正认真在完成俄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象雅各宾派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反对他们，实质上就是反革命，因而加入他们的行列，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我们无论如何曾经反对过他们，现在就必须以谨慎的、忠实的和积极的态度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表示同意中央委员会对发动叛乱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议加以拒绝之后，阿克雪里罗得接着写道：〕

当然我反对集中社会主义反政府派和要求民主的群众中的不满分子的力量来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但这决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起义反对的是声称和整个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反政府派代表同一阶级的那个政权，必然是非法的、反社会主义的或反革命的起义。首先，我不承认今天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别看他们颁布法令，召开正式的“代表大会”。正如我两年前说过，并在伯尔尼会议上又重复过的那样，我

* 吉伦特派是1792年法国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与雅各宾派相比）。

确信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专政。后来我们目睹了所谓的苏维埃政权的蜕变，我的这一信念比在伯尔尼会议时更坚定了。您说不能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贱民和虐待狂”的政权而加以解散，但是您和身居俄国的其他朋友们一定还记得，早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之后，我就极不赞成对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那种广为流传、信口道来的看法，后来我曾清楚地、合情合理地叙述了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历史实质及其背景。我向考茨基表明我的观点说：“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布尔什维主义，它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不可轻易或随便作出判断”。但是，我立即补充说，“解释和理解它是一回事，认可或证明它是正确的却是另一回事”，等等。一些自然现象，如一块引起瘟疫流行的沼泽地，一次吞没整个整个城镇和地区的大地震；一些事件，如世界大战，匈奴和蒙古古人的侵略——它们的原因和后果都很重要，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人们想起它们时并不是非得表示钦佩或敬畏不可。当我们发现有些人、有些集团在摧毁人类的文化和进步的基础，使早已过去的时代的那种野蛮和残忍死灰复燃，我们有责任给这些行为以应得的惩罚。

据我看，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意义和我们将它推到前台的具体理由，与布尔什维克通过残酷无耻地欺骗无产阶级和军队的广大群众，用罪恶的手段和前所未闻的蛊惑宣传来取得政权的事实毫无关系。现在他们掌了权，他们为了要保住政权，把一部分人变成他们的御林军，同时腐蚀另一部分人，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与布尔什维克专政紧紧连在一起，就象旧地主、职员和官吏与沙皇制度紧紧连在一起一样。另外，如果广大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反政府派稍有不满意的表示，布尔什维克就采取恐怖、极度专横和非人道的镇压手段。我很乐意相信，在布尔什维

克统治的这三年里，原来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贱民，全部，或绝大部分已经变成这个政权的“虔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成了一个很体面的阶级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三年期间，一大批真正的或者半心半意的布尔什维克摇身一变，变成一伙在军事、民政和警察部门把持各级职务的贱民，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支生力军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支队伍及其指挥员中有多少虐待狂，但我坚信已故的讨厌的乌利茨基*是个虐待狂，捷尔任斯基**是个道地的心理变态者，在数不清的契卡中有不少这类人物，而且男女都有。另一方面，我承认，可能还会有极少数布尔什维克仍然认为现政权是必要的、有益的。

的确，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的黑帮百人团，对待他们占领区的居民同最狂暴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一样残忍，有些地方甚至犹有过之。当局就利用这些事实以及波兰的进攻来瓦解或削弱一部分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现在甚至可能有——目前还很难断定——一种亲布尔什维克的爱国主义正在特权分子之外的少数居民中崛起。在沙皇制度下，90%以上的工人农民毕竟是全心全意忠于沙皇的，而且坚决捍卫那个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制度。贵族、官吏和职员中也不乏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忠实虔诚的支持者。然而，当时的革命者，连自由派在内，谁也不曾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作“全民的”制度，或把沙皇的专制制度或“专政”及其官僚政治说成是代表人民的专政，或退一步，说成是代表人民中的“少数”的专政。恰恰相反，他们抱定宗旨，要使人民摆脱这种专政，同样，谁也不曾想把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当今这些独裁者，披着革命的外衣、炫耀自己作为

• M·S·乌利茨基（1873—1918），左派共产党人，彼得格勒契卡的负责人。1918年8月30日被恐怖主义者暗杀。

••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是契卡的最高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乞灵于革命词藻、繁文缛节以便欺世盗名，因此，我们义不容辞，必须剥去他们的画皮，还他们以罪犯和骗子的真面目，将他们专政的真实性质公诸于世。实际上，这是一小撮人的专制统治。这伙人腐蚀了千千万万正直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各种小资产者，将他们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作为这个政权的可靠支柱，使它能对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的民族，包括一部分无产阶级进行专政。

对我来说，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办法去战胜布尔什维克，显然仍是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因为苏维埃政权和沙皇制度一样不能（或许更不能）自行结束其暴政，因此，它也和上届政府一样，注定要被暴力所推翻。推翻沙皇式的官僚独裁政府的只能是革命的运动，可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中也还有反革命分子。在专制制度统治下，政权的敌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两个营垒；资产阶级反政府派虽然与社会党相去甚远，但不失为进步的，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它还是革命的。因而，社会民主党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情况下支持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是合理的。实际情况恰好是颠倒的，是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支持了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从总的方面来说，或从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以便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反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目前站到了反革命一边，他们想利用布尔什维克的被推翻来建立反革命专政，并彻底摧毁民主主义。唯一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力量，就是旨在摧毁布尔什维克专政、必要时象推翻沙皇制度一样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广泛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创造了种种条件，群众和社会主义反政府派要掀起具有广泛基础的独立运动，使它作好准备以便成功地向现政权进攻，比在沙皇统治时代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而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目前又处于比革命前强

大得多的地位，因此很有把握在任何叛乱中起主导作用，而且一旦成功，民主将被彻底摧毁。

如果社会主义反政府派集中全部或大部分力量来组织武装起义，军事谋反等，反布尔什维克的运动一旦取胜，就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后果（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要强调指出，你〔马尔托夫〕和我在这一点上的意见一向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新的民主革命，就不能从“苏维埃”专政中解放出来，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和社会党都受制于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不可能计划进行革命，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绝路逢生呢？一个办法就是国际社会主义干涉，结束布尔什维克对即使最温和的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反政府派也采取的那种恐怖镇压，恢复2—3月革命的政治果实。遗憾的是，关于布尔什维克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政权的错误说法，在世界各地散布甚广，国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对苏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使西方的一般社会党人摆脱这种危险的错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我建议社会党，当然还有工会，联合组织派遣一个人数众多的国际使团到俄国去，从各个角度全面考察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作用及其实行结果，向西方无产阶级汇报俄国广大人民群众の处境和心情。

《P·B·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论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同它的斗争》，见《社会主义通报》第6期（1921年4月20日）第3—7页；第7期（1921年5月4日）第4—5页。

the first two cases, the first two terms of the series are equal to zero.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1$.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n = 1 + x + \frac{x^2}{2!} + \frac{x^3}{3!} + \frac{x^4}{4!} + \frac{x^5}{5!} + \frac{x^6}{6!} + \frac{x^7}{7!} + \frac{x^8}{8!} + \frac{x^9}{9!} + \frac{x^{1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2$.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2n} = 1 + x^2 + \frac{x^4}{2!} + \frac{x^6}{3!} + \frac{x^8}{4!} + \frac{x^{10}}{5!} + \frac{x^{12}}{6!} + \frac{x^{14}}{7!} + \frac{x^{16}}{8!} + \frac{x^{18}}{9!} + \frac{x^{2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3$.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3n} = 1 + x^3 + \frac{x^6}{2!} + \frac{x^9}{3!} + \frac{x^{12}}{4!} + \frac{x^{15}}{5!} + \frac{x^{18}}{6!} + \frac{x^{21}}{7!} + \frac{x^{24}}{8!} + \frac{x^{27}}{9!} + \frac{x^{3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4$.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4n} = 1 + x^4 + \frac{x^8}{2!} + \frac{x^{12}}{3!} + \frac{x^{16}}{4!} + \frac{x^{20}}{5!} + \frac{x^{24}}{6!} + \frac{x^{28}}{7!} + \frac{x^{32}}{8!} + \frac{x^{36}}{9!} + \frac{x^{4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5$.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5n} = 1 + x^5 + \frac{x^{10}}{2!} + \frac{x^{15}}{3!} + \frac{x^{20}}{4!} + \frac{x^{25}}{5!} + \frac{x^{30}}{6!} + \frac{x^{35}}{7!} + \frac{x^{40}}{8!} + \frac{x^{45}}{9!} + \frac{x^{5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6$.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6n} = 1 + x^6 + \frac{x^{12}}{2!} + \frac{x^{18}}{3!} + \frac{x^{24}}{4!} + \frac{x^{30}}{5!} + \frac{x^{36}}{6!} + \frac{x^{42}}{7!} + \frac{x^{48}}{8!} + \frac{x^{54}}{9!} + \frac{x^{6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7$.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7n} = 1 + x^7 + \frac{x^{14}}{2!} + \frac{x^{21}}{3!} + \frac{x^{28}}{4!} + \frac{x^{35}}{5!} + \frac{x^{42}}{6!} + \frac{x^{49}}{7!} + \frac{x^{56}}{8!} + \frac{x^{63}}{9!} + \frac{x^{7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8$.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8n} = 1 + x^8 + \frac{x^{16}}{2!} + \frac{x^{24}}{3!} + \frac{x^{32}}{4!} + \frac{x^{40}}{5!} + \frac{x^{48}}{6!} + \frac{x^{56}}{7!} + \frac{x^{64}}{8!} + \frac{x^{72}}{9!} + \frac{x^{8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9$.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9n} = 1 + x^9 + \frac{x^{18}}{2!} + \frac{x^{27}}{3!} + \frac{x^{36}}{4!} + \frac{x^{45}}{5!} + \frac{x^{54}}{6!} + \frac{x^{63}}{7!} + \frac{x^{72}}{8!} + \frac{x^{81}}{9!} + \frac{x^{90}}{10!} + \dot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case $\alpha = 10$. In this case, the series (1) is

$$\sum_{n=0}^{\infty} \frac{1}{n!} x^{10n} = 1 + x^{10} + \frac{x^{20}}{2!} + \frac{x^{30}}{3!} + \frac{x^{40}}{4!} + \frac{x^{50}}{5!} + \frac{x^{60}}{6!} + \frac{x^{70}}{7!} + \frac{x^{80}}{8!} + \frac{x^{90}}{9!} + \frac{x^{100}}{10!} + \dots$$

部分参考书目

奥斯卡·安韦勒：《1905—1921年俄国的议会运动》莱顿，布里尔，1958年。

阿谢尔，亚伯拉罕：《阿克雪里罗得与孟什维主义的发展》，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

巴伦，塞缪尔·H：《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

布圭娜，安娜：《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运动：参考书目》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68年。

卡尔，E·H：《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3卷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1—1961年。

钱伯林，威廉·亨利：《俄国革命(1917—1921年)》2卷本，第5次印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0年。

切尔诺夫，维克托：《伟大的俄国革命》，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6年。

唐恩，西奥多：《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乔尔·卡迈克编译，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4年。

格茨勒，伊斯雷尔：《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

——《孟什维克》，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6期(1967年11—12月号)第15—29页。

盖耶，迪特里希《俄国社会民主党时期的列宁，沙俄帝国的工人运动——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问题1890—1903年》，科隆，

布劳出版社，1962年。

海姆逊·利奥波德：《1905—1917年俄国城市的社会稳定性问题》载《斯拉夫评论》第23期（1964年12月号）第619—642页；第24期（1965年3月号）第1—22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

——海姆森编：《孟什维克：从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

哈凯夫，西德尼：《第一次流血：1905年俄国革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4年；伦敦，博德利黑德公司，1965年。

基普，J·L·H：《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

莱恩，戴维：《共产主义的基础：对1898—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研究》，阿森，泛·高尔果姆，1969年。

马尔托夫，L：《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西奥多·唐恩：《1918年以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亚历山大·斯坦译，柏林，迪茨出版社，1926年。

迈耶，艾尔弗雷德·G：《列宁主义》，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

派普斯，理查德：《社会民主党和圣彼得堡的劳工运动，1885—1917年》，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

——《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

拉比诺维茨，亚历山大：《革命的前奏：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和1917年7月起义》，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

鲁本, N·V: 《十月革命与孟什维主义的破产》(1917—1918) 莫斯科, 1968年。

夏皮罗, 伦纳德: 《苏联共产党》, 伦敦, 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 1960年。

——《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起源》伦敦, 贝尔公司, 1955年。

施瓦茨, 所罗门·M: 《1905年的俄国革命: 工人运动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形成》, 格特鲁德·瓦卡译,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7年。

托拜厄斯, 亨利·J: 《俄国的犹太崩得: 自诞生到1905年》,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2年。

特雷德艾尔德, 唐纳德·W: 《列宁及其对手: 争夺俄国未来的斗争(1898—1906年)》, 纽约, 普莱格出版社, 1955年。

策烈铁里, I·G: 《二月革命回忆录》2卷本, 海牙, 莫东, 1963年。

乌拉姆, 亚当·B: 《布尔什维克, 俄国共产主义胜利的思想和政治史》, 纽约, 麦克米伦公司, 1965年。

瓦连京诺夫, 尼古拉: 《与列宁的会见》, 保罗·罗斯塔和布赖恩·皮尔斯合译,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8年。

瓦丁, I·《革命与孟什维主义》莫斯科, 1925年。

韦德, 雷克斯·A: 《1917年2月至10月俄国谋求和平》,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9年。

怀尔德曼, 阿伦·K: 《1891—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工人革命》,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7年。

沃尔夫, 伯特伦·D: 《三个闹革命的人(传记体历史)》, 纽约, 迪艾尔出版社, 1948年; 伦敦, 企鹅图书公司, 1966年。

沃京斯基，W·S：《格鲁吉亚的民主》，巴黎，莱维出版社，1921年。

饶尔丹尼亚：《我的一生》，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68年。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内设孟什维克运动史研究中心，由利奥波德·海姆森教授领导。该中心收藏大量有关孟什维主义的文献资料，均为俄文，并以俄文出版了研究孟什维主义的多种丛书以及孟什维克头面人物的大量回忆录。这些著作都很有价值。

读者如懂俄文，可在前面我所引用的布圭娜的著作中，看到最为详尽的参考。

大事年表

- | | | |
|-------|-------------|--------------------------------------|
| 1903年 | 7月17日—3月10日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主义诞生 |
| 1904年 | 2月8日 | 俄日战争爆发 |
| | 11月 | 地方自治局运动 |
| 1905年 | 1月22日 | “流血星期日” |
| | 4月—5月 |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 |
| | 5月27日 | 俄国在对马海峡战败 |
| | 9月5日 | 俄日战争结束 |
| | 10月23日 | 铁路罢工发展为总罢工 |
| | 10月30日 | 《十月宣言》颁布 |
| | 11月—12月 | 《开端报》在彼得堡出版 |
| | 12月20—31日 | 莫斯科起义 |
| 1906年 | 3月18—30日 | 第一届杜马选举 |
| | 4月—5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 |
| 1907年 | 4月—5月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
| | 6月16日 | 斯托雷平政变 |
| 1908年 | 2月 |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热亚那创刊 |
| 1909年 | 1月 | 列宁发动反对“取消派”的运动 |

		动
1912年	1月	列宁把孟什维克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4年	7月16和17日	第二国际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重新统一所作的尝试失败
	8月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1917年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存在分歧
1917年	3月	三月革命
	3月	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苏维埃成立
	3月—9月	《工人报》在彼得堡创刊 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起支配作用
	4月16日	列宁回到俄国
	5月22日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回到俄国
	7月16—18日	“七月游行示威”
	9月9—14日	科尔尼洛夫事件
	11月7日	布尔什维克革命
	11月	马尔托夫派担任孟什维克领导
		孟什维克企图组成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
1918年	1月19日	立宪会议解散
	3月3日	布列斯特—立托天条约

	3月5日	外国干涉开始
	夏天	实施战时共产主义
	11月9—10日	德国革命
	12月27—1919年1月1日	俄国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
1919年	2月	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
1920年	3月—4月	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发表“四月提纲”
	9月21日	马尔托夫离开俄国去西方
1921年	2月1日	《社会主义通报》在柏林创刊
	3月	实施新经济政策
		几百名著名的孟什维克被捕，孟什维克党丧失战斗力
1922年		十名孟什维克领导人获准离开俄国
1923年	4月4日	马尔托夫去世，唐恩担任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领导人
1928年	4月16日	阿克雪里罗得去世
1933年		《社会主义通报》在巴黎出版
1940—1965年		《社会主义通报》在纽约出版
1947年		唐恩去世